



# 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

【第九卷 第一期】

目次

研究論文

	頁
社會排斥對暴力與非暴力男性青少年之影響	1
	陳巧雲 柯政宏 游家權
應用多變量迴歸樹分析全國性侵害通報數據 之研究	49
	林宗鍵 顧以謙 許華孚
修復式正義於校園霸凌事件之運用模式－ 以個案敘事經驗為例	97
	施俊良 劉育偉 許華孚
國中學生對校園霸凌防制策略之知覺有效性 評估	123
	王怡今 鄭英耀 陳利銘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

一〇六年 六月



# 社會排斥對暴力與非暴力男性青少年之影響

##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social exclusion on violent and non-violent male adolescents**

陳巧雲<sup>\*</sup>、柯政宏<sup>\*\*</sup>、游家權<sup>\*\*\*</sup>

---

<sup>\*</sup>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學系副教授，本文通訊作者

<sup>\*\*</sup>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博士

<sup>\*\*\*</sup>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與休閒教育研究所碩士

## 摘要

從過去的研究發現一些暴力青少年犯認為自己被同儕排擠在外(Leary et al., 2003)。本研究以比較暴力男性少年與對照組（包含非暴力犯罪組與一般高中生組）之主動-反應性攻擊行為高低、排斥敏感度高低、負向情緒調控能力以及經歷社會排斥相關的電腦化丟球遊戲後，其感受社會排斥後之威脅-需求量表分數差異，來瞭解攻擊行為產生的相關因素。研究結果發現暴力青少年於攻擊行為傾向上，無論主動性及反應性攻擊分數皆顯著高於兩個對照組，在拒絕敏感度上，三組於焦慮及憤怒各分量表分數上未達顯著差異。在負向情緒調節能力上，暴力青少年顯著低於兩對照組，暴力青少年可能無法覺察或瞭解他人所展現的負向情緒訊息、對自身情緒表達與掌控有困難，對負向情緒控制較差，及對人際互動所衍生壓力作出適當的反應。在需求威脅上，暴力青少年經歷社會排斥後，暴力青少年歸屬感及有意義存在需求的分屬顯著低於其他二組對照組，暴力青少年組可能因為無法獲得其他個體之回饋反應而喪失其歸屬感，以及認為對群體毫無價值，可能藉由展現暴力，謀求群體對其產生注意，來獲得歸屬感及有意義存在需求之高度滿足，導致產生攻擊行為的原因之一。

關鍵字：主動-反應性攻擊行為、排斥敏感度、負向情緒調控、社會排斥、威脅-需求

##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social exclusion may be related to violent behavior in youngsters (Leary et al., 2003). The present study compared violent male adolescents and control groups (a non-violent adolescent group and a normal adolescent group) in terms of proactive-reactive aggression, rejection sensitivity,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and threat-need after experiencing social exclusion. The computerized cyberball task, which presents a social game environment, was used to manipulate 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iolent adolescents had higher proactive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scores than the two control groups. For rejection sensitivit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shown in anxiety and anger subscale scor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The score for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violent adolesc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s. This means the violent adolescents may not perceive or understand the negative emotion information from others and have lower inhibitory control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have inappropriate reactions when under pressure in social interactions. After experiencing social exclusion, the scores of belonging and meaningful existence in the violent adolescent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other two control groups. The violent adolescents may experience lower feedback from other people and

consequently have a reduced sense of belonging. They may think they are not important in their group and so also have a lower sense of meaningful existence. This may mean they adopt violent behavior to get the attention of others, thus gain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an elevated feeling of meaningful existence.

Keywords : proactive-reactive aggression, rejection sensitivity,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threat-need

## 壹、前言

在台灣，犯下槍擊命案的少年犯，曾說出他認為自己不被老師接受，產生被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想法與情緒感受。社會排斥的威脅對個體而言是強烈且迅速，受排斥之個體將有明顯的負向情緒感受、降低其滿足感 (Van Beest & Williams, 2006; Williams, Cheung, & Choi, 2000; Zadro, Williams, & Richardson, 2004)，並可能誘發壓力反應，例如，短期壓力可能激發交感神經－腎上腺髓質軸 (sympathetic-adrenal-medullary, SAM axis)，產生戰或逃(flight or fight)的反應。長期處於被排斥的壓力狀態下，可能激發下視丘－腦下垂體－腎上腺軸(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HPA axis)，促腎上腺皮質釋放激素 (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CRH) 傳遞至腦下垂體，CRH 促使腦下垂體分泌促腎上腺皮質激素 (adrenocorticotrophic hormone, ACTH)，進而刺激腎上腺分泌荷爾蒙，同時在 ACTH 的作用下，分泌糖皮質激素 (Glucocorticoid)，其中主要是皮質醇(cortisol)。過量的糖皮質激素可能造成海馬迴的神經元樹狀突萎縮、突觸死亡(Tanokashira et al., 2012)。過去研究發現被威脅者體內皮質醇明顯高於對照組 (Dickerson & Kemeny, 2004)與生理健康的程度降低有關，增加心肌梗塞的風險、血壓調節能力降低、無法有充足睡眠(Pickett & Gardener, 2005)。過去的研究顯示社會排斥所造成的社會痛苦(social pain)就和生理疼痛一樣，可以藉由普拿疼(acetaminophen)來降低疼痛感 (DeWall, MacDonald, Webster, Masten, Baumeister, Powell, Combs, Schurtz, Stillman,

Tice, & Eisenberger, 2010)，且偵測痛苦相關之大腦區域也明顯受到活化 (Eisenberg, Lieberman, & Williams, 2003)。社會疼痛與生理疼痛有共通的神經機制，以及社會疼痛對身體系統都有多方的影響。

在心理影響上，當排斥發生持續一段時間後，焦慮、負面情緒、自尊降低等負面影響就會發生 (Pickett & Gardner, 2005)。這些負面情緒壓力可能會導致個體有短期的認知損傷 (Baumeister & DeWall, 2005)，改變原本的友好親和行為，讓個體做一些冒險的決定。社會拒絕感受度較高的個體通常伴隨憂鬱、敵意和社會壓力 (Gardner, Pickett, & Knowles, 2005)。個體被團體中的其他個體忽略或拒絕，將導致個體有很高的機率伴隨強烈嫌惡感的社交經驗，並威脅其歸屬、自尊、控制及有意義的存在等四種主要的需求 (Williams, 2009)。被社會排斥之個體可能因無法獲得其他個體之回饋反應而喪失其歸屬感，社會融入地位 (social inclusionary status) 影響個體的自尊 (Leary, Haupt, Strausser, & Chokel, 1998)，被社會排斥之個體在控制層面上容易無視於外界訊息，獲取較多的關注及包容，在有意義的存在感上，他們認為他人對其視而不見及對群體毫無價值 (Case & Williams, 2004)。因此，本研究先欲了解社會排斥經驗與青少年攻擊行為的相關性，在參與社會排斥實驗後，測量暴力青少年 (實驗組)、非暴力青少年組 (對照組 1) 及一般青少年組 (對照組 2) 在需求威脅上的差異，了解社會排斥對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影響為何。

## 貳、文獻回顧

### 2.1 與暴力行為相關的模型

Anderson 及 Bushman (2002) 提出一般攻擊模式(*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 來說明攻擊行為形成歷程，認為攻擊行為建立在社會學習與社會認知的基礎上，指出個體條件（如人格特質或性別）與情境條件（如挑釁、暴力遊戲），將個人內在情緒、認知及覺醒三者之相互作用影響攻擊行為，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將影響個體對攻擊行為的評價及決策歷程，此決策歷程將促使個體產生衝動行為或深思熟慮行為。此模式有別於過去單純觀察攻擊行為，檢視與攻擊行為相關的動機或決策歷程，更能說明情感反應或情緒促發刺激對攻擊行為的影響，強調個體對外界訊息及攻擊行為所衍生後果的認知評估歷程皆影響攻擊行為的產生(Anderson & Bushman, 2002)，依此有助於瞭解社會互動歷程於個體攻擊行為產生中所扮演的角色。於一般攻擊模式中，情境條件包含個體所處情境中，容易促發或抑制攻擊行為的各種因素，例如，挫折事件或於同儕團體中所處的地位 (Coie, Dodge, & Coppotelli, 1982) 皆可能影響攻擊行為的產生。因此，從團體行為、個人的人格特質及社會認知等三面向來探究攻擊行為的產生，以瞭解青少年攻擊行為與社會拒絕之關聯性 (Dodge & Coie, 1987)。

由於攻擊行為包含多面向，一般將其區分為反應型攻擊行為 (*reactive aggression*) 及主動型攻擊行為 (*proactive aggression*) 兩種型態，前者意旨受到威脅刺激而引發的生

氣、挫折將誘使個體產生攻擊行為，此類攻擊行為通常無計畫性或不具特定想達成的目標，容易因挑釁而產生；後者則被視為有目的性、為達成某目標之預謀行為，攻擊行為為達成目標之工具行為，非因外界威脅或情緒性刺激所產生。這二種不同類型之暴力/攻擊行為被認為可能由不一樣的生理機制或認知處理歷程而產生 (Blair, 2001)，相較於反應型攻擊行為，主動型攻擊行為與精神病態人格有較高的關聯性 (Patrick, 2001)；反應型攻擊行為則常有抑制功能較差，缺乏自我控制且有易衝動人格特質等特徵 (Raine et al., 1998)，因此過動症患者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傾向表現反應型攻擊行為，而非主動型攻擊行為 (Dodge et al., 1997)。

Dodge & Coie (1987) 嘗試以社會訊息處理機制區分上述兩類攻擊行為，發現藉由觀察個體外顯行為，區辨出該個體傾向產生哪一類型的攻擊行為。從二因子攻擊行為模式來瞭解攻擊行為與青少年之人際關係之關聯性，發現反應型攻擊行為常伴隨負向的同儕狀態，當個體不被同儕所接受或拒絕時，便容易產生此類攻擊行為。反之，主動攻擊傾向個體之同儕關係較為良好 (Poulin & Boivin, 2000)。此外，反應型攻擊行為產生與個體被社會評斷有關，反應攻擊傾向之個體容易被同儕給予負向性的評價，這類個體常面臨各式社交與行為表現上的難題，與同儕相處易發生衝突(Poulin & Boivin, 2000)，並因此陷入衝突-攻擊行為-衝突之惡性循環。反應攻擊傾向之個體易與同儕發生衝突，並因此產生攻擊行為，可能導因於這類個體對他人意圖的判讀有敵意歸因謬誤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es)

的傾向，其不具正確判斷他人意圖是否真帶有敵意、容易將模糊性意圖視為敵意，及對假定的敵意作錯誤的解讀，並依此產生報復性的攻擊行為。主動攻擊傾向之個體則無此謬誤(Dodge & Coie, 1987)，其評估攻擊行為可獲得正向結果才會產生攻擊行為，其攻擊行為相對於反應型攻擊行為，較易被同儕所忍受。因此，若個體長期因被同儕團體所忽視，深受社會拒絕之威脅，則該個體將因自身的焦慮、憤怒、不安及其他負向情緒，及容易敵視他人而產生反應型攻擊行為。這類攻擊行為伴隨明顯的社會拒絕，社會拒絕可能誘發攻擊行為產生，攻擊行為也會惡化人際關係並加深社會拒絕。

## 2.2 社會拒絕作業：電腦化丟球遊戲 (Cyberball task)

人類屬於群居動物，不被社會群體所接受、忽略，或缺乏與他人互動將誘發個體產生被社會排斥的想法與感受，電腦化丟球遊戲為依此原則設計的一種虛擬化丟球作業，被社會心理學家於 2000 年左右廣泛地應用於社會排斥相關議題。遊戲以玩家接到其他玩家所丟擲過來的球後，可以自由選擇將球丟給其他玩家來進行，但實際參與遊戲者僅一人，參與者誤以為自己與兩人以上玩家以網路連線方式同時進行，並不知道其餘玩家皆由電腦程式所控制，可依此操弄參與者獲得由他人丟擲數之多寡來誘發遊戲參與者產生社會排斥之感受；當參與者察覺自己丟擲球數（或收到其他玩家所丟擲而來的球數）明顯少於其他玩家，將認為被其他玩家所忽略而引發其有社會排斥之感受，反之則無此感受。

被社會排斥個體可能不僅其既有的人際關係受到影響，也衝擊內在自省歷程，並因而影響其後行為表現，透過電腦化丟球遊戲之運用能對上述論點加以檢驗。有研究便發現校園暴力事件的發生與社會排斥有很高的關聯，被社會排斥者可能依此報復那些始作俑者，並波及至無辜的旁人 (Leary et al., 2003)。由電腦化丟球遊戲所誘發之社會排斥感受，影響遊戲參與者之心智功能，例如，正向情緒感受將降低(Lustenberger & Jagacinski, 2010)，影響人際關係之行為表現因素如社交敏感性 (social susceptibility, Cater-Sowell et al., 2008)、攻擊行為 (Van Beest et al., 2012)，以及個體生活主要的四個需求 (如歸屬感, Baumeister & Leary, 1995)，生理狀態 (如體溫, IJzerman et al., 2012) 等也將因社會排斥經歷而改變。藉由電腦化丟球遊戲操弄，可清楚比較經歷社會排斥者與未經歷者之差異，依此可更進一步探討社會排斥對被排斥者所帶來的影響。

Williams (2009) 提出社會排斥下的時空需求威脅模式 (temporal need threat model) 來說明個體如何因應社會排斥，此模式將因應過程依據時間先後順序分為 1.反射階段 (reflexive stage)、2.反思階段 (reflective stage) 及 3.放棄階段 (resignation stage) 等三階段。個體於產生社會排斥感受當下，將反射性立即引發社交疼痛感 (social pain)、感到被威脅等初始反應，並將依循過度偵測理論 (over detection theory)，容易將所覺察到的訊息擴大視為社會排斥之線索，並依此誘發情緒反應、產生初級疼痛感，也使基本需求狀態受到影響。依據 Williams (2009) 的模式，反射階段所伴隨之反應及歷程，於

個體經歷社會排斥時，便已被誘發，因此為更清楚明瞭此階段歷程、相關機制或所產生的反應，實需透過電腦化丟球遊戲配合自陳式量表（遊戲結束後立即填答）或其他適切的測量方式（如同步測量腦電波）來研究。反思階段則意指個體將以理性思維方式處理反射階段所誘發的反應或歷程，以協助個體因應社會排斥所帶來的威脅。這些因應歷程對維持自身基本需求滿足有其必要性，被社會排斥者試圖藉由更具社交吸引力、致力處理相關社交性線索、增加對他人的影響力等方式來化解所面臨之社會排斥狀況 (Williams, 2009)，此也可以藉由電腦化丟球遊戲的運用，測量經歷社會排斥之實驗參與者面對排斥狀況的因應（如相對於未經歷社會排斥者是否有更強烈作為來滿足基本需求）、經歷後選擇採取的情緒、認知功能及行為表現，以更清楚了解反思階段。待個體因應社會排斥一段時間（數個月以上）且無法改變被排斥狀態時，將進入放棄階段。此時個體不僅無法排除因排斥所帶來的痛苦，也無法滿足基本需求，將表現出習得無助、覺得自己沒有價值、感到憂鬱或疏離任何社交群體 (Hartgerink et al., 2015)。

綜合上述，藉由電腦化丟球遊戲的運用不僅有助於瞭解個體經歷社會排斥之相關機制運作及行為反應，更有利於探討社會排斥所衍生的影響效果，隨時間軸的變化 (Hartgerink et al., 2015)，對於社會排斥相關理論之建立有顯著的貢獻。此外，此作業也適合以需求威脅的觀點來瞭解社會排斥對個體的負向性影響（如對行為表現）、相關生理機制 (Rotge et al., 2014 ; Riva et al., 2012) 及情緒反應 (Zadro et al., 2006)。

### 2.3 排斥的需求-威脅模式 (Need-Threat Model of Exclusion) :

被社會排斥者將因被群體排除在外及忽略等對待，而使其心理上感到強烈不舒適及嫌惡 (Williams, 1997; Williams et al., 2000)，並試著藉由恢復已失去或受到威脅的需求來因應排斥 (Williams, 1997)，這些因應將反映至其認知、情緒或行為表現上，此依據被排斥者主觀感受來探討社會排斥稱為需求-威脅模式。該模式試圖統整不同概念來瞭解社會排斥對個體之影響 (Williams, 1997 ; Williams & Zadro, 2005)，相對於其他令人嫌惡的人際關係，以歸屬、自尊、控制及有意義的存在等四個基本需求受到威脅為核心，認為被社會排斥之個體將因無法獲得其他個體之回饋反應、感謝而喪失其歸屬感，將因其與團體中其他人的連結被破壞，而產生負向性反應。自尊的喪失與否則取決於被排斥者自認為之社會對其地位包容性 (social inclusionary status) (Leary, Haupt, Strausser, & Chokel, 1998)，被排斥者可能因試著去找出被排斥的原因，卻遭到挫敗而威脅到自尊，因而涉及自我內在的解釋與自嘲 (Williams, 2007)。第三個需求為具控制感的需求，個體會想控制所處環境，例如，當個人與他人有爭論時，個體會想去控制及引導整個對話，但被排斥者在人際關係的互動上，無法達到這個需求，並傾向無視於外界訊息，以獲取較多的關注及包容。第四個需求為有意義的存在，有意義的存在與個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有關，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與目的，被排斥者認為他人對自己視而不見及對群體毫無價值 (Case & Williams, 2004)。社會排斥是種極端

的懲罰，可視為社交死亡 (social death)，其威脅對個體而言是強烈且迅速，受排斥之個體將有明顯的負向情緒感受、降低其滿足感 (Van Beest & Williams, 2006; Williams, Cheung, & Choi, 2000; Zadro, Williams, & Richardson, 2004)，並有強烈的動機鞏固這些需求 (Williams, 2009)。被排斥者可能依循上節「時空需求威脅模式」所述之三階段來因應社會排斥情境，且因應的方式將隨被持續社會排斥時間的長短 (Williams, 2009)、是否明瞭被排斥的原因 (Williams & Zadro, 2005)、對被排斥事件的歸因方式 (Williams & Zadro, 2005)，及滿足四種基本需求動機的程度 (Jamieson et al., 2010) 而有所差異。

為能有效解決被社會排斥之困境，以滿足有意義的存在及控制感之需求來因應排斥為被排斥者直接採用的策略 (Williams & Nida, 2011)，並容易在感到無助或處於惡劣外在環境情況 (如高噪音環境) 下，產生更多的攻擊行為，且攻擊對象並不僅限造成社會排斥之肇事者 (Williams, 2009)，甚至會透過極端方式如綑綁、殺害他人來謀求群體、社會對其的注意，以獲得有意義存在需求之滿足。控制感的滿足則並不一定意味著僅藉由明顯掌控、影響他人來獲得，被排斥者若清楚明瞭自己不被周遭他人所喜愛，因此受到排斥對待時，這些預期之內的對待並不會引發排斥者產生攻擊行為，預期之外的社會排斥才會誘發被排斥者產生攻擊行為 (Wesselmann, Butler, Williams, & Pickett, 2010)，因此暴力青少年可能因瞭解自己不受團體歡迎，不傾向藉由獲得控制感滿足來因應社會排斥。

歸屬感因社會排斥而受到威脅也將改變被排斥者的行為

表現 (Williams et al., 2000)，被排斥者可藉由謹守團體規範，或更努力嘗試給予他人更大的回報來建立人際關係來滿足其歸屬感需求 (Maner, DeWall, Baumeister, & Schaller, 2007 ; Jamieson, Harkins, Williams, 2010)。然而被排斥者以滿足歸屬感需求來因應社會排斥，不限於只與排斥者再次建立人際關係，有研究便指出被排斥者傾向與陌生人建立新的人際關係，而非排斥他的人 (Manner et al., 2007)，這樣的差異可能來自於被排斥者是認為自身的表現是否將被排斥者再次評估，當被排斥者有機會給予排斥者回報或掌握/影響排斥者對其評價時，將嘗試與排斥他的人建立關係，並同時也獲得控制感滿足的需求 (Warburton, Williams, & Cairns, 2006)。暴力者對其暴力往往有更多的藉口來合理化其行為 (Henderson & Hewstone, 1984)，並隨暴力行為的激烈程度及表現頻率，傷害暴力加害者與受害者間既有的人際關係 (Katz et al., 2002)，因而推測他們因缺乏良好人際關係，使其歸屬感滿足可能較一般人低，導致這些實驗參與者經歷電腦化丟球遊戲後將，歸屬感需求威脅將更加明顯。

被社會排斥者將因不愉快經歷威脅其自尊 (Steele, 1988)，因而將更留心於社交訊息，特別是鼓勵性等正向訊息 (Williams & Nida, 2011)，但當社交訊息與實際感受不一致時，將誘發情緒的產生。因此，情緒調節能力對被排斥者因應排斥有其重要性，越佳的情緒調節能力常伴隨較佳的社交品質及人際關係 (Lopes, Salovey, Cote, & Beers, 2005)，若情緒調節能力失能 (emotion dysregulation) 則個體無法對人際互動所衍生

壓力作出適當的反應 (Baumeister, Bratslavsky, Muraven, & Tice, 1998)。情緒調節失能可能影響情緒覺察能力、不瞭解或接受他人所展現的情緒訊息、對自身情緒表達與掌控有困難，及對自身情緒激發的調節能力不足 (Gratz & Roemer, 2004)，因而常表現出較多負向情緒。情緒調節失能的個體於經歷社會排斥後，表現出不同的負向情緒 (如生氣、焦慮、厭惡等)。如邊緣性人格疾患者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 於經歷電腦化丟球遊戲前後之負向情緒量表 (negative affect subscale, 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 並無差異，僅於社會排斥後展現出較明顯的痛苦 (distress) 感受。

簡言之，經歷社會排斥後個體四種基本需求滿足將受到威脅，但排斥者對自身的認知與評估將影響何種需求 ”主要” 受到威脅，及以滿足該需求來因應社會排斥，這當中可能因此誘發特定負向情緒。因此，情緒調節能力也可能影響排斥者如何因應社會排斥，能力較佳者應更有能力來因應社會排斥。

## 2.4 拒絕敏感度與攻擊行為之相關性

認知因素於攻擊行為的產生與持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攻擊行為的表現與否的個別差異，和被排斥者對自身所經歷社會排斥之評估與解釋有關 (Jacobs & Harper, 2013)，個體對社交性拒絕的敏感性與攻擊行為有正相關。拒絕敏感性 (rejection sensitivity, RS) 為個體對預期性的社交性拒絕的防衛性反應，與個體幼時被拒絕或社會排斥的經驗有關 (Feldman & Downey, 1994)，認為自己在表現出需求或脆弱時將被他人所

拒絕 (Downey & Feldman, 1996)，對負向社交性回饋過度警惕，或易將他人意圖，特別是模糊性線索視為拒絕訊息 (Downey et al., 1998)，具高拒絕敏感度 (high rejection-sensitive, HRS) 之個體在覺察到被拒絕時，將展現強烈的情緒性反應 (如攻擊行為)，來對抗自身所面臨的威脅 (Downey & Feldman, 1996; Downey et al., 1998)。因此，具高拒絕敏感度者以具敵意、不友善的退縮行為 (如抑制情感) 來預防伴侶的拒絕 (Ayduk, et al, 2003; Purdie & Downey, 2000)，高拒絕敏感度者相對於低拒絕敏感者更可能在被親密伴侶的拒絕時，表現出攻擊行為 (Ayduk, et al, 1999 ; Ayduk, et al., 2008)。且由被拒絕的預期性焦慮所誘發對親密伴侶攻擊類型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如女性將展現具敵意的言語或非言語行為 (Downey & Feldman, 1996; Downey et al., 1998)，男性則展現肢體暴力 (Downey et al., 2000)。

近來的研究，慢慢將觸角延伸至拒絕敏感度對中期學齡兒童的負面影響，瞭解此階段兒童拒絕敏感度與其攻擊行為之關係有三個優點，其一為可由關注個體形成被社會群體接受感受的首要階段來瞭解拒絕敏感度的發展。其二為發生於此階段問題可能衍生個體其後之心理疾病、犯罪行為、物質使用、低學業成就及失業等問題 (Fergusson et al., 2005)，若盡早處理應可減輕上述問題往後產生之機率。其三為當幼時行為因應模式形成之後，在個體年紀增長後，很難以介入方式去降低攻擊行為，畢竟其觀念及生活經驗都已固定較不易改變 (Anderson & Bushman, 2002)。研究發現依據兒童拒絕敏感度的高低能去預

測一年內的攻擊、反社會、破壞性及反抗的行為，且這些結果與自我報告、教師陳述與學校的官方紀錄一致，提供了對於兒童拒絕敏感度與攻擊行為具關連性之初步的支持 (Downey et al., 1998)。

兒童會對社會排斥的線索產生焦慮和憤怒的反應 (Downey et al., 1998)，依據兒童預期社會排斥所誘發的情緒反應，可預測其行為反應類型 (London et al., 2007)，憤怒反應將導致攻擊行為，而焦慮則導致退縮或社交性焦慮，不同於成人預期社會排斥所引發的焦慮，與其攻擊行為有關 (Jacobs & Harper, 2013)。因此，過去研究顯示絕敏感度與攻擊行為有關，但仍不清楚確切的歷程包括攻擊行為的產生以及拒絕敏感度的基本機制，建立相關理論以增加瞭解哪些因素會讓高拒絕敏感度者產生攻擊行為，並依此預測或更有效率的管理兒童的攻擊行為。

社會訊息處理機制認為個體會依據先前經驗來面對新的社交情境，並依此預期可能發生情況、自身行為該如何因應，及瞭解行為反應所帶來的後果 (Huesmann, 1998)。一般攻擊行為模式以此基礎指出攻擊行為的產生，取決於個人 (如人格特質、所依循的信念等) 與環境因素 (所面臨的侮辱、挫折等)，情緒或行為調節失能者易因對面臨情境感到挫折或厭惡時，產生反應型攻擊行為 (Rathert et al., 2011)。主動型攻擊行為則相對於反應型，攻擊行為並非受特定刺激所誘發，而是攻擊者為達到自身的目標或願望而產生的冷血式的行動 (Camodeca & Goossens, 2005)。此意味著拒絕敏感度與主動型攻擊行為之關

聯性較低，這類型攻擊者並不會因所面臨的情境，或事件所誘發的情境（如憤怒）而產生攻擊行為，不同於反應型攻擊行為與攻擊者之焦慮（Vitaro, Brendgen, & Tremblay, 2002）、憤怒（Wilkowski & Robinson, 2008）有很高的相關，以拒絕敏感性預測反應型攻擊行為優於預測主動型攻擊行為。

綜合上述，社會關係的發展在兒童及青少年期相當重要，這可以解釋為何兒童及青少年會花將近一半以上的時間去與同儕互動(Grusec & Lytton, 1988)，因與同儕互動提供了發展社會認知及社會知覺功能的機會。但在此同時，同儕之間的互動也可能因為同儕拒絕或是社會排除，變成壓力來源而影響兒童成長的過程，同儕的拒絕跟排斥被認為會直接影響他們的學校及社會的功能(Buhs & Ladd, 2001; Ladd, Herald-Brown, & Reiser, 2008; Ladd & Troop-Gordon, 2003)。同樣地，同儕拒絕被認為與心理健康問題有關，例如涉及破壞性行為問題(Dodge et al., 2003)、人際關係困難(Downey, Lebolt, Rincon, & Freitas, 1998)、低自尊、內在情緒問題，如焦慮或憂鬱等(Deater-Deckard, 2001; Ladd, 2006)，更甚者，這些社會拒絕或是排除的經驗可能會與暴力行為產生有關。

本研究採用會引發社會排斥的情境及情緒反應之電腦化丟球遊戲，同時採用瑞文氏智力測驗、反應-主動攻擊行為問卷(Reactive 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排斥敏感度問卷(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負面情緒調節量表(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Scale)及需求威脅量表(Need Threat Scale)，來瞭解這些暴力行為青少年會去犯下的暴力犯

罪是因為過度在意負面事件（社會排斥感高），亦或是他們面對社會排斥事件有憤怒或焦慮之心理反應，其負面情緒調節之能力為何，以及社會排斥如何影響其歸屬、自尊、控制及有意義的存在之基本需求，其與暴力行為發生之相關性。

## 參、研究方法

### 3.1 問卷介紹：

#### (1) 反應-主動攻擊行為問卷 (Reactive 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Raine et al., 2006)

反應-主動攻擊行為問卷共 23 題。受測者依據每題之情境，評估自己以三點量尺 (0 為從不、1 為有時、2 為經常) 評估自己多常展現言語或肢體的攻擊行為。上述題目包含 12 題主動攻擊行為情境如:多常對騷擾你的人大吼大叫，及 11 題反應型攻擊行為情境如:多常因輸掉比賽後生氣發狂等兩類別。因此主動型攻擊行為分數介於 0~24 分，反應型攻擊行為分數介於 0~22 分，分數越高代表該類型攻擊行為越明顯。量表整體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Cronbach' $\alpha$ =0.90，主動型攻擊行為分測驗 Cronbach' $\alpha$ =0.83，反應型攻擊行為分測驗 Cronbach' $\alpha$ =0.86，且兩分測驗分數正相關達顯著 ( $r = .65$ ,  $P < .05$ )。

#### (2) 排斥敏感度問卷 (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 RSQ) (Downey and Feldman, 1996)

排斥敏感度量表用來評估受測者對排斥的防衛性預期反

應，以十二個與同儕及老師互動之假設性情境中，受測者評估每一情境他人對其 ”回饋” 反應屬於接受或排斥的程度，來瞭解受測者對社會互動中對拒絕的敏感程度。每一情境皆有三個問題，包含評估自己可能被排斥時，所衍生的情緒狀態（分別為 1 不緊張至 6 非常焦慮，及 1 不生氣至 6 非常憤怒），及評估自己於該情境中被排斥的可能性（1 接受至 6 排斥）。依此，該量表可分別計算受測者由排斥所誘發的焦慮或憤怒程度，分數越高表示該情緒感受越強烈，及對排斥的敏感度越高。兩情緒分數間高正相關達顯著 ( $r = .76, P < .001$ )，量表整體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Cronbach' $\alpha=0.92$ ，焦慮分測驗 Cronbach' $\alpha=0.85$ ，憤怒分測驗 Cronbach' $\alpha=0.86$ 。四週後的再測信度則焦慮分測驗為.82，憤怒分測驗為.85。該量表之憤怒分數並對受測者社交能力及對事件是否有敵意具良好的辨別效度 (Downey & Feldman, 1996)。

### (3) 負面情緒調節量表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Scale, NMR) (Catanzaro & Mearns, 1990)

負向情緒調節量表為一自陳式量表，適合用來測量個體情緒調節缺陷程度。該量表依據反應預期理論 (response expectancies theory) (Kirsch, 1985)，透過評估受測者對緩和負向情緒狀態的預期，以測量其自身所採用之行為與認知等各種因應策略，對緩和負向情緒狀態效用的信任程度。量表共有三十題，其中部分為反向題，以五點量尺 (1 非常不同意至 5 非常同意)進行填答，分數越高代表受測者越相信自己可能藉由非藥物的手段緩合負向情緒。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負向情緒調節

量表為單維度測驗，可有效評估個體是否有憂鬱的傾向、或處於悲傷的狀態 (Catanzaro & Mearns, 1990)，對於受測者是否煩躁不安 (Catanzaro, 1994)、憂鬱症及對自身情緒的因應能力 (Mearns, 1991) 也具有良好的辨別效度。

(4) 需求威脅量表 (Need Threat Scale) (Williams et al., 2000 ; van Beest & Williams, 2006)

需求威脅量表為 Williams 等人 (2000) 為評估社會排斥對需求威脅所發展的量表，量表依據歸屬、自尊、控制及有意義的存在等四個基本區分為四個子部分，以測量個體各需求被滿足的程度，來瞭解受測者經歷社會排斥後需求威脅的程度。各子部皆有部分屬於反向題，每部分各五題共二十題，每題以五點量尺進行填答 (1 完全不符合至 5 非常符合)，分數越高代表該需求越滿足。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 $\alpha$ =0.97 (van Beest & Williams, 2006)。

### 3.2 電腦化丟球遊戲流程

社會排斥作業 (電腦化傳球遊戲作業) 之實驗材料說明如下：

電腦化丟球遊戲設計出社會拒絕的情境，參與者是否可以一起參與互相傳球的遊戲，是一種虛擬的傳球遊戲，參與者與兩位虛擬電腦玩家一起參加遊戲作業。在這個遊戲裡，一開始，三方人員一起玩傳球遊戲，一方是參與者，另外二方是虛擬電腦玩家 (實驗一開始會安排二個人員，假裝在另外二間實

驗室，一起參加實驗)，實驗進行約三分之二(公平遊戲區段，108 個嘗試)後，兩位電腦虛擬只會互相丟球給對方，將參與者排除在遊戲之外(排除區段，47 個嘗試)。參與者的手會在出現在螢幕的正下方，電腦虛擬玩家分別出現在螢幕的左方及右方，同時註明姓名，參與者可以使用左鍵及右鍵去選擇要丟給左邊還是右邊的玩家。球會有隨機的不同飛行路徑，以及類似球移動的聲音。為了讓參與者相信，他是與兩個真人在玩線上遊戲，參與者被告知正前方有螢幕，其他兩位玩家可以看到他，整個實驗需進行 10 分鐘。這種被排除的經驗對參與者造成負面情緒，腦波實驗後，請參與者填寫需求威脅量表。在實驗完成之後，參與者及父母都會被告知實驗設計目的，以及其他二名玩家是虛擬的訊息，以消除因實驗引起的負面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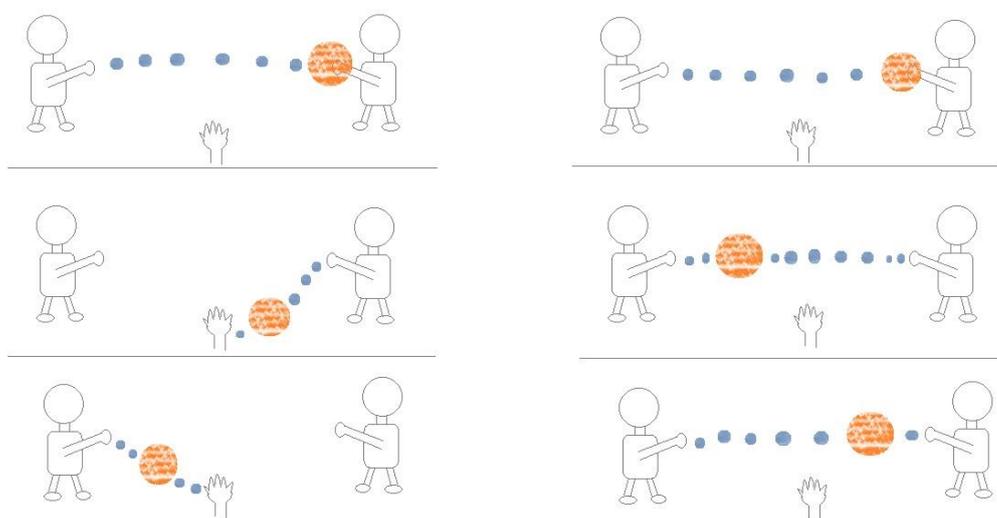


圖 1：社會排斥作業（電腦化傳球遊戲作業）之實驗流程。三方人員一起玩傳球遊戲，一方是參與者，另外二方是虛擬電腦玩家，實驗先進行公平傳球遊戲後，參與者會被排除在遊戲之外(排除區段)。

個體於經歷電腦化丟球遊戲時，相較於未經歷者，其負向情緒感受、四種基本需求受威脅的程度皆達顯著差異 ( $p < .05$ )，且上述之現象不因其他虛擬玩家背景的不同（與自己政治立場相似、與自己政治立場相異、被公眾所厭惡者如 3K 檔）而有所差異 (Williams & Jarvis, 2006)，也不因所接投的物體（如炸彈）或投球附加的不良後果（被告知所獲得的實驗酬賞將因接投球次數而減少）而影響此遊戲誘發社會排斥感受的效果 (van Beest & Williams, 2006)。但遊戲參與者若先以其他方式誘發其具社會排斥感受，則進行遊戲時之負向情緒、四種需求受威脅之程度與未經歷遊戲者沒有差異 (Zadro et al., 2004)，支持電腦化丟球遊戲會誘發參與者產生社會排斥感受。此外，進行遊戲的同時，以磁核共振技術同步測量遊戲參與者大腦內血流量，發現參與者與痛覺有關之腦區（前扣帶迴,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明顯多於未參與者 (Eisenberg, Lieberman, & Williams, 2003)，證實參與者進行遊戲時自陳的苦惱、負向情緒感受。綜合上述，顯示電腦化丟球遊戲能有效地誘發參與者之社會排斥感受。

### 3.3 實驗程序：

實驗分成三個階段進行，說明如下：

階段一：先向參與者介紹實驗程序並填寫實驗同意書，並且在取得其家長同意書上的同意後，才開始進行實驗。

階段二：施行瑞文氏圖形推理測驗以及上述(1)至(3)量表。

階段三：進行電腦化丟球遊戲(社會排斥作業)後，請參與者填  
答量表(4)-需求威脅量表。

階段四：實驗結束後，向參與者說明實驗過程及目的。

### 3.4 參與者篩選方式：

本研究以桃園少年輔育院的青少犯與新北市高中男性青少年為研究對象，參與者分別為實驗組（14 名少年輔育院的暴力青少年犯）、對照組 1（14 名少年輔育院的非暴力青少年犯）與對照組 2（14 名一般高中生）。青少年暴力犯的定義為曾經犯下一次以上的傷害等暴力犯罪，並且犯罪需在不同的時間點發生。他們是重複性的犯罪，暴力行為是使用雙手、刀或是棍棒方式傷害受害者。這些實驗參與者並不會包括情殺、強盜殺人及強暴殺人，並且如果犯人在犯案中有服藥或飲酒也不會包括在本實驗中。控制組的參與犯人，必須不能有暴力行為史。實驗組為犯下普通傷害、加重傷害、殺人未遂、殺人等暴力犯罪。對照組是與實驗組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經過配對，對照組 1 是犯下竊盜、詐欺、偽造文書、販賣毒品等非暴力犯罪，若過去曾經犯下暴力犯罪或自陳曾表現暴力行為（如言語辱罵或肢體毆打他人）皆予以排除；對照組 2 則選取無暴力行為犯罪紀錄及自陳無任何暴力行為之一般高中生，並以官方資料、簡短訪談與年齡作為篩選依據。所有的參與者於研究者親自詳實說明研究目的、實驗流程、參與者應有的權利和義務及注意事項後，自願參與研究，且需其法定監護人簽署同意書後（實驗組及對照組 1 由桃園少輔院寄至法定監護人住處，待監

護人簽署同意後寄回桃園少輔院)，始進行實驗，本研究之實驗流程及參與同意書皆經由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同意。

實驗組平均年齡為  $18.0 \pm 1.3$  歲、對照組 1 平均年齡為  $17.1 \pm 1.9$  歲，對照組 2 平均年齡為  $17.1 \pm 1.1$  歲，三組年齡無顯著差異 ( $F_{(2,39)}=1.72, p=0.19$ )。在智力測驗方面，進行組間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實驗組瑞文氏智力量表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 分數為  $16.5 \pm 3.4$ ，對照組 1 分數為  $17.1 \pm 3.9$ ，對照組 2 分數為  $17.6 \pm 3.5$ ，三組分數未達顯著差異 ( $F_{(2,39)}=0.31, p=0.73$ )，排除高階分析推理及流體智力 (fluid intelligence) 對研究結果的影響 (Carpenter, Just, & Shell, 1990)，顯示對電腦化丟球遊戲的理解並非影響研究結果的關鍵因素。

所有實驗參與者皆具有正常視力或矯正後之正常視力，並再次確認已瞭解實驗流程、注意事項、應有的權利義務 (若有任何不適可隨時依其意願終止參與實驗) 後，始進行實驗，48 名參與者慣用手皆為右手，並且無精神病史與腦部受傷的紀錄。

## 肆、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發現在反應-主動攻擊行為量表中，實驗組之主動型攻擊行為平均分數為  $8.79 \pm 3.93$ ，對照組 1 的平均分數為  $3.07 \pm 1.86$ ，對照組 2 的平均分數為  $2 \pm 2.45$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各組平均分數達顯著 ( $F_{(2, 39)} = 22.48, p < .001, \eta^2 = 0.5354 > 0.138$ , 屬於高效果量, Cohen(1988))，事後比較則顯示

實驗組分數高於對照組 1 及對照組 2；實驗組之反應型攻擊行為之平均分數為  $11.86 \pm 3.61$ ，對照組 1 的平均分數為  $6.5 \pm 1.22$ ，對照組 2 的平均分數為  $2.84 \pm 0.76$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各組平均分數達顯著 ( $F_{(2, 39)} = 19.85, p < .001, \eta^2 = 0.5221$ )，事後比較則顯示實驗組分數高於對照組 1 及對照組 2。在負面情緒調節量表中，實驗組平均分數為  $89.57 \pm 15.4$ ，對照組 1 的平均分數為  $103.14 \pm 12.95$ ，對照組 2 的平均分數為  $104.57 \pm 11.84$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各組平均分數達顯著 ( $F_{(2, 39)} = 5.28, p = .009, \eta^2 = 0.7869$ )，事後比較則顯示實驗組分數低於對照組 1 及對照組 2。在拒絕敏感度上，三組在拒絕敏感度之焦慮及憤怒分量表上，未達顯著差異。在需求威脅量表上，實驗組在歸屬感之平均分數為  $14.79 \pm 3.64$ ，對照組 1 的平均分數為  $15.64 \pm 3.45$ ，對照組 2 的平均分數為  $19.57 \pm 3$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各組平均分數達顯著 ( $F_{(2, 39)} = 7.99, p = .001, \eta^2 = 0.7093$ )，事後比較則顯示實驗組分數低於對照組 1 及對照組 2。實驗組於有意義存在之平均分數為  $16.21 \pm 2.91$ ，對照組 1 的平均分數為  $17.36 \pm 3.6$ ，對照組 2 的平均分數為  $19.43 \pm 3.48$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各組平均分數達顯著 ( $F_{(2, 39)} = 4.3, p = .021, \eta^2 = 0.8192$ )，事後比較則顯示實驗組分數低於對照組 2。其餘各分量表，各組間分數則未達顯著差異(表一)。

表一：三組參與者之反應-主動攻擊行為問卷、排斥敏感度問卷、負面情緒調節量表及需求威脅量表之平均分數及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驗組	對照組 1	對照組 2
主動型攻擊分數	8.79 <sup>*,+</sup> (3.93)	3.07 <sup>*</sup> (1.86)	2.00 <sup>+</sup> (2.45)
反應型攻擊行為分數	11.86 <sup>*,+</sup> (3.61)	6.50 <sup>*</sup> (1.22)	5.93 <sup>+</sup> (2.84)
攻擊行為總分	20.64 <sup>*,+</sup> (6.89)	9.57 <sup>*</sup> (2.71)	7.93 <sup>+</sup> (4.81)
負向情緒調控分數	89.57 <sup>*,+</sup> (15.40)	103.14 <sup>*</sup> (12.95)	104.57 <sup>+</sup> (11.84)
歸屬感	14.79 <sup>*,+</sup> (3.64)	15.64 <sup>*</sup> (3.45)	19.57 <sup>+</sup> (3)
自尊	15.71 (2.67)	16 (1.61)	17.36 (2.24)
有意義的存在	16.21 <sup>*</sup> (2.91)	17.36 (2.21)	19.43 <sup>*</sup> (3.48)
控制	14.43 (3.2)	15.43 (2.38)	17.07 (4.48)
焦慮	8.29 (4.11)	6.57 (2.43)	9.38 (3.98)
憤怒	8.69 (3.73)	6.55 (1.78)	6.88 (2.84)

<sup>\*,+</sup>  $p < .05$

在相關結果上，發現對照組 2 之拒絕敏感度之焦慮分數與反應型攻擊行為有顯著正相關( $r=0.59, p =.03, R^2=0.3481>0.3$ ，屬於中等效果量, Cohen(1988))，負向情緒調節與憤怒 ( $r=-.58, p =.03, R^2=0.3364$ )、負向情緒調節與主動型攻擊行為 ( $r=-0.58, p =0.03, R^2=0.3364$ )有顯著負相關，其餘各變項間相關未達顯著，實驗組與對照組 1 之上述各變項間皆未達顯著相關 (表二)。

表二：三組參與者之反應-主動攻擊行為問卷、排斥敏感度問卷、負面情緒調節量表及需求威脅量表之相關。

變項	(相關係數/P 值)		
	實驗組	對照組 1	對照組 2
主動型攻擊行為與焦慮	0.46	0.21	0.23
主動型攻擊行為與憤怒	0.09	0.54	0.07
反應型攻擊行為與焦慮	0.22	0.99	0.59/0.03*
反應型攻擊行為與憤怒	0.08	0.89	0.07
負向情緒調控與焦慮	0.09	0.35	0.36
負向情緒調控與憤怒	0.16	0.75	-.58/0.03*
負向情緒調控與主動型攻擊行為	0.89	0.67	-.58/0.03*
負向情緒調控與反應型攻擊行為	0.16	0.86	0.35

\*  $p < .05$

## 伍、討論

本研究目的欲瞭解這些暴力行為青少年會去犯下的暴力犯罪是因為過度在意負面事件，例如，拒絕敏感度過高，亦或是他們面對社會排斥事件產生過強之憤怒或焦慮情緒反應，加

上負面情緒調節能力不佳，因而容易產生人際間之衝突，最後導致攻擊行為發生。本研究同時操弄社會排斥實驗情境，欲瞭解社會排斥如何影響其歸屬、自尊、控制及有意義的存在之基本需求，其與暴力行為發生之相關性。本研究比較暴力青少年、非暴力犯罪組與一般高中生組之主動-反應性攻擊行為高低、排斥敏感度高低、負向情緒調控能力以及經歷社會排斥相關的電腦化丟球遊戲後，其感受社會排斥後之威脅-需求量表分數差異，來瞭解攻擊行為產生的相關因素。研究結果發現暴力青少年於攻擊行為傾向上，主動性及反應性攻擊分數皆顯著高於兩個對照組，亦即本研究中之實驗組參與者之攻擊行為是混合主動及反應型攻擊行為。在拒絕敏感度上，本研究中之三組拒絕敏感度分數無顯著差異，且三組無論於憤怒或焦慮分數上，皆未明顯高於其他文獻中一般人之平均值（焦慮： $8.16 \pm 3.91$ ，憤怒： $8.34 \pm 4.26$ ，Downey et al., 1998），顯示本研究之實驗組並非有較高的拒絕敏感度。過去的研究指出拒絕敏感度與反應型攻擊行為發生有關（Jacobs & Harper, 2013），在相關的結果上，本研究發現只有對照組 2 的拒絕敏感度之焦慮分數與反應型攻擊行為有顯著正相關，這可能是對一般人來說，焦慮可能會引發反應性攻擊行為（Vitaro, Brendgen, & Tremblay, 2002），特別是對親密伴侶預期性拒絕所引發的焦慮，將藉由攻擊行為來對抗自身所面臨的威脅（Downey & Feldman, 1996; Downey et al., 1998），或依此預防伴侶的拒絕（Ayduk, et al, 2003; Purdie & Downey, 2000）。本研究控制組之拒絕敏感度與攻擊行為之關係支持先前研究，但暴力青少年與非暴力青少年組無論主動型或反應型攻擊行為皆與拒絕敏感度並無相關。此

可能為本研究中暴力青少年無論主動型或反應型攻擊分數皆顯著高於二組對照組，且暴力犯罪組反應型及主動型攻擊行為分數皆高於其他文獻中之平均（反應型:11.86 vs. 7.14，主動型:8.79 vs. 2.79, Raine et al., 2006），因而推測這些青少年攻擊行為不純粹屬於反應型攻擊行為，因此其拒絕敏感度之關聯性較低 (Jacobs & Harper, 2013)。

在負向情緒調節能力上，暴力青少年顯著低於兩對照組，暴力青少年組之負向情緒調節能力較弱。情緒調節能力對被排斥者因應排斥有其重要性，越佳的情緒調節能力常伴隨較佳的社交品質及人際關係 (Lopes, Salovey, Cote, & Beers, 2005)，若情緒調節能力失能 (emotion dysregulation) 則個體無法對人際互動所衍生壓力作出適當的反應 (Baumeister, Bratslavsky, Muraven, & Tice, 1998)。情緒調節失能可能影響情緒覺察能力、不瞭解或接受他人所展現的情緒訊息、對自身情緒表達與掌控有困難，及對自身情緒激發的調節能力不足 (Gratz & Roemer, 2004)，因而常表現出較多負向情緒。依據一般攻擊理論模式，個體內在歷程將以自動化評估決定攻擊行為是否產生，只要個體無法有效處理另其感到不舒服的情緒，皆將使個體更容易產生攻擊行為 (Anderson & Bushman, 2002)。反應型攻擊行為常因個體有憤怒感受而產生 (Novaco, 2007)，且憤怒感受越強烈越容易產生攻擊行為 (Wilkowski & Robinson, 2010)。在負向情緒調節能力相關結果上，發現控制組的負向情緒調節分數與拒絕敏感度之憤怒情緒反應，及負向調節分數與主動型攻擊行為間有顯著的負相關，顯示個體若負向情緒調

節能力較差，面對威脅時所展現出的憤怒更趨明顯，或更容易產生攻擊行為。此結果支持對一般人而言，負向情緒調節能力較差者，被社會拒絕時易引發憤怒反應的產生 (Leary et al., 2003)，或依此產生攻擊行為(Rathert et al., 2011)。主動型攻擊行為相對於反應型，攻擊行為的產生是為達到自身的目標或願望，偏向冷血式行動 (Camodeca & Goossens, 2005)，與行為達到目的所喚起正向情緒感受有正相關，反而與負向情緒調節有負相關 (Castro et al., 2005)。但本研究未於暴力犯罪組與非暴力犯罪組上觀察到此現象，因而推測青少年犯罪者攻擊行為與負向情緒調節能力之關係，可能不同於一般人，此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除了負向情緒的調節、抑制能力較差者，較容易產生攻擊行為之外，過於壓抑自身的情緒，也將隨時間累積導致較強烈的憤怒情緒，而產生攻擊行為 (Blackburn, 1986)，此意味著無論展現強烈憤怒感受或不顯現任何憤怒感受 (過度抑制憤怒) 皆促使個體產生攻擊行為。參與本研究之暴力青少年經歷社會排自後，也可能因已在服刑學習需收斂憤怒而未明顯展現此情緒，因抑制或避免展現憤怒而產生攻擊行為 (Norstrom & Pape, 2010 ; Tull et al., 2007)。此外，情緒調節能力較差者也代表其對未來結果的預測能力不佳，無法有效調整自身行為來為自己謀取較大的利益，容易因偶發性的不如意事件而展現出自動化的防衛反應 (Anderson et al., 1999)，也不擅於擷取環境刺激的情緒意涵 (Bufkin & Luttrell, 2005)，這些暴力青少年可能不清楚由社會排斥所誘發攻擊行為，會惡化人際關係並加深社會排

斥。

在需求威脅上，暴力青少年經歷社會排斥後，歸屬感分量表分數顯著低於兩個對照組，有意義存在需求分量表分數顯著低於控制組，其餘基本需求受威脅程度與兩對照組間則沒有差異。在相關的結果上，僅控制組在拒絕敏感度之焦慮分數與反應型攻擊行為有顯著正相關，拒絕敏感度之憤怒分數與負向情緒調節分數有顯著負相關，以及負向情緒調控分數與主動型攻擊行為分數達顯著負相關。依據一般攻擊模式之情境條件包含挫折事件或於同儕團體中所處的地位 (Coie, Dodge, & Coppotelli, 1982) 皆可能影響攻擊行為的產生，青少年攻擊行為產生與同儕社會拒絕具關聯性 (Dodge & Coie, 1987)，青少年將依據對自身社交經驗之評估與解釋決定是否產生攻擊行為 (Jacobs & Harper, 2013)。因此，若個體長期因被同儕團體所忽視，深受社會拒絕之威脅，社會拒絕可能誘發攻擊行為產生，攻擊行為可能與同儕相處時的衝突有關 (Poulin & Boivin, 2000)，因而加深社會並拒絕陷入衝突-攻擊行為-衝突之惡性循環。本研究發現暴力青少年經歷社會排斥後，歸屬感及有意義存在需求明顯受到威脅，過去研究發現被排斥者對族群的缺乏歸屬感、表現低自尊、喪失人際互動時的控制，及自認對群體毫無價值或他人將對自己視而不見 (Carter-Sowell, Chen, & Williams, 2008 ; Eisenberger et al., 2003; Lakin, Chartrand, & Arkin, 2008 ; Williams et al., 2000; Zadro et al., 2004)。

經歷社會排斥後，暴力青少年歸屬感及有意義存在需求受到威脅，這些青少年因暴力或攻擊行為不易與他人有親密、良

好的社交互動 (Twenge et al., 2007) 而未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Katz et al., 2002)。由於本研究程序未提供機會給予被排斥者向排斥者展現其能力，暴力青少年沒有機會給予排斥者回饋，或掌握/影響排斥者對其評價 (Warburton, Williams, & Cairns, 2006 ; Manner et al., 2007)來因應社會排斥，虛擬化的社會排斥經歷仍可明顯惡化暴力青少年的歸屬感滿足。有意義存在需求為暴力青少年經歷社會排斥後，另一明顯受到威脅之需求，這些青少年可能藉由展現暴力，謀求群體、社會對其的注意，來獲得有意義存在需求之高度滿足，以滿足有意義存在之需求來因應排斥，的確為被排斥者經常直接採用的策略 (Williams & Nida, 2011)。

## 陸、結論與研究限制

綜合上述，暴力青少年於攻擊行為傾向上，無論主動性及反應性攻擊分數皆顯著高於兩個對照組，在拒絕敏感度上，三組於焦慮及憤怒各分量表分數上未達顯著差異。在負向情緒調節能力上，暴力青少年顯著低於兩對照組，暴力青少年可能無法有效處理另其感到不舒服的情緒，容易產生攻擊行為。在需求威脅上，暴力青少年經歷社會排斥後，暴力青少年歸屬感及有意義存在需求受到威脅，這些青少年可能藉由展現暴力，謀求群體、社會對其的注意，來獲得有意義存在需求之高度滿足，以滿足有意義存在之需求來因應排斥，導致產生攻擊行為的原因之一。本研究的受試者為未成年之青少年，受限於監護人同意書取得不易，在人數上尚屬小樣本。目前有行為資料，希冀後續研究結合腦波等腦造影技術的優點，瞭解暴力行為相

關的神經生物機制，以得到更豐富的研究資料。

## Reference

- Anderson, C. A., & Bushman, B. J. (2002). Human agg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27–51.
- Anderson, S. W., Bechara, A., Damasio, H., Tranel, D., & Damasio, A. R. (1999). Impairment of social and moral behavior related to early damage in human prefrontal cortex. *Nature Neuroscience, 2*, 1032-1037.
- Ayduk, O., Downey, G., Testa, A., Yen, Y., & Shoda, Y. (1999). Does rejection elicit hostility in rejection sensitive women? *Social Cognition, 17*, 245–271.
- Ayduk, O., Gyurak, A., & Luerssen, A. (2008).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rejection–aggression link in the hot sauce paradigm: The case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 775-782.
- Ayduk, O., May, D., Downey, G., & Higgins, E. T. (2003). Tactical differences in coping with rejection sensitivity: The role of prevention prid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 435-448.
- Baumeister, R. F., Bratslavsky, E., Muraven, M., & Tice, D. M. (1998). Ego depletion: Is the active self a limited resource? *Personality Processe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4*, 1252-1265.
- Baumeister, R. F., & DeWall, C. N. (2005). Inner disruption following social exclusion: Reduced intelligent thought and

self-regulation failure. In K. D. Williams, J. P. 16 Forgas, & W. von Hippel (Eds.), *The social outcast: Ostracism, social exclusion, rejection, and bullying* (pp. 53-73).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Baumeister, R. F., & Leary, M. R. (1995).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7*, 497–529.

Blackburn, R. (1986). Patterns of personality deviation among violent offenders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an empirical taxonom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6*, 254-269.

Blair, R. J. R. (2001). Neurocognitive models of aggression, the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s, and psychopathy. *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Psychiatry*, *71*, 727-731. doi:10.1136/jnnp.71.6.727.

Bufkin, J. L., & Luttrell, V. R. (2005). Neuroimaging studies of aggressive and violent behavior: current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for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Trauma, Violence, & Abuse*, *6*, 176-191.

Buhs, E. S., & Ladd, G. W. (2001). Peer rejection in kindergarten as an antecedent of young children's school adjustment: An examination of mediating process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7*, 550–560.

Camodeca, M., & Goossens, F. A. (2005). Aggression, social cognitions, anger and sadness in bullies and victim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6*, 186-197.

- Carter-Sowell, A. R., Chen, Z., & Williams, K. D. (2008). Ostracism increases social susceptibility. *Social Influence, 3*, 143–153.
- Cohen, J. (1988).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 NJ: Erlbaum.
- Carpenter, P. A., Just, M. A., & Shell, P. (1990). What one intelligence test measures: A theoretical account of the processing in the Raven progressive matrices test. *Psychological Review, 97*, 404-431.
- de Castro, B. O., Merk, W., Koops, W., Veerman, J. W., & Bosch, J. D. (2005). Emotions in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referred aggressive boys.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24*, 105-116.
- Case, T. I., & Williams, K. D. (2004). Ostracism: A metaphor for death. In J. Greenberg, S. L. Koole, & T. Pyszczynski (Eds.),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xistential psychology* (pp. 336-351). New York, NY: Guilford.
- Catanzaro, S. J. (1994). Discrimination of mood regulation expectancies from dysphori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tic findings. *Assessment, 1*, 53-58.
- Catanzaro, S. J., & Mearns, J. (1990). Measuring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Initial scale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4*, 546-563.

- Coie, J. D., Dodge, K. A., & Coppotelli, H. (1982). Dimensions and types of social status: A cross-age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8*, 557-570.
- Deater-Deckard, K. (2001). Annotation: Recent research examining the role of peer relationship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42*, 565-579.
- Dewall, C. N., Macdonald, G., Webster, G. D., Masten, C. L., Baumeister, R. F., Powell, C., Combs, D., Schurtz, D. R., Stillman, T. F., Tice, D. M., & Eisenberger, N. I. (2010). Acetaminophen reduces social pain: behavioral and neur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931-937. doi: 10.1177/0956797610374741.
- Dickerson, S. S., & Kemeny, M. E. (2004). Acute stressors and cortisol responses: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synthesis of laboratory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0*, 355-391.
- Dodge, K. A., Coie, J. D. (1987). Social-information-processing factors in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children's peer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 1146-1158.
- Dodge, K. A., Lansford, J. E., Burks, V. S., Bates, J. E., Pettit, G. S., Fontaine, R., & Price, J. M. (2003). Peer rejection and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gressive behavior problems in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74*, 374-393.

- Dodge, K. A., Lochman, J. E., Harnish, J. D., Bates, J. E., & Pettit, G. S. (1997).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school children and psychiatrically impaired chronically assaultive youth.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6*, 37-51.
- Downey, G., & Feldman, S. I. (1996). Implication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fo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1327-1343.
- Downey, G., Feldman, S., & Ayduk, O. (2000).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male violence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7*, 45-61.
- Downey, G., Lebolt, A., Rincon, C., & Freitas, A. L. (1998).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difficulties. *Child Development, 69*, 1074-1091.
- Eisenberger, N. I., Lieberman, M. D., Williams, K. D. (2003). Does rejection hurt? An fMRI study of social exclusion. *Science, 302*, 290-292.
- Feldman, S., & Downey, G. (1994). Rejection sensitivity as a mediator of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exposure to family violence on adult attachment behaviour.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6*, 231-247.
- Fergusson, D. M., Horwood, L. J., & Ridder, E. (2005). Show me the child at seven: The consequences of conduct problems in childhood for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in adulthood.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6*, 837-849.
- Gardner, W. L., & Pickett, C. L., & Knowles, M. L. (2005). Social

"snacking" and social "shielding": The satisfaction of belonging needs through the use of social symbols and the social self. In K. Williams, J. Forgas, and W. von Hippel (Eds.), *The social outcast: Ostracism, social exclusion, rejection, and bullying*(pp. 227-241).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Grusec, J. E., & Lytton, H. (1988). *Social Development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Gratz, K. L., & Roemer, L. (2004).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ysregulation: Development, factor structure,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36, 41-54.

Harterink, C. H. J., van Beesrt, I., Wicherts, J. M., Williams, K. (2015). The ordinal effect of ostracism: a meta-analysis of 120 cyberball studies. *Plos One*, 10: e0127002. Doi:10.1371/journal.pone.0127002

Henderson, M., Hewstone, M. R. (1984). Prison inmates' explan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violence: Accounts and attribution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2, 798-794.

Huesmann, L. R. (1998). The role of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cognitive schema in the acquis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habitual aggressive behavior. In R. G. Geen & E. Donnerstein (Eds.), *Human aggression: Theories*,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policy* (pp. 73-109).  
San Diego,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IJzerman, H., Gallucci, M., Pouw, W. T. J. L., Weißgerber, S. C.,  
Van Doesum, N. J., Williams, K. D.  
(2012). Coldblooded loneliness: social exclusion leads to  
lower skin temperatures. *Acta Psychologica*, *140*, 283-288.  
doi: 10.1016/j.actpsy.2012.05.002.

Jacobs, N., & Harper, B. (2013). The effect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on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Aggression  
Behavior*, *39*, 3-12.

Jamieson, J. P., Harkins, S. G., Williams, K. D. (2010). Need  
threat can motivation performance after  
ostracis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  
690-702.

Katz, J., Kuffel, S. W., Coblenz, A. (2002). Are the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sustaining dating violence? An examination of  
frequency, severity,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7*, 247-271.

Kirsch, I. (1985). Response expectancy as determinant of  
experience and behavior.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1189-1202.

Ladd, G. W. (2006). Peer Rejection, Aggressive or Withdrawn  
Behavior, and Psychological Maladjustment from Ages 5 to  
12: An Examination of Four Predictive Models. *Child  
Development*, *77*, 822-846.

- Ladd, G. W., Herald-Brown, S. L., & Reiser, M. (2008). Does chronic classroom peer rejection predi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during the grade school years? *Child Development, 79*, 1001-1015.
- Ladd, G. W., Troop-Gordon, W. (2003). The role of chronic peer diffi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roblems. *Child Development, 74*, 1344-1367.
- Lakin, J. L., Chartrand, T. L., & Arkin, R. M. (2008). I am too just like you: nonconscious mimicry as an automatic behavioral response to social exclus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 816-822. doi: 10.1111/j.1467-9280.2008.02162.x.
- Leary, M. R., Haupt, A. L., Strausser, K. S., & Chokel, J. T. (1998). Calibrating the sociome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appraisals and state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1290-1299.
- Leary, M. R., Kowalski, R. M., Smith, L., & Phillips, S. (2003). Teasing, rejection, and violence: Case studies of the school shootings. *Aggressive Behavior, 29*, 202-214.
- London, B., Downey, G., Bonica, C., & Paltin, I. (2007). Soci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7*, 481-506.
- Lopes, P. N., Salovey, P., Cote, S., & Beers, M. (2005).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ies and the quality of social interaction. *Emotion, 5*, 113-118.
- Lustenberger, D. E., & Jagacinski, C. M. (2010).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ostracism on performance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Human Performance*, 23, 283–304.

Maner, J. K., DeWall, C. N., Baumeister, R. F., & Schaller, M. (2007). Does social exclusion motivate interpersonal reconnection? Resolving the “porcupine probl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 42-55.

Mearns, J. (1991). Coping with a breakup: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expectancies and depression following the end of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327-334.

Nezlek, J. B., Kowalski, R. M., Leary, M. R., Blevins, T., & Holgate, S. (1997). Personality moderators of reactions to interpersonal rejection: Depression and trait self-estee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3, 1235-1244.

Norstrom, T., & Pape, H. (2010). Alcohol, suppressed anger and violence. *Addiction*, 105, 1580-1586.

Novaco, R. W. (2007). Anger dysregulation. In T. A. Cavell & K. T. Malcolm (Eds.), *Anger, aggression and interventions for interpersonal violenc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atrick, C. J. (2001). Emotional processes in psychopathy. In: A. Raine & J. Sanmartin (Eds.), *Violence and Psychopathy* (pp. 57-77). New York: Kluwer/Plenum.

Pickett, C. L., & Gardner, W. L. (2005). The Social Monitoring System: Enhanced Sensitivity to Social Cues as an Adaptive

Response to Social Exclusion. In K. D. Williams, J. P. Forgas, von William, H. (Eds), *The social outcast: Ostracism, social exclusion, rejection, and bullying. Sydney Symposium of Social Psychology series* (pp. 213-226).New York, NY, PsychologyPress.

Poulin, F&Boivin,M.(2000).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Evidence of a Two-Factor Model.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2*, 115-122.

Purdie, V., & Downey, G. (2000).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adolescentgirls'vulnerability to relationship-centered difficulties.*ChildMaltreatment, 5*, 338-349.

Raine, A.,Dodge, K.,Loeber, R.,Gatzke-Kopp, L.,Lynam, D.,Reynolds, C.,Stouthamer-Loeber, M.,&Liu, J.(2006).The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Differential Correlates of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 Boys.*Aggressive Behavior, 32*, 159-171.

Raine, A., Meloy, J. R., Bihrlle, S., Stoddard, J., LaCasse, L., Buchsbaum, M. S. (1998).Reduced prefrontal and increased subcortical brain functioning assessed usin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in predatory and affective murderers.*Behavioral Sciences& the Law, 16*, 319–332.

Rathert, J., Fite, P., &Gaertner, A. (2011).Associations between effortfulcontro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proactive and reactiveaggression.*Child Psychiatry Human Development, 42*, 609-621.

- Riva, P., Romero-Lauro, L. J., Dewall, C. N., & Bushman, B. J. (2012). Buffer the pain away: stimulating the right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reduces pain following social exclus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 1473–1475. doi:10.1177/0956797612450894.
- Rotge, J-Y., Lemogne, C., Hinfrey, S., Huguet, P., Grynszpan, O., Tartour, E., George, N., & Fossati, P. (2014). A meta-analysis of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ntribution to social pai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 Neuroscience*, 10, 19-27. doi: 10.1093/scan/nsu110.
- Steele, C. M. (1988). The psychology of self-affirmation: Sus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self. In L. Berkowitz (Ed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pp. 261–30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anokashira, D., Morita, T., Hayashi, K., Mayanagi, T., Fukumoto, K., & Kubota, Y., Yamashita, T., & Sobue, K. (2012). Glucocorticoid suppresses dendritic spine development mediated by down-regulation of caldesmon expressio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2, 14583-14591. doi: 10.1523/JNEUROSCI.2380-12.2012.
- Tull, M. T., Jakupcak, M., Paulson, A., & Gratz, K. L. (2007). The role of emotional inexpressivity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 severity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among men

exposed to interpersonal violence. *Anxiety, Stress, and Coping*, 20, 337-351.

Twenge, J. M., Baumeister, R. F., DeWall, C. N., Ciarocco, N. J., Bartels, J. M. (2007). Social exclusion de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 56-66.

vanBeest, I., Carter-Sowell, A. R., van Dijk, E., Williams, K. D. (2012). Groups being ostracized by groups: Is the pain shared, is recovery quicker, and are groups more likely to be aggressive?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6, 241-254.

vanBeest, I., & Williams, K. D. (2006). When inclusion costs and ostracism pays, ostracism still hur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1, 918-928.

Vitaro, F., Brendgen, M., & Tremblay, R. E. (2002). Reactively and proactively aggressive children: Antecedent and subsequent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3, 495-505.

Warburton, W. A., Williams, K. D., & Cairns, D. R. (2006). When ostracism leads to aggress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ntrol depriv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2, 213-220.

Watson, D., Clark, L. A., & Tellegen, A. (198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1063-1070.

Wesselmann, E.D., Butler, F.A., Williams, K.D., & Pickett, C.L.(2010). Adding injury to Insult: Unexpected rejection leads to more aggressive responses. *Aggressive Behavior*, 35, 1-6.

Wilkowski, B. M., & Robinson, M. D. (2008). The cognitive basis of trait anger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2, 3-21.

Wilkowski, B. M., & Robinson, M. D. (2010). The anatomy of anger: An integrative cognitive model of trait anger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8, 9-38.

Williams, K. D. (1997). Social ostracism. In R. Kowalski (Eds.), *Aversive interpersonal behaviors* (pp. 133-170). New York: Plenum.

Williams, K. D. (2009). Ostracism: a temporal need-threat model. *Adv Exp Soc Psychol*, 41, 275-314.

Williams, K. D., Cheung, C. K. T., & Choi, W.(2000). Cyber Ostracism: Effects of being ignored over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 748-762.

Williams, K. D., & Jarvis, B. (2006). Cyberball: A program for use in research on interpersonal ostracism and acceptance.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38, 174-180.

Williams, K. D., & Nida, S .A. (2011). Ostracism: consequences

and coping.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 71-75.

Williams, K. D., & Zadro, L. (2005). Ostracism: The indiscriminate early detection system. In K. D. Williams, J. P. Forgas, & W. von Hippel (Eds.), *The social outcast: Ostracism, social exclusion, rejection, and bullying*(pp. 19-34) New York: The Psychology Press

Zadro, L., Boland, C., Richardson, R. (2006). How long does it last? The persistence of the effects of ostracism in the socially anxiou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2, 692–697.

Zadro, L., Williams, K. D., & Richardson, R. (2004). How low can you go? Ostracism By computer is sufficient to lower self-reported levels of belonging, control, self-esteem, and meaningful existe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0, 560-567.

# 應用多變量迴歸樹分析全國性侵害 通報數據之研究

## The Study and Analysis on National Sexual Assault Reports data through application of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

林宗鍵<sup>\*</sup>、顧以謙<sup>\*\*</sup>、許華孚<sup>\*\*\*</sup>

---

\*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博士

\*\*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副  
研究員，本文通訊作者

\*\*\*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主任、台灣藥物濫用防治研究學會副理事  
長

## 摘要

台灣對於性侵害官方資料的處理，大都只是做數據的呈現，對於性侵害相關的因子鮮少進行較深入的探討，尤其是青少年性侵害的部分，在官方資料的呈現或相關因子的探討上均為有限。本研究為探勘性研究，透過採用多變量迴歸樹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以全國及區域性、加害者、受害者及加受害者兩造間關係等相關屬性為分析變項，呈現全國及區域性、加害者、受害者及加害受害者間相關屬性的關鍵因素，並探勘出與青少年性侵害相關各該分析變項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針對 2008-2014 年「性侵害被害人通報性別案件數」、「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等兩個資料集進行探勘。研究結果發現，犯罪地點方面，以「公共廁所」、「被害人住所」為主要因子；加害人方面，「男性」、「年齡不詳」、「鄰居」為關鍵因子；被害人方面：「男性」、「12-18 歲」、「本國籍原住民」、「職業不詳」、「國中程度」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

本研究建議，政府應宣導青少年、學生留意熟識者之間所為之性侵害案件，另外一方面強化警方針對公共廁所之巡邏，以避免公共廁所成為性侵或性交之熱點。此外，建議地方政府及司法單位重視性侵害事件之處理，尤其針對原住民、男性受害者等易受忽視族群，並應擬定相關政策，強化此些族群之性教育知識及自我保護觀念。

關鍵字：性侵害犯罪、青少年受害者、多變量迴歸樹

## Abstract

In Taiwan, the official sexual assault information is merely a data presentation, but the factors related to sexual assaults are rarely discussed in depth. Especially in the part of teenagers, there are very limited data and factors discussions. This study is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through the method of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 using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data of associated attributes of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oth as variables for analysis to present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key factors of associated attributes between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and explore the key analysis variables of juvenile sexual assault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data of “The gender and number of Reported Cases of Sexual Assault Victims” and “National number of cases per 100,000 people of sexual assault” between years 2008 to 2014.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crime location factors were “public restrooms” and “victims’ residence”; offenders’ key factors were “male”, “age unknown” and “neighbor”. The key factors of the victims were “male”, “12-18 years old”, “national aboriginal”, “occupation unknown” and “middle school as highest education level”, that caus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cases of sexual assaults per 100,000 people between 2008 and

2014.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should advocacy the teenagers and students to be more aware of acquaintance sexual assault cases. On the other hand strengthen police patrols for public restrooms to avoid becoming hot spots of sexual assaults or sexual activities. In addit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judicial units to attach attention when address to the sexual abuse incidents, in particular the vulnerable easily neglected groups like aboriginal and male victims, als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to strengthen the sexual knowledge and self-protection of these ethnic groups.

Keywords : sexual assault, junior victims,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

## 壹、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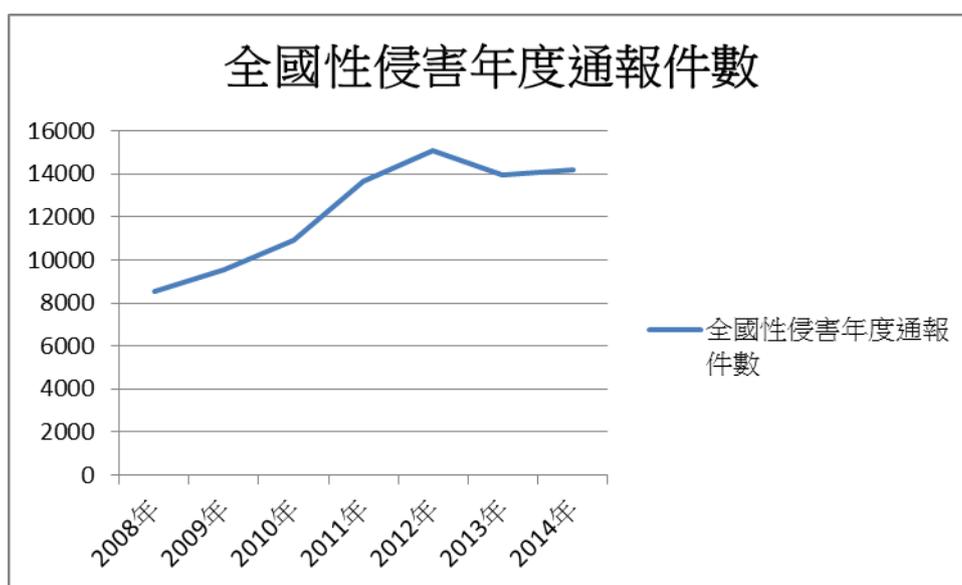
### 一、研究背景

人身安全一向是國人最關注的議題。性侵害是台灣婦女最害怕的犯罪型態之一(刑事調查局, 1993；台灣省政府, 1991；鄭瑞隆, 2006)。根據刑事調查局(1993)的資料顯示，台灣每年的性侵害案件，從 1990 年的 700 件，在短短的幾年間增加到 1000 件。這樣的情形持續的惡化，不但在 2008 年增加到 8521 件，到了 2014 年更增加到 14215 件(圖一，衛生福利部, 2014)。台灣的犯罪學家估計，台灣性侵害案件占所有犯罪案件 10%，也就是每年 7000-10000 件，每天 20-27 件(Hwang, 1995)。最近，台北的婦科醫生認為犯罪學家的估計低於實際值，他們聲稱光是台北市主要醫院，每天至少就有超過 10 件因性侵送急診的通報案件(Cheng, 1995)。姑且不論哪個數據比較接近實際情況，可見性侵害在台灣已經不再是罕見的犯罪案件。

根據衛生福利部 2014 年的資料顯示，在台灣，12-18 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及青少年性侵受害者，占所有性侵受害者 64.3%。12 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性侵受害者占 10.1%。顯示超過六成以上的性侵害受害者為 18 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或青少年。兒童及青少年及青少年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受到性侵害的兒童及青少年及青少年，對未來的人生發展，一定會有不良的影響，值得相關單位重視（衛生福利部，2015）。

另外，一項研究顯示，6.3% 的台灣原住民婦女，童年時期曾受過雙親任一方或雙方在性或身體上的虐待(Yang et al.,

2006)。然而在台灣，針對社區內遭受身體和性侵害青少年的再受害研究卻付諸闕如，通報的案例也會因為不同族群的文化差異，而有程度不同的黑數存在。在在顯示台灣在這方面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圖一 2008-2014 年全國性侵害年度通報件數圖

## 二、研究目的

在台灣，除了對於性侵害犯罪率的報告外，對於性侵害的成因和相關因子的探討仍顯不足。性侵害受害的高風險族群的發現及探討，將有助於未來在性侵害犯罪預防策略上的擬定，並為未來性侵害犯罪的研究導引出一條新的研究方向，因此，性侵害犯罪的相關因子便相當值得深入探究。

本研究研究目的有三：

- (一) 根據全國及區域性的侵害案件進行多變量迴歸樹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 分析，了解影響全國性性害

案件的區域性關鍵因子，並探究其背後的原因。

- (二) 根據性侵害被(加)害者相關屬性案件資料進行多變量迴歸樹(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分析，了解各屬性影響全國性侵害案件的關鍵因子，提供相關單位進行教育及預防策略擬定時的參考。
- (三) 根據性侵害被(加)害者相關屬性案件資料進行多變量迴歸樹(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分析，了解各屬性分析後產生的關鍵因子，並對關鍵因子進行綜合判斷，提供相關單位進行教育及預防策略擬定時的參考。

## 貳、文獻探討

### 一、性侵害的現況

一般來說，兒少性侵害屬於兒少虐待的大宗(International Child Abuse Network, ICAN, 2012；Winton & Mara, 2001)。兒童及青少年由於其年齡及發育程度不足，無法對自己提供足夠的保護。因此，對於性侵害和暴力的防範非常脆弱。為了讓兒童及青少年在身體、心理和社會適應有合適的發展，因此兒童及青少年需要得到特殊的照顧和保護。來自非洲和其他國家的研究結果顯示，兒少性侵害(child and teenager sexual abuse, CSA)目前已經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公共衛生問題(Reza *et al.*, 2009)。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全球學生健康調查的資料顯示 13-15 歲受到性侵害的兒童及青少年，在其一生中再次受到性侵害的比率為 9%到 33%(Brown *et al.*,

2009)。在南非有 3.2%到 7.1% 的受訪者表示，在兒童及青少年時期曾經有非自願或被迫性交的經驗(Lalor, 2004)。透過非洲和西方國家的比較研究後，發現非洲國家的兒少虐待情形，明顯高於西方國家(Mbagaya *et al.*, 2013)。由於發展中國家有關於兒少虐待的資料相對缺乏，Skeen 和 Tomlinson 強調系統化收集兒童及青少年受虐資料的重要性(Skeen & Tomlinson, 2013)。衣索比亞有高比例的兒少性侵害，資料顯示依索比亞西南部學校有高達 68.7%的青少年在兒童及青少年時期有受虐的經驗(Worku *et al.*, 2006)，首都阿迪斯阿貝巴也有 38.5%的民眾在兒童及青少年時期有受虐的經驗(Lakew, 2001)，但受訪者對於是否曾受性侵害則大多不願透露，顯見其真正的情形可能比數據上所呈現的還要來得嚴重。研究顯示，衣索比亞常見的兒少虐待和剝削形式為性暴力(包括性侵害、性騷擾、綁架和賣淫)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Affairs (MOLSA), 2013)。在衣索比亞，兒少性侵害的情況可能是被了解最少，發掘最少的兒少虐待形式。根據 Jemal 的研究，在阿迪斯阿貝巴的兒童及青少年保護單位中，每年受理 1666 件各式各樣的兒少虐待案件，其中有 383(23%)件屬於兒少性侵害(Jemal, 2012)。男性兒童及青少年和女性兒童及青少年都可能成為兒童及青少年虐待的受害者，因為複雜的社會文化問題和性別差異，男性性侵害受害者在衣索比亞鮮少被報導。因此兒少性侵害在衣索比亞的情況很難被實際了解。Haile *et al.*的研究發現，阿迪斯阿貝巴的男性性侵害受害者，在其一生中再次受到性侵害的比率為 4.3%。獨居或未和父母同住的小男孩比較容易受害(Haile *et al.*, 2013)。在研究報告中所顯現的兒少虐待及

疏於照顧情形，可能無法呈現事實的原貌，因為在案件通報上有很多黑數。

## 二、兒少性侵害的影響及特定族群的受害情況

大量的研究顯示，兒童及青少年時期若受到身體或性方面的虐待，會增加青少年及成年時期身、心健康問題的風險 (Brown *et al.*, 1999; Moeller *et al.*, 1993)。和西方社會相比，亞洲社會對於兒童及青少年時期身體或性方面的虐待，顯然鮮少進行探討 (Jirapramukpitak *et al.*, 2005; Lau *et al.*, 2003)，對於兒童及青少年時期遭受身體或性方面虐待的早期鑑定非常重要，臨床上的工作可以提供相關的協助。值得注意的是，兒童及青少年時期的身體或性侵害通常隱藏在家庭中，而且很難被察覺。在中國的社會中，由於對性採取的是節制的文化態度，因此很多性侵害的案件並沒有被通報 (Ho & Kwok, 1991)。在亞洲這種漏報性侵害案件的情形，不僅發生在那些生活在亞洲國家的人們，移民海外的亞裔族群也有同樣的情形 (Meston *et al.*, 1999)。先前的研究發現，在台灣具有慢性頭痛的青少年，經教師訪談後，發現其中的 10% 曾有受虐的經驗 (Juang *et al.*, 2004)，這其中包含為數不詳的性侵害。另一項研究顯示，6.3% 的台灣原住民婦女，童年時期曾受過雙親任一方或雙方在性或身體上的虐待 (Yang *et al.*, 2006)。

除了利用違反受害者意願所進行的性侵害外，利用受害者的不利條件所進行的性交易，也必須視為是一種性侵害。為了生存從事的性交易 (survival sex) 指的是透過賣淫，取得滿足生

存所需物質的行為，這些物質包括居住的處所、食品、藥品或金錢。這種行為對無家可歸的人及青少年產生的後續影響最大。先前的研究發現，無家可歸和逃家的小孩為了生存從事性交易的比例為 10% 到 50% (McCarthy, 1992)。

### 三、性侵害的風險因子

先前的研究顯示，兒童及青少年時期遭受身體和性侵害的許多風險因子，包括性別(Crowley *et al.*, 2003; Thompson *et al.*, 2004)、家庭衝突(Straus *et al.*, 1980)、雙親物質濫用(DeBruyn *et al.*, 1992)、失業(Gillham *et al.*, 1998)及低教育程度(Zuravin & DiBlasio, 1992)。上述的這些因子在非西方社會，是否也和兒童及青少年時期身體和性侵害有關，需要做進一步的探討。對於少數民族兒童及青少年時期身體和性侵害的研究數量，正持續增加中(Kunitz & Levy, 2000; Libby *et al.*, 2004)。兒童及青少年時期身體和性侵害，對於原住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Hobfoll *et al.*, 2002; Kessler *et al.*, 1997; Kunitz *et al.*, 1998; Libby *et al.*, 2004)。由於缺乏社會和醫療資源，原住民部落對於兒童及青少年時期身體和性侵害鮮少進行早期偵測和干預。直到現在，除了北美地區外，原住民部落對於兒童及青少年時期身體和性侵害仍缺乏相關的檢測(Kenny & McEachern, 2000; Smallwood, 1995; Tang & Davis, 1996)。台灣的原住民包括 12 個不同的部落，總計 456364 人口，佔全國人口的 2%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05)。大多數台灣原住民居住在農村或偏遠地區，在工業化和台灣社會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這些環境不利於找工作或接受教育。大部分原住民為了生活和受教

育，必須移居到都市。為了融入非原住民社會，他們不得不改變原先的生活方式。經過一段時間後，因為個人的改變，也逐漸改變了部落生活的原有型態(Huang, 1984; Hsu, 未發表; Li, 1982)。一般而言，原住民族受困於更加惡化的低社經地位，他們的平均收入遠低於台灣一般農民(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 2004a;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2005)。和台灣其他的族群相比，他們的健康狀況受到低社經地位的影響更大(Ko *et al.*, 1994)，平均壽命比其他族群少 6-8 年(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 2004b)。減少原住民和一般民眾之間的健康差距是一個重要的國家衛生目標。

#### 四、性侵害行為之社會特徵

##### (一) 性侵害的男性施暴特徵

相對於其他犯罪形式而言，性侵害是一種不尋常且奇特的事件，而且沒有其他犯罪類型比性侵害更難被發現(Brownmiller, 1975; Sanders, 1980)。在所有的兒少虐待類型當中，性侵害和暴力一樣對於受害者會產生一輩子深遠的影響，相對於各國不同的風俗民性及文化結構，對於性侵受害者也會造成程度不一的傷害(Brown *et al.*, 1999; Moeller *et al.*, 1993)。由於各國文化不同，因此對於性侵害的嚴重程度和責任歸屬也有不同的看法。性侵受害者和施暴者責任歸屬、動機的評估及造成的心理結果，都會影響對於性侵事件嚴重性的看法。拒絕將該狀況視為性侵事件、不會造成心理危害或不會影響受害者權益等，均是漠視性侵嚴重性的最典型表現。漠視性侵嚴重性

也可以透過將責任推給受害者或對施暴者較少責難的方式來呈現。**Brownmiller (1975)**對性侵害做社會歷史的分析後，指稱性侵害不能被視為是一種偏差的性活動，而是男性控制女性所做的攻擊和反社會工具。她認為性侵害的存在是維持男性至上及社會權力的支持及證明。針對利用性侵害做為社會控制機制的社會文化 **Schwarz 和 Brand (1983)** 發現性侵害的影響不僅僅在受害者身上，而是對於全體女性的恐嚇，而且性侵害的威脅，加強傳統上對女性性別角色和權利的原有對待。

## (二) 角色規範忽視男性為潛在被害之可能

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依據社會、文化和心理的觀點區分性別。性別角色的發展是一種優先權、技能、特性、規範和自我認知的獲得過程，據此形成不同性別的特徵，性別的區分不一定都要依據個人的生理特徵(**Bem & Allen, 1974**)。行為和態度會依據性別角色而受不同的規範，個人會依據自己的生理性別和從社會化過程中學習到的自我認知產生自我預期(**Allegier & McCormick, 1983**)。不同的性別角色應有的態度，是不同性別從事合適角色活動時的依據(**McHugh & Frieze, 1997**)，例如：在很多文化中，整理家務一直都是女性應該做的工作。而性別平等指的是一個人的權利、能力、義務和機會，不應該受其性別影響。因此，具有性別平等觀念的人，不會依據性別去區別、排斥或歧視另一個人(**Beere et al., 1984**)。性別平等觀念的建構，主要在反應男、女兩性在角色行為的相互觀念和判斷 (**King & King, 1997**)。最近的研究顯示，越來越多人在思想上接受兩性應該用更平等的方式相互對待(**McHugh &**

Frieze, 1997), 在這方面女性比男性持有更加開放的態度(Beere *et al.*, 1984; King & King, 1990; Mason & Lu, 1988; Rice & Coates, 1995; Simonson & Subich, 1999)。對於傳統性別角色規範的接受度, 影響男、女對於性侵害的寬容程度, 也是接受性侵害迷思與否的一項指標(Burt, 1980)。此些迷思忽視性別對於性侵害之重要性, 男性可能為性侵害之被害人, 女性也未必不可能成為性侵害加害人。但過去許多其他的研究者發現, 對於性別傳統角色的接受程度, 影響對於性侵事件的看法(Burt, 1980; Check & Malamuth, 1983; Johnson *et al.*, 1997; Lonsway & Fitzgerald, 1994; Merrell, 1997), 導致長久以來, Acock 和 Ireland (1983)發現當受害者違反性別角色規範時(例如, 夜間搭便車的行為), 會影響性侵害的責任歸屬, 進而可能衍生更多的性侵害事件發生。

### (三) 熟人所為乃性侵害犯罪特徵

調查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 大部分的性侵事件都不是陌生人所為, 75-90%的性侵犯和受害者都有程度不同的認識(例如 Cowan, 2000; Russell, 1984)。在以色列, 只有 16.3%的性侵事件是陌生人所為, 83.7%的性侵犯和受害者有程度不一的熟識(依據 2002 年以色列性侵害危機中心的資料), 此點約會強暴特性與台灣性侵情形類似。然而, 和陌生人相比, 那些由熟人所犯下的性侵害, 一般人通常都不認為是性侵害, 甚至受害者本身也有同樣的看法(Koss *et al.*, 1988)。許多研究顯示, 由熟人所犯的性侵害, 在認知上其嚴重程度通常都不如陌生人所為(Bell *et al.*, 1994; Bridges, 1991; L' Armand & Pepitone,

1982)，而且在心理上也具有較少的影響 (Monson, LanghinrichsenRohling, & Biderup, 2000; Sanchez, 1997; Simonson & Subich, 1999)。那些研究顯示受害者和施暴者間熟識程度，和對施暴者責難的程度呈反向的線性關係，且隨著親密程度的上升，施暴者行為不被接受的程度也會下降 (Freetly & Kane, 1995)。一般人認為，受害者和性侵者越熟識，性侵者性侵的責任就少，他的行為對受害者權利的損害也越少，也因此對於性侵事件實際的情況也會有越大的誤解 (Bridges & McGrail, 1989; Koss *et al.*, 1988; L' Armand & Pepitone, 1982)。此外，在刑罰上對於具有夥關係的性侵犯約會性侵犯的刑期，判得比熟人和陌生人性侵犯還要短 (Cowan, 2000)；而且熟人性侵犯的刑期，判得比陌生人性侵犯還要短 (Viki *et al.*, 2004) 也反應司法對於關係親密程度和性侵害損害間的看法。

#### (四) 小結

現況上，性侵害加害人確實以男性為大宗，過去相關社會研究認為性侵害的存在是維持男性至上及社會權力的支持及證明。然而，此種傳統性別角色規範也可能致使社會忽略男性可能作為被害人的重要性，致使許多男性被性侵害事件之發生隱而未現。此外，過去研究指出大部分的性侵事件都不是陌生人所為，其原因在於當受害者和性侵者越熟識，性侵者性侵的責任就少。此種誤解可能也是性侵害事件發生之重要原因。綜上，加害人、被害人之性別以及兩造關係為性侵害犯罪重要的社會脈絡，在分析上此些脈絡可能存在關鍵性之影響，值得進一步探討。

## 參、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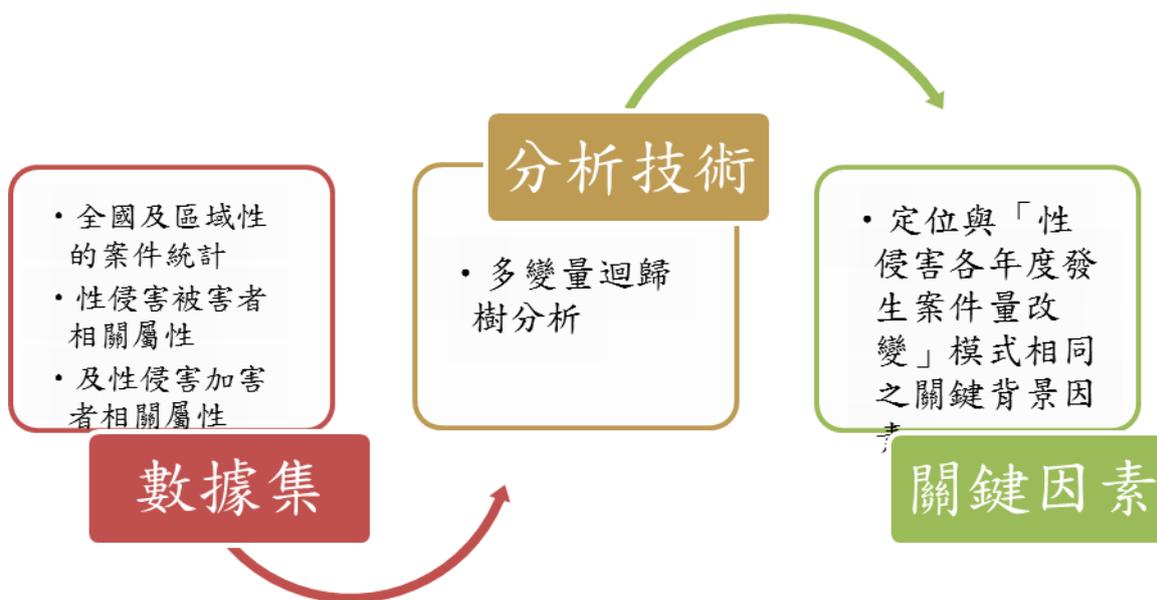
###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之資料來源為政府部門公布之最新官方統計，詳述如下：

本研究將可取得之政府部門公布之 2008 年至 2014 年官方統計資料，將其分為三類：全國及區域性的案件統計，如「全國每十萬人性侵害年度通報件數」（也就是性侵犯率）、「全國每十萬人性侵害年度各縣市通報件數」及「性侵害案件通報來源」等案件量；性侵害受害者相關屬性的案件統計，如「性侵害被害人通報性別」、「性侵害被害人性侵害案件各籍別被害人數」、「性侵害被害人性侵害案件各職業別人數」、「性侵害被害人教育程度別」、「性侵害被害人年齡別」、「性侵害被害人身心障礙別」；性侵害加害者相關屬性的案件統計，如「性侵害加害人年齡統計」、「性侵害加害人性別」、「被害及加害者兩造關係別」、「案發地點別」等。

### 二、分析框架

依據前述大量蒐集完成數據集，本研究完成三個數據集，分別為全國及區域性的案件統計、性侵害受害者相關屬性及性侵害加害者相關屬性數據集，並利用 R project 根據不同年限的調查資料進行多變量迴歸樹分析。再依據探勘出之資訊，配合實務見解及文獻解釋性侵害發生之關鍵因素，探索性侵害事件發生之普遍性和特殊性因子的脈絡，數據分析框架如下：



圖五 數據分析框架

### 三、資料分析技術

多變量迴歸樹(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可能是當今自然科學，特別是環境生態這個領域中，最為普遍使用的工具。它的普遍性可以從它做為「標竿」(benchmark)的地位中看出：任何在環境生態中，正在發展的新工具，都以多變量迴歸樹做為其要超越的對象(Legendre & Anderson, 1999)。多變量迴歸樹顧名思義是一樹狀結構，只是它是一棵倒長的樹，樹根(root)在上，樹葉(leaf)在下，而中間是聯結樹根到樹葉的許多節點(node)或分叉點(branching point)，最底層的葉子點就代表一個最終的結果。此分析方法所根據的是二元決策(binary decision)，它代表了「是」或「否」的兩種結果。而樹根及每一個節點則代表了一個狀態的界定(classification)，每一個結點都產生一個新的分叉，也稱子樹(subtree)，如此下去，一直到

長到葉子為止。而從樹根出發，經過節點，再到任一葉子之間的路徑(path)明顯地是唯一的。而每一條路徑就說明了一個結果的形成過程。依此類推，我們也知道其它路徑所代表的生態上的意義，而所有的路徑之合，就代表整體發展情形，讓我們知道在何種環境因子的組合情況下，會造成某種結果，而在什麼情況下，會導致另一個結果。

在生態學的研究中，不同的生態環境會產生不同的生物類型組合。例如在阿里山、合歡山和大雪山這三個不同的地點，各有其不同的海拔高度、覆蓋度、森林覆蓋度、草原覆蓋度、年均溫…等環境因子，也因此針對鳥種而言，也會有五色鳥、繡眼畫眉、栗背林鴝、白翼金眉…不同鳥種出現與否的不同組合，而我們也可以據此觀察了解到哪些環境因子在影響哪些鳥種的出現。就多變量迴歸樹(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的實際操作而言，首先會將各個不同地點(樣區)出現的鳥種數量當作生物因子，然後將樣區中的海拔高度、覆蓋度、森林覆蓋度、草原覆蓋度、年均溫…等視為環境因子，分析結果將會顯示影響各個不同地點在鳥種組合及其數量差異的主要及次要環境因子。據此，我們可以知道是哪些環境因子造成這些地點在鳥種組合及數量上的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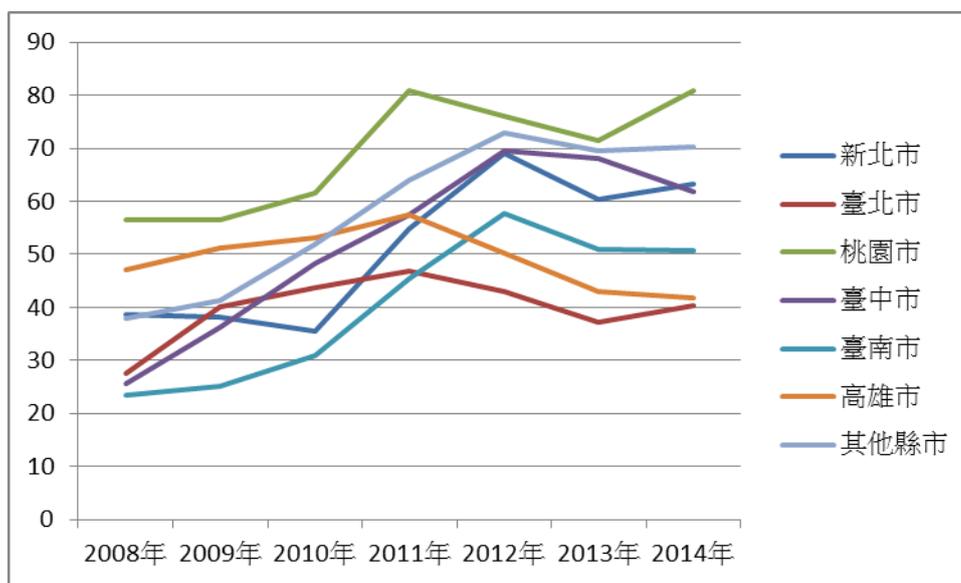
同樣的研究方法可以套用在犯罪的地理生態研究上，由於同一地區可能有單一犯罪類型的發生，或是多種犯罪類型共生，因此可以將標的犯罪當作生物因子，然後把其他的犯罪類型當成標的犯罪類型的環境因子。依據這個想法，本研究將性侵害案件數當作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因子，不同年齡層的受害者

案件數當作環境因子，以了解各個不同年齡層的受害者案件數對於性侵害案件數的影響。為了突顯各個不同年齡層的受害者案件數對於性侵害案件數的影響，我們利用 R project 中的 mvpart package(De'ath, 2002)，來計算並建立上述資料的多變量迴歸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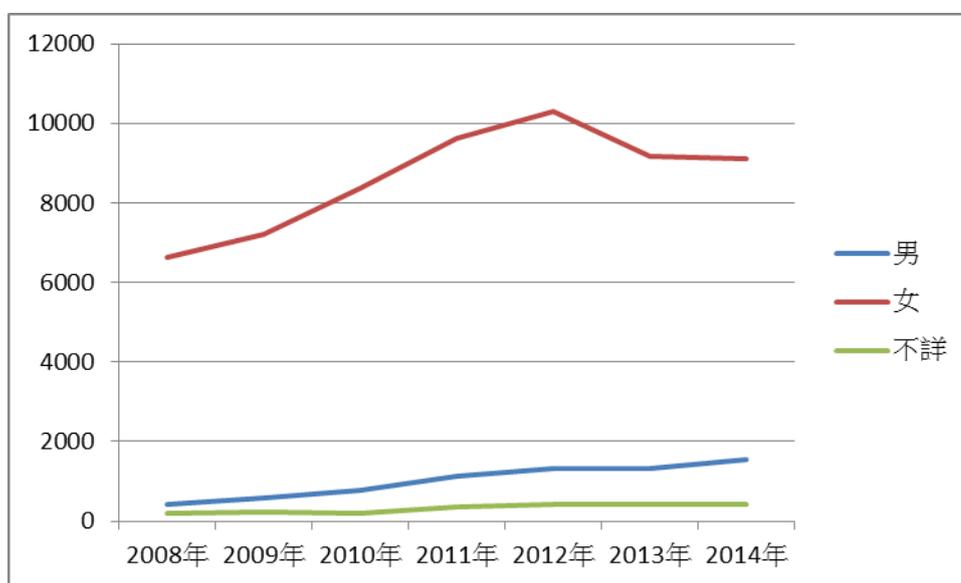
## 肆、結果

### 一、描述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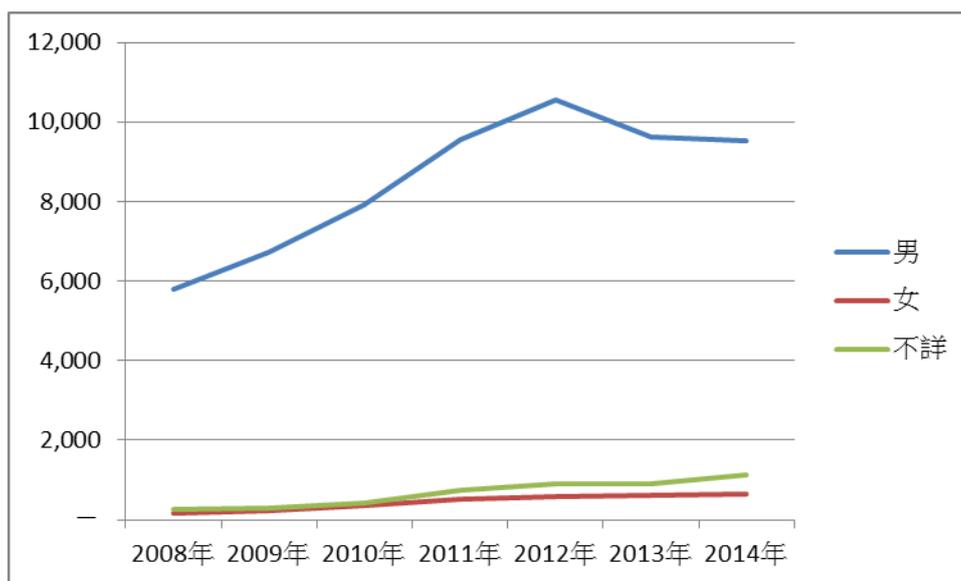
本研究針對 2008-2014 年全國性侵害年度通報件的官方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性侵害事件從 2008 年逐年攀升，在 2012 年時雖然有下降的情形，但整體而言還是一種逐年走高的趨勢(圖一)；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之外，其他縣市每十萬人性侵害事件通報數均有某段時期呈現陡增的情形(圖二)；性侵害受害者仍以女性居多，男性受害者數量呈現穩定的增加(圖三)；性侵害加害者仍以男性居多，男性加害者數量呈現穩定的增加(圖四)



圖二 2008 年到 2014 年六都及其他縣市每十萬人性侵害事件通報數



圖三 2008 年到 2014 年性侵害被害人性別通報件數



圖四 2008 年到 2014 年性侵害加害人性別通報件數

## 二、全國及區域性的案件的 MRT 分析

如前所述，多變量迴歸樹分析法是根據二元決策方式，來探討不同種環境因子的組合情況下，會造成何種結果、而在什麼情況下，會導致另一個結果。在以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當作生物因子，而六都及其他縣市等七個城市變項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當作是環境因子時，分析結果如圖五。樹狀圖根部的英文字代表切分點的因子，數字代表的是案件數。支端上方的數字代表的是該群的積差平方和(the sum of squared errors for the group)，n的總和為資料中分析所跨的年數(參照 De' ath 2002)。Regression tree 的最適規模，以 cross-validation 決定，圖下方的 CV Error 代表 cross-validation relative error (CVRE)<sup>1</sup>，選擇 CVRE 數值最小者(即 Y 變異無法被解釋的部

$$CVRE = \frac{\sum_{k=1}^n \sum_{j=1}^p (y_{ij(k)} - \hat{y}_{jk})^2}{\sum_{i=1}^n \sum_{j=1}^p (y_{ij} - \hat{y}_j)^2}$$
 其中， $y_{ij(k)}$  為 test group  $k$  當中的 object  $i$  之變數  $j$  的值； $\hat{y}_{jk}$  為變數  $j$  在最接近  $i$  的終端群之 centroid 的值。分母則是  $Y_{data}$  的 overall sum of squares (SST)

份最少者，註 1)，為最適分群大小。樹狀圖結果顯示，「新北市」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五，CVRE=0.235)。



圖五 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 VS 七個縣市因子的多變項迴歸樹

### 三、性侵害受害者相關屬性的案件統計的 MRT 分析

在以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當作生物因子，而性侵害被害人通報性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男性」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六左上，CVRE=0.394)；若以性侵害被害人年齡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12-18 歲」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六右上，CVRE=0.416)；以性侵害被害人各籍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本國籍原住民」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六左中，CVRE=0.393)；以性侵害被害人各職業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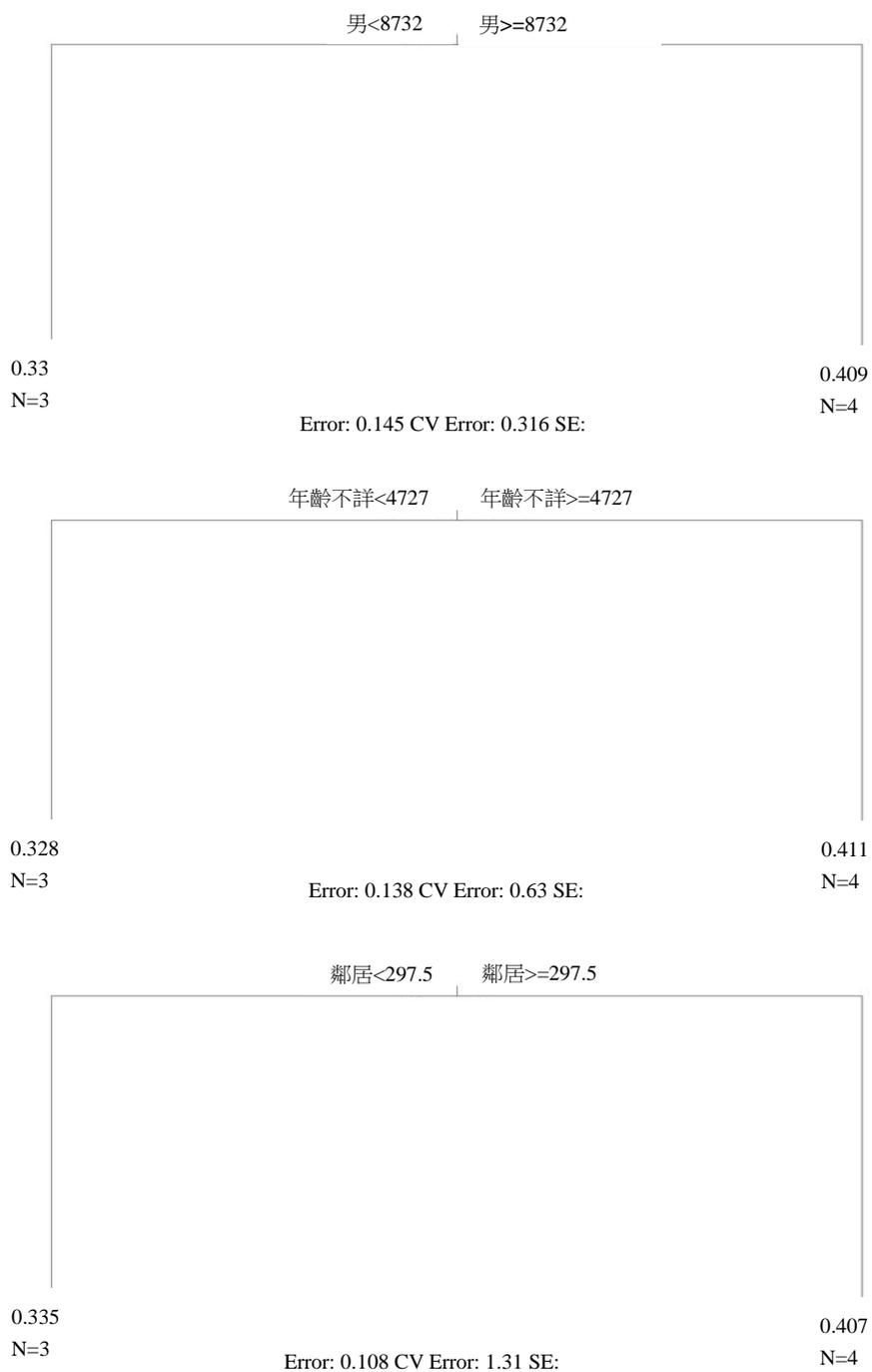
「職業不詳」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六右中，CVRE=0.393)；以性侵害被害人教育程度當作是環境因子時，「國中程度」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六左下，CVRE=2.03)；以性侵害發生地點當作是環境因子時，「公共廁所」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六右下，CVRE=0.634)。



圖六 性侵害被害者相關屬性的案件統計的 MRT 分析圖

#### 四、性侵害加害者相關屬性的案件統計的 MRT 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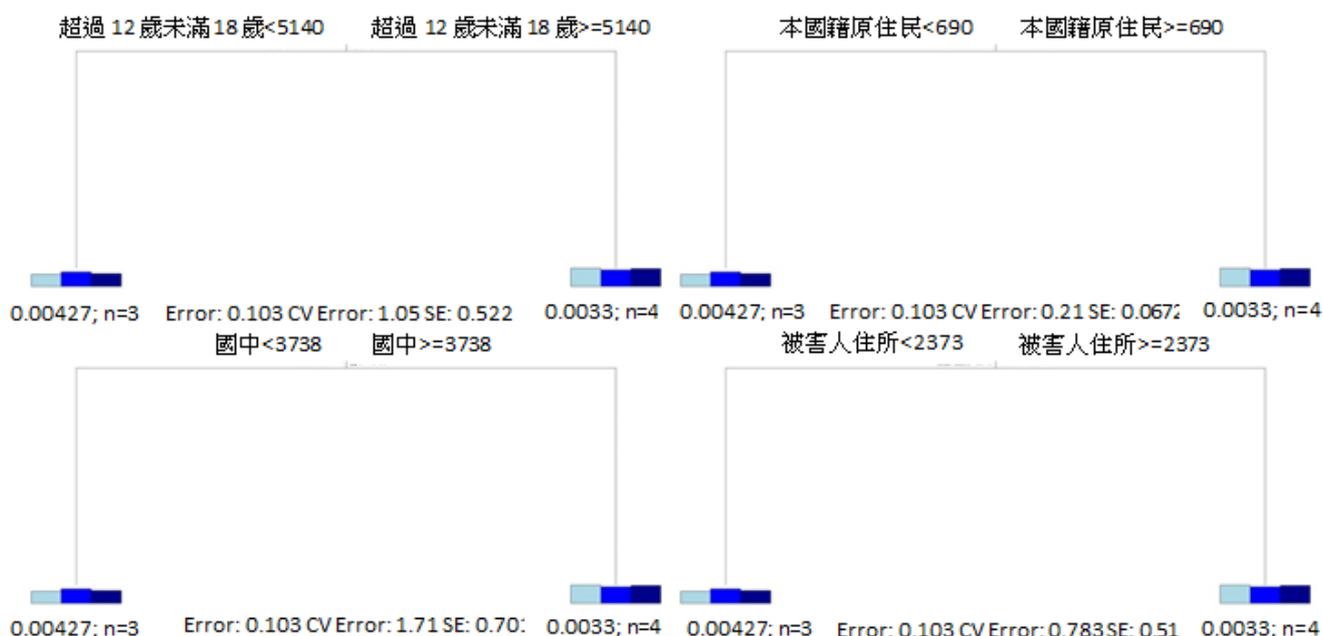
在以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當作生物因子，而性侵害加害人性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男性」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七上， $CVRE=0.316$ )；以性侵害加害人年齡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年齡不詳」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七中， $CVRE=0.63$ )；以性侵害被害人及加害人兩造關係當作是環境因子時，「鄰居」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七下， $CVRE=1.31$ )。



圖七 性侵害加害者相關屬性的案件統計的 MRT 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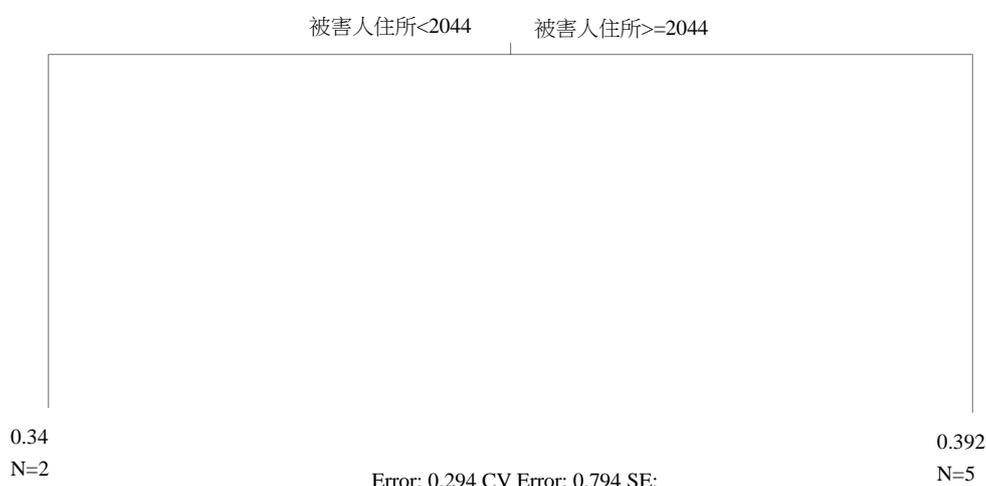
## 五、性侵害被害人及加害者相關屬性案件統計的 MRT 分析

在以性侵害被害人通報性別案件數當作生物因子，而性侵害被害人年齡當作是環境因子時，「12-18 歲」是造成 2008-2014 年性侵害被害人通報性別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八左上，CVRE=1.05)；以性侵害被害人各籍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本國籍原住民」是造成 2008-2014 年性侵害被害人通報性別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八右上，CVRE=0.21)；以性侵害被害人教育程度當作是環境因子時，「國中程度」是造成 2008-2014 年性侵害被害人通報性別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八左下，CVRE=1.71)；以性侵害發生地點當作是環境因子時，「被害人住所」是造成 2008-2014 年性侵害被害人通報性別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八右下，CVRE=0.783)。



圖八 性侵害被害人及加害者相關屬性案件統計的 MRT 分析圖

另外，由於以性侵害被害人及加害人兩造關係當作是環境因子時，「鄰居」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七下)，為了進一步了解這種由熟人所為的性侵害發生地點，因此我們又以性侵害加害人為鄰居的案件數當作生物因子，而性侵害發生地點當作是環境因子時，「被害人住所」是造成 2008-2014 年性侵害加害人為鄰居的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九，CVRE=0.794)。



圖九 性侵害加害人(鄰居)與發生地點之多變項迴歸樹分析圖

## 伍、討論

在上述分析研究中的發現，除了支持前人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外，同時也指出社會環境及文化結構對於青少年性侵害趨勢的影響(Brown *et al.*, 1999; Moeller *et al.*, 1993)。

一、區域性多變項迴歸樹分析結果發現，「新北市」為全國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

本研究發現「新北市」性侵犯罪率是造成全國性侵犯罪率差異的主要因子。台灣團結聯盟 2013 年 12 月 18 日指出，新北市性侵害犯罪件數連續 3 年全國第一，更是汽車失竊數最高的縣市。不過，新北市婦幼警察隊則馬上發出新聞稿回應，表示犯罪事件用「絕對發生件數」來統計會失真，事實上，新北市連續 3 年的性侵案平均數低於全國數據。台聯立委葉津鈴指出，根據警政署所提供資料顯示，新北市的性侵害被害人數逐年增加，截至今年 11 月底，高達 1871 人，居全國之冠，其中對幼童性交人數為 203 人，佔 10.8%(東森新聞雲，2013)。新北市原住民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情形，其被害率分別為每十萬人 625.89 人及 102.99 人，明顯高於非原住民被害率(分別為 244.66 人及 33.78 人)，此點顯示政府有必要針對原住民人身安全保護發展出更為周詳的方案(內政部，2011)。本研究之分析技術指出，新北市之性侵犯罪率具二元決策性，可作為全國性侵犯罪率變異狀況分水嶺，應持續留意新北市性侵犯罪之未來變動趨向。

二、性侵被害人特性多變項迴歸樹分析結果發現，「男性」、「12-18 歲」、「國中程度」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

本研究發現，被害人方面：「男性」、「12-18 歲」、「國中程度」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此點可知，就讀於中學的少年男性之性侵受害現象為特別需要留意的重點。男性孩童及青少年之性侵被害為社會較容易被忽略的族群，但據估計，美國每 7 個男孩中會有 1

位，在 18 歲以前曾遭受性侵犯。1973 年共接獲 16 萬 7 千宗兒童及青少年性侵犯案件(Money & Athanasiou, 1973)。最後，美國政府從 1973 年開始做被害人調查，使得以往因被害人認為沒必要，或不願意報案的犯罪事件(如妨害性自主案件)，逐步被發現(McCahill *et al.*, 1979; Dobash *et al.*, 1992)。男性在童年時期遭遇性侵害的比率約在 3% 至 29% 之間(Finkelhor, 1994); 西方國家的研究報告指出，英國與美國的男性約有 3% 至 8% 曾遭遇性侵害(Turchik, 2012); 中國大陸的相關調查，也發現在十六歲以前遭遇侵害者在男生為 10.5%(Chen *et al.*, 2004)。

在台灣，在性侵受害者中，雖然男性被性侵的比例較低，但從統計來看，卻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其中更以 12 歲以下男童居多。胡淑貞與吳慧敏(2001)針對花蓮市與台南市高中(職)二年級在學學生所從事的性侵害被害比率的調查發現男生遭遇性侵害的比率為 9.3%，近年較為人所知之新聞事件則為台中某國小謝姓教師性侵 4 位男童，以及日前發生的醫院廁所男童遭性侵案(史倩玲，2009)。根據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統計，2002 年男性被性侵的人數為 81 人，但人數卻逐年快速增加，到了 2007 年增加為 330 人，2008 年為 432 人，而 2009 年至 9 月底止就有 405 人，每年男性受害人增加幅度接近 3 成(史倩玲，2009)。其實男性被性侵之事件的發生比率並不一定如新聞所言，是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而是一直以來，在性侵害事件的披露與處理當中，男性一向處於被忽略的角色。更具體地來說，應是男性在社會中一向被標示為強者、

是主體，女性才會是被侵害的對象，故當男性受到侵犯時，可能得到的會是鄙夷與嘲諷，對無法保護自身的訕笑與輕視，如：沒路用、很娘、沒有男子氣概等，此亦影響了男性願意披露自身受害的事實。故，檯面上所知曉的事件發生率，可能遠低於實際發生率(葉致芬，2009)。

此外，本研究以性侵害被害人教育程度當作是環境因子時，「國中程度」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六左下)，若配合若以性侵害被害人年齡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12-18 歲」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六右上)，可知 12-18 歲且處於國中教育階段者，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此處的國中教育程度指的是該教育階段的學生，而非學歷只有國中程度的成人。前人的研究也發現，青少年由於涉及幫派、性交易或逃家等缺乏監護人保護的狀況下，容易成為性侵害受害者(例如：Mann, 1981；Adams & Fay, 1984；Oberman, 1994；Kristl, 1996；Wood & Jewkes, 1997)。

### 三、「本國籍原住民」、「職業不詳」之被害脈絡

性侵害屬家庭暴力的一種，Ontario 原住民婦女協會的一項研究發現，每十名原住民婦女中就有八位婦女就層經驗過家庭暴力。其中 87%是肢體暴力，57%是性侵害。另一項針對 Ontario 原住民婦女的區域研究，發現 71%的都市原住民婦女與 48%原鄉婦女有被家庭暴力侵害的經驗(RCAP, 1996)。1991

年加拿大主計處的原住民普查報告發現 35% 的原住民認為性侵害是部落中最嚴重的問題(Fournier, 1977 ; RCAP, 1996) 。6.3% 的台灣原住民婦女，童年時期曾受過雙親任一方或雙方在身體上的虐待(Yang et al., 2006)，這個數字在台灣原住民非主流文化的固有觀念下，有低估的可能性。

於「職業不詳」方面，先前的研究發現，無家可歸和逃家的小孩為了生存從事性交易的比例為 10% 到 50%( McCarthy, 1992) 。本研究利用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及性侵害被害人職業別進行多變項迴歸樹分析，發現「職業不詳」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九)。性侵害被害人的職業不詳，可能涉及為了生存從事的性交易(survival sex)，這樣的性交易一但說好的條件沒有被滿足，就很容易被通報成為性侵害事件。

#### 四、性侵加害人特性

本研究發現，性侵加害人特性包括「男性」、「年齡不詳」、「鄰居」都為性侵犯率之關鍵因子。男性和年齡不詳容易理解，因加害人多為男性，並且於通報事件，受害者較難以清楚加害人之年齡。但此分析較需要留意的是鄰居此種熟人所為之性侵案件成為整體性侵犯率之關鍵。由於受害者的內疚感和社會所灌輸的固有觀念，使得受害者認為性侵害的發生，自己需承擔部分責任，因此影響報案意願，也是熟人性侵案件一直以來被低估的原因。此外，熟人性侵也由於某些複雜且附有爭議的社會文化背景，成為最嚴重且最複雜的性侵形式(Anglin

and Hutson, 1997)。在所有的熟人中，鄰居是除了家人外和我們住得最近，熟悉我們作息和居家狀況的人，因此更容易取得我們的信任。許多個案研究發現，性侵施暴者為鄰居的案件，性侵地點通常發生在受害者的住所(例如；Morris & Jeffries,1968；Crake & Australia, 1993；Niehaus, 2005；Walugembe, 2010)。

## 五、性侵犯罪地點特性

本研究發現，犯罪地點方面，以「新北市」、「公共廁所」、「被害人住所」為主要因子。劉文英和陳慧女(2006)針對心智障礙者遭受性侵害進行調查後發現，案發場所在公共場所佔23.2%；私人場所最多數在加害人住處(25%)其次是被害人住處(20.7%)；公共場所最多數在公共廁所(7.3%)。國外研究發現，男同性戀的休閒生活中心，已經由茶室、澡堂等這些半開放空間，逐漸轉變為公共廁所這種更為開放的空間(Berlant & Warner, 1998)。

在台灣公共廁所已經成為外籍女傭進行性交易的新興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四維公園最近傳出有「四腳獸」，公園的公共廁所成了外籍看護工與國人性交易賺外快的場所，且這些外籍女傭利用推看護病人到公園散步時，還會相互掩護讓同鄉可以交易。轄區警方新海警察派出所表示，將會加強巡邏取締，阻絕歪風。

板橋市四維公園附近民眾指出，近來傳出越南籍看護女傭，在天氣好時都會推輪椅或攙扶著所看護的雇主到公園散

步，其中有部分外佣與公園內的男子，透過比手勢方式從事性交易。據新聞報載，性交易的外佣年紀都在二十多歲至三十歲，價碼約在新台幣一千元左右。為遏止這股不良風氣，轄區警方表示，將加強巡邏取締這種性交易的場所(中央社，2005)。由於公共廁所已經成為男同性戀和色情交易的新地點，因此很多和性相關的活動，很容易在這個地方產生衝突，由單純的約會或性交易演變成性侵害。

## 陸、結論與建議

### 一、結論

對於台灣 2008 年至 2014 年官方統計資料顯示的性侵害趨勢而言，「12-18 歲」、「國中程度」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本研究認為青少年為易受傷害族群，在暴露於高風險環境下，如涉及幫派、性交易或逃家等，又缺乏監護人保護，便容易成為性侵害受害者。而社會環境及文化結構對於青少年性侵害趨勢的影響，則是讓弱勢或不利族群(原住民、性工作者及同性戀)增加更多被性侵機會及地點的原因之一。另外逃家或無家可歸的兒童青少年，也缺乏監督者之保護與監管機制，為了生存所進行的性行為，不但危險且影響日後的身心發展，也有可能成為往後的謀生方式，可能是性侵害受害者職業不詳的部分原因。

## 二、建議

### （一）政策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犯罪地點「公共廁所」、「被害人住所」為主要因子。因此，建議政府強化性侵防制相關作為，一方面宣導青少年、學生留意熟識者之間所為之性侵害案件，另外一方面強化警方針對公共廁所之巡邏，以避免公共廁所成為性侵或性交易犯罪之場所。

再者，研究發現被害人方面以「12-18 歲」、「國中程度」為主要因子，因此建議學校教育兒童及少年自我保護觀念及因應方法，提升兒童及少年對於性侵害之敏感度。此外，本研究也發現「男性」、「本國籍原住民」為性侵害之易受忽略族群，建議政府加強此些族群之防範宣導，以協助男童及原住民於遭遇危險情境時能防止遭受進一步侵害。加害人方面，本研究發現「男性」、「鄰居」為關鍵因子，是以父母親除應教導孩子防範性侵之知識，更需留意自家環境，留意鄰居與孩童之互動往來情形，並提醒孩子宜多堤防鄰居奇怪之行徑，以提升學生自我保護之能力。

### （二）未來學術研究建議

本研究套用生態研究的統計方法，以提供犯罪生態研究一個新的視角，各種犯罪類別並非獨立單一事件，如同生物生態研究中，環境因子會影響生物因子的存在與繁衍，生物因子也不能獨立於環境特性而存在。犯罪的生態分布，也許與生物界

的法則相當類似，因此，生物與生態環境間的互動，可以做為未來犯罪學研究參考之用。由於資料限制，本研究所分析的資料是以官方資料為主，建議未來對此議題有興趣的學者可蒐集更詳細的資料，俾以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另外，本研究利用的分析方法，雖然在生態學研究上被普遍使用，但卻鮮少被應用於犯罪學研究。多變量迴歸樹未曾見於犯罪學的相關研究中。這個分析方法在「青少年性侵事件相關因子探討」的研究結果，有待日後更多相關的研究加以佐證。本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性侵事件具有相當多的屬性，誠然各屬性和青少年性侵事件之間的關聯性並非本研究能觸及的，但此研究發現也顯示未來在進行防治性侵害案件時，可從多元角度思考，以期能進一步了解犯罪行為的樣態，俾以訂定良好的預防性侵害政策。另外本研究所利用 2008-2014 年全國性侵害年度通報官方資料，不管在被害人通報性別(2-4%)、被害人國籍(7-24%)、被害人年齡(9-11%)及加害人性別(4-10%)等均有資料不詳的情形發生，因此本研究建議，相關單位未來在處理性侵害事件，尤其是兒少性侵事件，在資料的取得上應建立更具系統化及詳細的模式，一方面有利於研究，另一方面也對兒少性侵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利於日後政策擬定上的參考。

## 參考資料

### 中文部分

中央社(2005)。北縣警方嚴查外傭以公園公廁性交易賺外快。

[http://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467](http://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467)。

內政部(2011)。內政部 100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台北：內政部

史倩玲(2009)。113改名加強性侵受害男性保護。台灣立報

[http://sexedu.moe.edu.tw/html/news\\_detail.asp?sn=614](http://sexedu.moe.edu.tw/html/news_detail.asp?sn=614)。

台灣省政府(1991)。台灣婦女生活調查。南投：台灣省政府

刑事調查局(1993)。1984年-1993年犯罪調查。台北：警政署

林佳樺 (2003)。性與真實：本土言情小說讀者之閱讀論述。台北：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東森新聞雲(2013)。再批朱立倫，台聯：新北市性侵犯罪全國第一。取自：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218/307994.htm>。

胡淑貞、吳慧敏 (2001)。兒童及青少年時期性侵害盛行率及相關因子之研究：以台南市和花蓮市高中職學生為例。公共衛生，28 (2)，135-150

葉致芬(2009)。113改名加強性侵受害男性保護。取自：

[http://sexedu.moe.edu.tw/html/news\\_detail.asp?sn=614](http://sexedu.moe.edu.tw/html/news_detail.asp?sn=614)。

新頭殼(2015)：5機關擺爛，遭性侵女報案2個月後被殺。取自：

<http://newtalk.tw/news/view/2015-09-03/64248>。

鄭瑞隆(2006)。少年性侵犯行之成因，評估與矯正處遇。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2(1)，65-91

劉文英、陳慧女(2006)。心智障礙者遭受性侵害的調查研究。  
衛生福利部(2014)。全國性侵害案件調查。台北：衛生福利  
部

## 英文部分

- Acock, A. C., & Ireland, N. K. (1983). Attribution of blame in rape cases: The impact of norm violation, gender, and sex-role attitude. *Sex Roles*, 9(2), 179-193.
- Adams, C., & Fay, J. (1984). "Nobody Told Me It Was Rape": A Parent's Guide for Talking with Teenagers about Acquaintance Rape and Sexual Exploitation. Network Publications, 1700 Mission St., Suite 203, PO Box 1830, Santa Cruz, CA 95061-1830..
- Allgeier, E. R., & McCormick, N. B. (1983). Changing boundaries: Gender roles and sexual behavior. Mayfield Pub Co.
- Anglin, D., Spears, K. L., & Hutson, H. (1997). Flunitrazepam and its involvement in date or acquaintance rape. *Academic emergency medicine*, 4(4), 323-326.
- Beere, C. A., King, D. W., Beere, D. B., & King, L. A. (1984). The Sex-Role Egalitarianism Scale: A measure of attitudes toward equality between the sexes. *Sex Roles*, 10(7-8), 563-576.
- Bem, D. J., & Allen, A. (1974). On predicting some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The search for cross-situational

- consistencies in behavior. *Psychological review*, 81(6), 506.
- Berlant, L., & Warner, M. (1998). Sex in public. *Critical inquiry*, 24(2), 547-566.
- Bridges, J. S. (1991). Perceptions of date and stranger rape: A difference in sex role expectations and rape-supportive beliefs. *Sex Roles*, 24(5-6), 291-307.
- Bridges, J. S., & McGrail, C. A. (1989). Attributions of responsibility for date and stranger rape. *Sex Roles*, 21(3-4), 273-286.
- Brown, D. W., Riley, L., Butchart, A., Meddings, D. R., Kann, L., & Harvey, A. P. (2009). Exposure to physical and sexual violence and adverse health behaviours in African children: results from the Global School-based Student Health Survey.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87(6), 447-455.
- Brown, J., Cohen, P., Johnson, J. G., & Smailes, E. M. (1999). Childhood abuse and neglect: specificity of effects on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depression and suicidal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38(12), 1490-1496.
- Brownmiller, S. (1975). *Against our will: Women, men and rape*. New York
- Check, J. V., & Malamuth, N. M. (1983). Sex role stereotyping and reactions to depictions of stranger versus acquaintance rap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2), 344.

- Chen, J., Dunne, M. P., & Han, P. (2004). Child sexual abuse in China: A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four provinces. *Child Abuse & Neglect*, 28, 1171-1186.
- Cheng, C. J.(1995). Teaching gender equality from childhood (in Chinese). 1995/5/10, China Times.
- Costin, F., & Schwarz, N. (1987). Beliefs About Rape and Women's Social Roles A Four-Nation Study.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1), 46-56.
-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 (2004a). Employment in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 in 2004. Taipei: Executive Yuan, Taiwan. (in Chinese).
-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 (2004b). Statistics of health in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 Taipei: Executive Yuan, Taiwan. (in Chinese).
- Cowan, G. (2000). Beliefs about the causes of four types of rape. *Sex Roles*,42(9-10), 807-823.
- Crake, M., & Australia, W. (1993). WHO IS THE RAPIST? A Series OF CASE STUDIES.
- Crowley, T. J., Mikulich, S. K., Ehlers, K. M., Hall, S. K., & Whitmore, E. A. (2003). Discriminative validity and clinical utility of an abuse-neglect interview for adolescents with conduct and substance use problem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0(8), 1461-1469.
- De'Ath, G. (2002).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 a new technique for modeling species-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Ecology*,

83(4), 1105-1117.

- DeBruyn, L. M., Lujan, C. C., & May, P. A. (199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bused and neglected American Indian children in the southwest.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5(3), 305-315.
-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2005). Quarterly national economic trends, Taiwan area,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Executive Yuan, Taiwan (in Chinese).
- Dobash, R. P., Dobash, R. E., Wilson, M., & Daly, M. (1992). The myth of sexual symmetry in marital violence. *Social problems*, 71-91.
- Dutton, D. G. (2011). *The domestic assault of women: Psychological and criminal justice perspectives*. UBC press.
- Feild, H. S. (1978). Attitudes toward ra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ice, rapists, crisis counselors, and citize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2), 156.
- Ferguson, P. A., Duthie, D. A., & Graf, R. G. (1987).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to Rapist and Victim The Influence of Victim's Attractiveness and Rape-Related Informatio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3), 243-250.
- Finkelhor, D. (1994). The international epidemiology of child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 Neglect*, 18, 409-417.
- Fournier, S. & Crey, E. (1997). *Stolen from our embrace*. Vancouver: Douglas & McIntyre.
- Freetly, A. J. H., & Kane, E. W. (1995). Men's and women's

perceptions of non-consensual sexual intercourse. *Sex Roles*, 33(11-12), 785-802.

Gillham, B., Tanner, G., Cheyne, B., Freeman, I., Rooney, M., & Lambie, A. (1998). Unemployment rates, single parent density, and indices of child poverty: Their relationship to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Child Abuse & Neglect*, 22, 79 - 90

Groth, A. N., Burgess, A. W., & Holmstrom, L. L. (1977). Rape, power, anger, and sex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4, 1239-1243.

Haile, R. T., Kebeta, N. D., & Kassie, G. M. (2013). Prevalence of sexual abuse of male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ddis Ababa, Ethiopia. *BMC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13(1), 1.

Hobfoll, S. E., Bansal, A., Schurg, R., Young, S., Pierce, C. A., Hobfall, I., & Johnson, R. (2002).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child 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history on Native American wome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AIDS risk.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0, 252-257.

Ho, T. P., & Kwok, W. M. (1991). Child sexual abuse in Hong Kong. *Child abuse & neglect*, 15(4), 597-600.

Huang, Y. K. (1984). Two types of social system among Taiwanese aborigines and its implication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57, 1-30.

Hwang, F. Y. (1995). An examination of women's personal safety.

In conference on Public Policies for Women in the 21st Century, Taipei, Taiwan.

- Jemal, J. (2012). The child sexual abuse epidemic in Addis Ababa: some reflections on reported incidents, psychosocial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Ethiopian journal of health sciences*, 22(1), 59-66.
- Jirapramukpitak, T., Prince, M., & Harpham, T. (2005). The experience of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in the young Thai population.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40(12), 955-963.
- Juang, K. D., Wang, S. J., Fuh, J. L., Lu, S. R., & Chen, Y. S. (2004). Association between adolescent chronic daily headache and childhood adversity: a community-based study. *Cephalalgia*, 24(1), 54-59.
- Kanekar, S., & Nazareth, A. M. (1988). Attributed rape victim's fault as a function of her attractiveness, physical hurt, and emotional disturbance. *Social Behaviour*.
- Kenny, M. C., & McEachern, A. G. (2000). Racial, ethnic, and cultural factor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 selecte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 905–922.
- Kessler, R. C., Davis, C. G., & Kendler, K. S. (1997).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adult psychiatric disorder in the US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7, 1101–1119
- King, L. A., & King, D. W. (1997). SEX – ROLE

EGALITARIANISM SCAL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1(1), 71-87.

Ko, Y. C., Liu, B. H., & Hsieh, S. F. (1994). Issues on aboriginal health in Taiwan. *The 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10, 337–351.

Koss, M. P., Dinero, T. E., Seibel, C. A., & Cox, S. L. (1988). Stranger and acquaintance rape: Are there differences in the victim's experienc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2(1), 1-24.

Koss, M. P., Dinero, T. E., Seibel, C. A., & Cox, S. L. (1988). Stranger and acquaintance rape: Are there differences in the victim's experienc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2(1), 1-24.

Kristl, C. (1996). Rape of Teenager Raises Security Issues. *American Libraries* Sept, 15-16.

Kunitz, S. J., & Levy, J. E. (2000). *Drinking, conduct disorder, and social change: Navajo experie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nitz, S. J., Levy, J. E., McCloskey, J., & Gabriel, K. R. (1998). Alcohol dependenc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s sequelae of abuse and conduct disorder in childhood. *Child Abuse & Neglect*, 22, 1079–1091.

Lalor, K. (2004). Child sexual abuse in sub-Saharan Africa: a literature review. *Child abuse & neglect*, 28(4), 439-460.

Lakew, Z. (2001). Alleged cases of sexual assault reported to two

- Addis Ababa hospitals. *East African medical journal*, 78(2), 80-83.
- Lau, J. T., Chan, K. K., Lam, P. K., Choi, P. Y., & Lai, K. Y. (2003). 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of physical abuse in Hong Kong Chinese adolescents. *Child Abuse & Neglect*, 27(1), 63-75.
- Legendre, P., & Anderson, M. J. (1999). Distance-based redundancy analysis: testing multispecies responses in multifactorial ecological experiments. *Ecological monographs*, 69(1), 1-24.
- Li, Y. Y. (1982). Societies and cultures of the Taiwanese aborigines.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pp. 395–424.
- Libby, A. M., Orton, H. D., Novins, D. K., Spicer, P., Buchwald, D., Beals, J., Manson, S. M., & AI-SUPERPPF Team. (2004). Childhood 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and subsequent alcohol and drug use disorders in two American-Indian tribes.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65(1), 74–83.
- Mann, E. M. (1981). Self-reported stresses of adolescent rape victim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Care*, 2(1), 29-33.
- Mason, K. O., & Lu, Y. H. (1988). Attitudes toward women's familial roles: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5. *Gender & Society*, 2(1), 39-57.
- Mbagaya, C., Oburu, P., &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2013). Child physical abuse and neglect in Kenya, Zambia and the

- Netherland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prevalence, psychopathological sequelae and mediation by PT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8(2), 95-107.
- McCahill, T. W., Meyer, L. C., & Fischman, A. M. (1979). The aftermath of rape (p. 12).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 McCarthy, B., & Hagan, J. (1992). Surviving on the Street The Experiences of Homeless Youth.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7(4), 412-430.
- McHugh, M. C., & Frieze, I. H. (1997). THE MEASUREMENT OF GENDER - ROLE ATTITUDES A Review and Commentary.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1(1), 1-16.
- Merrell, J. L. (1997). The effects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participant gender,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on attitudes toward marital rape and sexual obligation.
- Meston, C. M., Heiman, J. R., Trapnell, P. D., & Carlin, A. S. (1999). Ethnicity, desirable responding, and self-reports of abuse: A comparison of European-and Asian-ancestry undergraduat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7(1), 139.
-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Affairs (MOLSA).(2013): National action plan on sexual abuse and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2006–2010). Addis Ababa, Ethiopia: MOLSA.
-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05). Monthly bulletin of interior statistics.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Executive Yuan, Taiwan (in Chinese).

- Moeller, T. P., Bachmann, G. A., & Moeller, J. R. (1993).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physical, sexual, and emotional abuse during childhood: Long-term health consequences for women. *Child abuse & neglect*, 17(5), 623-640.
- Money, J., & Athanasiou, R. (1973). Pornography: Review and bibliographic annot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115(1), 130-146.
- Morris, R. T., & Jeffries, V. (1968). Violence next door. *Social Forces*, 46(3), 352-358.
- Niehaus, I. (2005). Masculine domination in sexual violence: interpreting accounts of three cases of rape in the South African lowveld. *Men behaving differently*, 65-83.
- Oberman, M. (1994). Turning girls into women: Re-evaluating modern statutory rape law. *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1973-), 85(1), 15-79.
- Royal Commission of Aboriginal People(1996)Family violence. Gathering strength.
- Reza, A., Breiding, M. J., Gulaid, J., Mercy, J. A., Blanton, C., Mthethwa, Z., ... & Anderson, M. (2009). Sexual violence and its health consequences for female children in Swaziland: a cluster survey study. *The Lancet*, 373(9679), 1966-1972.
- Rice, T. W., & Coates, D. L. (1995). Gender role attitudes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Gender & Society*, 9(6), 744-756.
- Rothman, E. F., Exner, D., & Baughman, A. L. (2011). The

prevalence of sexual assault against people who identify as gay, lesbian, or bisexual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ystematic review.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524838010390707.

Russell, D. E. (1984). *Sexual exploitation: Rape, child sexual abuse, and workplace harassment*.

Sanders, W. B., & Geis, G. (1980). *Rape and woman's identity* (p. 92).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Schwarz, N., & Brand, J. F. (1983). Effects of salience of rape on sex role attitudes, trust, and self-esteem in non-raped wome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1), 71-76.

Simonson, K., & Subich, L. M. (1999). Rape perceptions as a function of gender-role traditionality and victim-perpetrator association. *Sex Roles*, 40(7-8), 617-634.

Skeen, S., & Tomlinson, M. (2013). A public health approach to preventing child abuse in low-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 call for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8(2), 108-116.

Smallwood, G. (1995).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from an indigenous Australian's perspective. *Child Abuse & Neglect*, 19, 281-289.

Straus, M. M. A., Gelles, R. J., & Steinmetz, S. K. (Eds.). (1980). *Behind closed doors: Violence in the American famil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Tang, C. S., & Davis, C. (1996). *Child abuse in Hong Kong*

revisited after 15 years: Characteristics of victims and abusers. *Child Abuse & Neglect*, 20, 1213–1218.

Thompson, M. P., Kingree, J. B., & Desai, S. (2004). Gender differences in long-term health consequences of physical abuse of children: data from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4(4), 599-604.

Turchik, J. A. (2012). Sexual victimization among male college students: Assault severity, sexual functioning, and health risk behaviors.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13, 243-255.

UNICEF: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childhood under threat. Press release, December 2005. [http://www.unicef.org/publications/files/SOWC\\_2005\\_\(English\).pdf](http://www.unicef.org/publications/files/SOWC_2005_(English).pdf) [Accessed on November 10, 2012].

Walugembe, J. E. (2010). A pioneer's look at psychotrauma in Uganda: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s seen in Mulago Hospital Mental Health Clinic (1992)". *AFRICAN JOURNAL*, 1(1), 6.

Ward, C. A. (1995). *Attitudes toward rape: Feminist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 8). Sage.

Williams, D. J. (1984).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FBI and Political Surveillance, 1908-1941. University Microfilms.

Winton, M. A., & Mara, B. A. (2001).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Allyn & Bacon.

Wood, K., & Jewkes, R. (1997). *Violence, rape, and sexual*

coercion: Ever yday love in a South African township. *Gender & Development*, 5(2), 41-46.

Worku, D., Gebremariam, A., & Jayalakshmi, S. (2006). Child sexual abuse and its outcomes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outhwest Ethiopia. *Tropical doctor*, 36(3), 137-140.

Yang, M. S., Yang, M. J., Chang, S. J., Chen, S. C., & Ko, Y. C. (2006).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minor psychiatric morbidity of aboriginal Taiwanese women. *Public Health Reports*, 121, 453–459

Zuravin, S. J., & DiBLASIO, F. A. (1992). Child-Neglecting Adolescent Mothers How Do They Differ From Their Nonmaltreating Counterpart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7(4), 471-489.

# 修復式正義於校園霸凌事件之運用模式－ 以個案敘事經驗為例

## **Restorative Justice Applied for the Mode of Campus Bullying - A Case Study of Experience by Narrative Research Method**

施俊良\*、劉育偉\*\*、許華孚\*\*\*

---

\* 施俊良，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臺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研發組副組長，南投縣新街國小教務主任

\*\* 劉育偉，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本文通訊作者

\*\*\* 許華孚，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專任教授暨系主任兼所長，臺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理事長、台灣藥物濫用防治研究學會副理事長

## 摘要

校園霸凌事件的處理方式，如果最理想的方式，應該是「修復式正義」的機制，讓整個班上同學、加害者、受害者都可以獲得最妥善的處理及輔導，而不是單純地處罰加害者、安慰受害者。處罰加害者似乎是很一般、常見的處理模式，也許當下會有立即性的效果，也會同時具有嚇阻作用，但是一般的霸凌事件絕不是單一作法就可以處理。教育部在 2013 年也成立『橄欖枝中心』，是非營利組織，由不同的專業人士組成，抱持共同信念：以「和解」解決衝突。

「修復式正義」必須有「心裡轉換」過程及基礎，被害人要心裡真的有放下，才能夠釋懷；同時，國小教師的處理過程，班上的同學也都會看在眼裡，修復式正義不僅僅是針對加害、被害兩邊，班上同學也必須認同，才有真正效果。否則被害人如果不是真心放下原諒，而是被迫接受的，班上其他同學也會害怕這樣的情形，以後重複發生在自己身上，班上的氛圍就會受影響，所以這個心裡轉換過程非常重要。本文以個案敘事的方式，以修復式正義為主題分別訪談 4 位受訪人，並敘述處理霸凌事件的自身經驗，達到實務上運作之順遂。

關鍵字：修復式正義、校園霸凌、個案敘事、國小教師

## Abstract

Handling bullying event, The best way of the mechanism should be "Restorative justice" , so that the entire classmates, perpetrators, victims can get the best treatment and counseling, not simply, punished the perpetrators and to comfort victims. Punishment perpetrators seem to be very general, common processing mode may be present immediate effect, it will also have a deterrent effect, but generally bullying is not a single approach can handl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3 also set up an "Introduction to Olive Branch Center",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ade up of different professionals, hold a common belief: "reconciliation"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Restorative justice" must have "heart conversion process " and the basis of the victim to heart really lay down, in order to thoroughly relie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cess is a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students in the class will also see that, "Restorative justice" not just for the harm, the victim both sides must agree classmates, have real effect. Otherwise, if the victim is not really down to forgive, but was forced to accept, the rest of the class to be afraid of such a situation, after repeated happen to them, the atmosphere of the class will be affected, so the heart of the conversion process is very important. In this paper, a case narrative approach to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themes interview four respondents, respondents who described their own

experience to deal with bullying, as is presented in a way to tell a story, let readers can have empathy learning effect.

**Keywords : Restorative Justice, Campus Bullying, Narrative  
Research,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 壹、前言

根據教育部統計，校園暴力及霸凌事件多達 4,300 多件。其中，以學生對學生進行霸凌事件的比例最高，有高達 3,700 多件（施俊良、張博文、許華孚，2015）。從家扶基金會台灣貧窮兒少資料庫調查 3,199 位國中以上學生，有三成五的弱勢兒少也表示，學校班上有發生欺負同學的情形，這些研究調查尚未包含言語及網路霸凌的情形，這些校園霸凌統計數字，不僅讓人擔憂孩子校園的安全在哪裡？有許多孩子在學校遭受同學欺負、語言暴力等校園霸凌事件也多半不敢說，因為害怕被同學貼標籤成為抓耙仔，也沒有求救的管道，加上有許多校園霸凌的現象原本只是孩子間的玩鬧，但缺少師長的關心和注意，間接擴大成為校園暴力的問題（楊士隆等合著，2014；楊士隆等合著，2015）。

而所謂修復式正義，又稱社區性司法（community justice）或整合性司法（integrated justice）（許春金，2006、2007、2008），係一種以社區為機制，透過會議、調解、道歉、寬恕、賠償、服務、社區處遇等方式，回復犯罪所造成的傷害、和平解決犯罪案件的仲裁制度（許春金，2003a；2003b）；本文嘗試以「修復式正義」做為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最佳處理機制，因此，藉由實證之個案性深度訪談方式－亦即透由 4 位國小教師敘事經驗方式，瞭解修復式正義運用於校園霸凌事件之經驗模式。

## 貳、修復式正義處理霸凌事件之實踐

### 一、「橄欖枝中心」理論基礎

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是橄欖枝中心運作的理論基礎，其定義是「一件犯行或衝突事件發生後，所有利害當事人集體討論修補損害及未來預防之道的過程」(Johnson Sara, 2003; 許春金, 2006)。修復式正義的概念，追溯其發展根源，早已存在於人類歷史當中。目前，修復式正義已在全球多個國家紛紛展開，可以說修復式正義應該是一個全球的努力，以建立世界和平、永續發展 (Braithwaite, 1989)。

修復式正義的三個基本原則：第一，使用人道的、非懲罰的，讓做錯事的人改邪歸正，同時恢復社會和諧；第二，要用許多的計畫與作法來成就它；第三，社會要說明受害者的情況，也要讓加害人對受害負責，在矯治過程中，加害人、受害人與社區三方都要共同的參與 (Hayes, Hennessey, 2006)。

修復式正義主張以修復式過程(the process of restoration)來成就正義的修復式過程強調，犯罪是一種對於人際關係的傷害，因此，受害人與社區，兩者都應該是正義修復的中心 (Strang, 2002)。另外，加害人對於受害，以及社區，都有責任，這是不容否定的，也是正義的中心。最後，修復式正義強調加害人要學習，要有能力來增進對於自己與社會的了解<sup>1</sup>。

---

<sup>1</sup> 參閱教育部橄欖枝中心，網址：<http://olive.ntpu.edu.tw/oliveleaf/obcweb/>，最後瀏覽日：2016年4月2日。

## 二、教育部成立橄欖枝分中心

教育部與臺北大學及嘉義市政府合作，2015年11月25日在嘉義市學生諮商輔導中心成立「教育部嘉義市橄欖枝分中心」。該市有感於橄欖枝中心修復式正義理念之推行對校園和平氣氛之維持有其重要性，因此積極向教育部爭取將全國第一所分中心設立於嘉義市，不僅象徵著嘉義市對於反霸凌的決心，更是要將修復式正義的種子在各級學校校園中深耕發芽。

學者專家們也都共同簽署和平校園承諾書：「遞出友誼的橄欖枝，打造和平友善校園。」拒絕霸凌，從市府做起，期待嘉義市橄欖枝分中心的成立，不僅培育更多種子師資，更能對學校轉介校園霸凌或衝突事件之當事人，透過專業第三者的介入，進行見面、對話，解決紛爭，回復關係，讓行為人負起責任，受害人恢復尊嚴，最終提出雙方都可接受的和解方式，促進校園和諧<sup>2</sup>。另外教育部設立橄欖枝中心，其橄欖枝和解圈(The Olive Branch circles)也是該中心處理校園衝突事件的方式；校方如果在霸凌事件發生及經學校評估並後，認為傳統的解決方法並無法解決衝突，該中心為衝突各方提供另一個可能的解決選擇。

若學生們在過往衝突事件中無法完滿解決，以及衝突事件中之各方有意願嘗試以其他方法解決時，校方亦可聯絡橄欖枝中心，由該中心進行評估是否適合以和解的方法進行介入。簡

---

<sup>2</sup> 參閱大紀元新聞 (2015.11.25)，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1/25/n4581857.htm><http://olive.ntpu.edu.tw/olivel-eaf/obcweb/>，最後瀏覽日：2016年4月2日。

單來說，橄欖枝中心最主要的宗旨，就是利用修復式正義之概念，來調解校園霸凌事件加害者、受害者、校方三方面的衝突。如此一來，可以藉由最和平之方式，來解決校園霸凌衝突事件，減少發生機率。

## 參、研究設計

「修復式正義」是尊重被害人與加害人意願，藉由溝通橋樑，讓雙方真誠對話、和平寬恕，彌平傷害（蔡德輝、楊士隆，2014）。多數學生發生偏差行為時，教師第一時間的作法除了安慰受害者外，一定是懲罰加害者，因為這樣比較能符合大眾期待（受害者、家長、班上同學）。以修復式正義觀點來看，對於受害者而言，懲罰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就算要懲罰也是可以用另類的補償方式，重點是被害者的身心能不能獲得修補？懲罰加害者修補傷害的過程其實重於懲罰錯誤，這是「修復式正義」寬恕大於懲罰的理念。報載台南市陳泰華老師將修復式正義應用於校園霸凌處理的實例，就非常符合這樣的修復概念（蕭白雲、凌珮君，2011）。

本研究即是以敘事研究方式探討修復式正義在校園霸凌之處理經驗，受訪對象身份為 T1、T2、T3、T4，相關資料整理如下：

表 1 受訪者資本資料表

受訪者	T1	T2	T3	T4
年齡	35	40	38	42
身份	專輔教師	導師-兼任輔導教師	專輔教師-曾擔任導師	輔導組長-兼任導師
教育程度	碩士	碩士	博士	碩士
教學年資	5	18	16	18
學校規模	36 班	30 班	24 班	20 班

## 肆、研究發現

其實「寬恕」也是一種正義，以往的既有觀念，對於犯錯的人，就是認為必須加以「制裁」或「懲罰」。但不是只有「受害者」才需要關懷，也不是只有「加害者」才需要輔導。當霸凌事件產生時，事件及影響變成了翹翹板，兩端的主體都會因為事件，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都需要關心。過去的觀念，大人總是不允許學生有太多的想法，造成無形壓力讓勇於表達的能力也自然降低，所以「真誠地去原諒對方」，反而是最難處理的一塊。但「修復式正義」卻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思維。在上揭研究結果中，也可以看到幾位受訪者所提到的，修復式正義在校園霸凌事件中，確實有其運用的可行性。

## 一、T1 教師運用修復式正義處理霸凌經驗

「B2 生不太會表達，只會一直笑，B1 生已經比較冷靜了，所以會跟 B2 生再說一次對不起。我就請他們兩個談談最近相處的情況，有沒有發現對方有什麼優點。可以值得學習的。就說個一兩件，他們各自在小卡片上，畫上自己喜歡的圖案，比如說槍、玩具之類的，就送給對方」

只是在過程裡，B2 生就是一個比較樂觀的小孩，其實在對方道歉之後，B2 生其實也沒有再對 B1 生有所不滿了。其實反而是家長比較心疼，他覺得自己的小孩是不是因為身體的原因而遭受欺負？那其它同學是不是也會用同樣的方式來對待他的小孩嗎？其實以整件事情來看，有加害者跟受害者，那如果以社會上來看的話，那就是類似社區、社會。以教育界來看的話，那就是兩方面的學生，還有班上的學生，在處理霸凌事件時，不能只有加害者跟受害者兩造的學生，還必須去兼顧班上所有學生的氛圍才可以，因為氛圍也會影響班上學生的情緒或模仿效應。而 T1 教師自我認知是：

「那我知道，我用我的話解釋一下，以加害者跟受害者來看，那加害者必須去做一些事情來補償受害者，才能夠去補償受害者的損失。修復式正義就是在說明，霸凌事件中加害者跟受害者兩造、還有班上同學的三方面氛圍的問題」

根據 T1 教師之敘事經驗，她自己大部分的所遭遇的案例都是使用這樣的方式，而且她覺得難度也不高，算滿容易做到的。

「因為我以前有當過兩年的導師，我們班的學生有一次在玩樂樂棒球，但是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好像就是因為有人不高興就想要退賽，在比賽結束之後，又想要再重新加入，希望我給他們一次機會。我說不能這麼簡單就重新加入，因為這樣會損及全班的權益，所以我給他們一個機會，就是必須做 50 件好事，這 50 件好事就是比如說當值日生或者是幫同學收作業等等之類的，就是用類似這樣的方式去彌補全班的一個權益」

但是這樣的觀念要運用在學生家長身上，一般來說這是比較困難的，如果這樣的理念要運用在班級上的一些零星的小衝突事件的話，倒是還可以，因為被害者比較容易選擇原諒對方。一般的家長是否能原諒霸凌事件中的霸凌者學生，通常還是跟整起事件的嚴重程度或者是肢體受傷程度有相關，如果自己的子女是有受傷且比較嚴重的，父母都比較難以接受，甚至會談起賠償問題。如果是上述的例子，是所謂的『排擠』或『任性』的問題，就可以運用修復式正義的方式來處理，藉由『服務』的觀念，是可以成功和解的，也不至於讓學生被貼上重大的標籤而自甘墮落或只是變本加厲。

「一般來說如果是兩個人的衝突的話，要他們選擇互相原諒對方，我會用一個方式，就是讓他們互相稱讚對方的優點。就是進入到那種兩個人的小團體，比如他剛剛用髒話罵他的話，那現在就必須回過頭來用好話來稱讚對方，盡量去找對方的優點來稱讚，或者去幫對方做什麼樣的事情來彌補，就是直接回饋到這個人的身上來」

這樣的修復方式，是可以藉由輔導技巧中的「小團體」輔導來完成的，所以不僅是輔導人員，一般導師也應具備這樣技巧，因為任何一個班級，也都會有零星的衝突事件（程薇，2006）。但 T1 教師也描述校內教師運用修復式正義技巧之情形，似乎不甚普遍，必須多加以推廣，教師才有運用的可能：

「好像沒有耶！其實大部分的老師都是處罰、責備，都是把它當成單一事件處理，就是加害者要對受害者道歉、彌補、賠償這樣。比如說罰寫課文，就是一定要付出代價，好比是代償性的作用懲罰，如果今天在社會上，就是抓進去監獄關，在學校裡面就是要做一些比如說像勞動服務的事情來懲罰」

大部分的老師都還是會用「懲罰」的方式來處理這類的事件，T1 教師認為，不完全反對這樣的一個概念，但是必須再加上一個東西，就是必需做一個回饋，直接回饋在被害者的身上，而這種『回饋』方式就是所謂的服務，大家都會瞭解『服務』其實就是另類『懲罰』，但至少不是一般的體罰、禁足或者是罰寫功課..等，霸凌學生總還是比較可以接受，這在定義上就是『服務』。

「像我自己的姐姐兩個小孩就常常在打架，他們大概才兩三歲，每次只要他們打完假，我們的處理方式就是，要道歉、要去關心對方有沒有發生什麼事？要給對方一個擁抱，或者是去幫對方做一件事情」

其實一個導師在處理單一事件時，那樣子的方式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像 T1 這種專輔老師的角色來看，其實導師在

處理的時候，應該還要加上前後的關注，因為是否有去了解學生，這是很重要的。老師在學校就是等同於學生的爸媽，因為在學校的時間算很長，那老師在處理這一些同學間小問題的時候，其實同學都還是會睜大眼睛在看導師怎麼處理？老師每一次處理事情，孩子都會看在眼裡，如果老師你覺得這樣的事情沒有什麼的話，自然學生也不會覺得這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陳如瑾，2011）。

## 二、T2 教師運用修復式正義處理霸凌經驗

T2 教師認為實施修復式正義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並不困難：

「其實這個並不難，我們就曾經做過，比如說在班上有那個同學被欺負，我的做法就是，你只要欺負了別人，那你必須負責幫陪受傷的人。你就必須負責陪他幫他做任何的事情。比如說他沒辦法去上課，那就必須陪他，那他有什麼事情需要人家幫忙，你就是必須幫忙他」

但是 T2 教師認為這樣子做的前提之下，是說必須不會造成任何危險的，也就是說另外一個同學不會再嚴重的欺負另外這一個同學。那這樣子的話，才有可能讓他們單獨相處或者是在幫他做任何的事情。這一個觀念非常的重要，如果沒有設定好環境，只是為了堅持『修復式正義』，放任加害人跟被害人在一起，這是有可能造成二次傷害的，如果這時候加害學生又故意再度霸凌被害學生，其嚴重程度會更勝以往，不可不慎。在執行同時，如果有教師或其他同學陪同在場，這樣會比較有

成功可能，也才能確保受害者學生安全。

「也不是說比較小的事件，而是說像我們班之前那個同學，他會打人，那他會打人的話，我就不敢讓他再去那玩，萬一他再打第二次的話，不是更嚴重」

其實 T2 教師覺得修復式正義是可以運用的，尤其是在班上的這個範圍內，但是必須這個班的程度是夠成熟的，那才有辦法。而且一個班級如果夠成熟的話，是可以在班上推動所謂「班級法庭」，因為用班級法庭可以來裁決一些小的事情，但還是前提要在這個班的「成熟度夠」的情況下，才可以推所謂的這個修復式正義。

「我覺得如果是太大的傷害，當然不適合用，如果已經造成對方殘廢或失明，你能還對方的眼睛嗎？其實能用的就是比較小的事件，如果說會造成 2 次傷害的就是不適合」、「像我處理『關係霸凌』是兩個人互相討厭的時候，我就會讓他們坐在一起，然後讓他們互相去看對方，看對方的優點跟缺點。有人問我說那到底要讓他們坐到什麼時候，我說就坐到他們的感覺改變了，可以跟對方相處了」

因此，T2 教師在訪談中也有提到，他雖然也是常用修復式正義的方法來處理學生的霸凌事件，但是也必須看事件的大小及嚴重性。如果是太嚴重的肢體霸凌，已經對別人身體造成很大傷害，這時候還是得評估「修復式正義」的使用時機，否則極有可能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 三、T3 教師運用修復式正義處理霸凌經驗

T3 教師認為修復式正義是能應用於中小學的校園內霸凌事件處理，該師輔導團隊都是用此方式處理的：

「不是一直都是這樣在處理嗎？我認為的修復式正義的定義，應該是說無論加害者和受害者對彼此的看法必須『重新去定義』，就像心理學裡面所提的必須重新去框架。最後必須加害人是有悔意，而被害人他也願意選擇放下和原諒的，在走到真正修復式正義的下一步之前，兩方都必須有心理上的一個轉換」、「那這個『心理轉換』，包括加害者的回憶、受害者的調解。這兩方都 ok 之後，才能進入下一個階段，加害者對受害者做出一些補償或是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這在現實的案例中，T3 教師輔導團隊認為實踐上是沒有問題的，而且一直都是這樣子在運用的，T4 教師自己的經驗也都是這樣子在做。

「別人也都是這樣在做啊！沒有錯呀！如果沒有這麼做，事情怎麼會落幕了，我們無論在處理哪一類的霸凌事件，絕對不會單純的說，加害者後悔了，然後去道個歉就沒事了」、「事情會落幕，一定是兩方都同意，都有替代方案出來，周遭的人也都是認可的才會完成呀！如果沒有照這樣子的方式，只是單純安撫受害者或者只是單純處罰加害者，這樣子的方式都不是那麼的 ok，這種霸凌事件處理方法並不齊全」

輔導人員就是處理受害者這一方，但是相對的另外一半則

由學務人員去處理，共同來合作，而在開會之前，就會必須去討論好工作分配，雖然有各自負責的部分：

「比如說他們(學務人員)負責是加害者的部分，我們(輔導人員)負責的是受害者的部分，有時候也未必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模式，也有可能做一個調整我們輔導的部分。也未必一定處理加害者或是受害者，那不管是誰處理我們都會期待講好，讓孩子知道這整個事情的經過及意義，不會單純說比只有加害者被處罰」

T3 教師經驗也敘明了修復式正義於校園霸凌事件之處理、分工原則為：行政團隊處理加害人，導師處理受害人(張佩翔，2009)。

「我們也曾經處理過加害人，這是一個長遠的目標，也是一個默契。或許我一直是站在第三方的立場來處理這樣的事情，所以感覺上就是按照這樣子的一個模式，那受害者的部分就會交由導師來處理，因為導師是最接近的第一線，我們就會接手來處理加害者的部分」

所以輔導團隊會真心希望孩子可以了解整件事情，而不是用強壓的方式來處理，因為如果是用強壓的方式來處理，以後一定還會有沒完沒了的地方。正所謂強摘的果實不會甜，如果以這樣的方式來處理，無疑是以暴治暴而已，霸凌者學生不會真正的反省，反而會再找機會報復回去，甚至是轉向霸凌其他同學，這樣的結果是最不願意樂見的。

**「我們用這樣子的模式跟導師、行政人員合作。目前為止，都有處理掉沒有再復發的情形，而且家長都是滿意的」**

T3 教師覺得就是團隊的默契，「加害者、被害者的、其他人」這三者都是要處理的。讓你處理一樣，我就處理另外一樣，總之都要處理到好為止。有時候在學校系統裡面，與其去告訴方法，倒不如直接跳出來，示範直接把工作分類好，你做這個、我做那個，那這樣事情可能會更快，也會處理得更好。因此，修復式正義必須加害人是有悔意，而被害人他也願意選擇放下和原諒的，在走到真正修復式正義的下一步之前，兩方都必須有心理上的一個轉換。

**「我覺得要讓老師可以處理好這樣子的霸凌事件應該是對也比較有概念的人提供示範，讓他們覺得可以潛移默化收到效用」**

T3 教師所以提到的「心理轉換」，最後必須加害人是有悔意，而被害人也願意選擇放下和原諒，這個最為重要(林寶源，2012)。校園的霸凌事件為何常常被忽視，跟教師的處理方法也有相關，因為一般教師最常用的作法，如果是不嚴重的霸凌事件（甚至不是肢體霸凌），便是請加害人對受害人道歉，也會形式上請受害人回應是否原諒加害人，通常在這樣的氛圍底下，受害人很容易被「強迫」接受而說出非自由意願的原諒字眼。其實就算被害人要選擇原諒對方，也是需要「時間整理」自己的情緒，這就是受訪者所提到「心裡轉換」，被害人要心裡真的有放下，才能透釋懷；同時，導師的處理過程，班上的

同學也都看在眼裡，修復式正義不僅僅是加害、被害兩造，第三者班上同學也是必須認同，才有真正效果，否則被害人如果不是真心放下原諒，而是被迫接受的，班上其他同學也會害怕這樣的情形，以後重複發生在自己身上，班上的氛圍就會受影響，所以這個心裡轉換過程非常重要。

#### 四、T4 教師運用修復式正義處理霸凌經驗

被霸凌對象是特教班輕度智障學生，原因是該名學生向一名非特教班學生吐口水，結果遭肢體霸凌，這件事情老師有針對全班做心理輔導並教育學生，因為特教班的小朋友本來就比較不一樣，應以包容心面對，達到修復目的。

**「教班的小朋友他就是不懂才會這樣，我們必須對他們有更大的寬容心，你必須趕快離開或者是去跟特教班的老師反應就可以」**

如果是以這樣的論點切入，來跟霸凌者學生說明，不僅是這樣的學生能瞭解，其他班上同學應該也會受到同等的機會教育。因為那樣是欺負弱勢的行為，如果這時候要求霸凌者來做『服務』的動作，應該是更能夠達到預期的目標，因為扶助弱勢，不僅僅是在霸凌別人之後才來亡羊補牢，而是在平時就要有照顧弱勢的愛心。

總之，處理霸凌事件的策略有很多，無論用哪一種，通論來說，實務操作上，以「修復式正義」運用為佳，本文受訪者也都贊成此方法，甚至有人已沿用多年，甚至有程度上之劃

分。因為不是任何人都適用「修復式正義」，有時也得看事件本身的性質及嚴重程度而判定，但其運用上來說，有一定程度及效果，這是無庸置疑的。

## 伍、結論

學生霸凌的相關新聞，雖不至於每天看到，但其實出現在新聞頻道上的比率卻也是相當高了，而且會出現在新聞頻道上的事件，也都是相當嚴重了。沒被報導沒出現在電視上的，也不代表沒霸凌事件，事實上在學校體系中，國中小校園內要都沒學生霸凌事件，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差別只是在於嚴重程度不一而已。俗語說：「事出必有因」，學生霸凌事件亦是如此，對學生而言無論是被害者或加害者，總是會有一個最原始的因素，才會導致整件事情的開始。因此，霸凌事件的處理及追蹤輔導格外重要。

霸凌事件的處理方式，如果最理想的方式，綜上研究發現應該是「修復式正義」的機制，讓整個班上同學、加害者、被害者都可以獲得最妥善的處理及輔導，而不是單純地處罰加害者、安慰被害者。處罰加害者似乎是很一般、常見的處理模式，也許當下會有立即性的效果，也會同時具有嚇阻作用，但是一般的霸凌事件絕不是單一作法就可以處理。尚須考慮下列幾項條件（杜淑芬，2009；林項爵，2009）：

- 一、加害者是否真心改過或被嚇阻了？不會有下一次？
- 二、受害者身心狀態真的恢復？沒有後遺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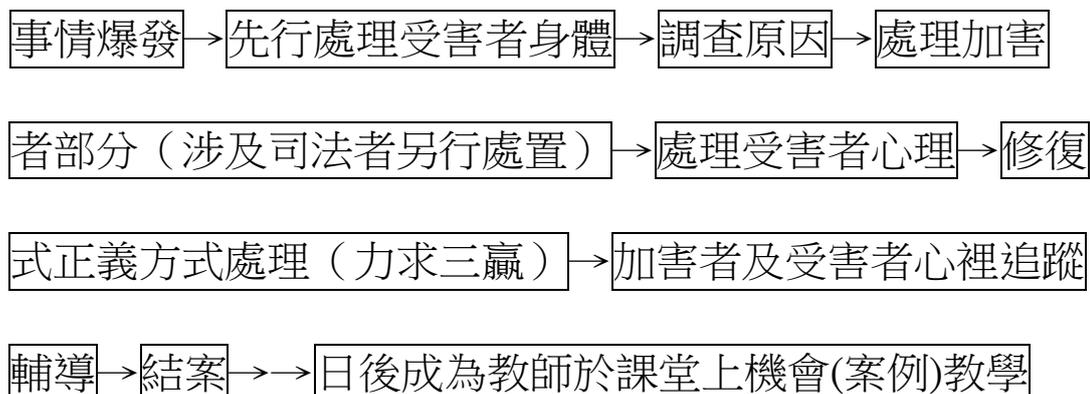
### 三、班上同學是否有受影響？會不會有一下個人的模仿行為？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指標，如果這些指標都可以接受驗證了，那才是的將霸凌事件處理好，否則加害者有可能再犯，受害者可能覺得心有不甘，等到有一天具有反擊能力時，就會變成「反擊型霸凌」，如此一來，就是所謂的「霸凌循環」（張信務，2007；黎素君，2006）。受害者也可能身心一直無法恢復，除了接受學校專業的輔導以外，甚至有可能得看精神科醫師，身體的傷害是比較容易恢復的，但心靈的創傷卻不是那容易恢復的，所以導師在第一線的立即處理之後，學生能無法恢復的話，必須轉介到輔導室，尋求更專業的輔導諮商；而班上的同學（校內學生）更是需要注意，因為一起霸凌事件，也許牽涉的不單是加害者、受害者兩造而已，可能同時有多名受害者或加害者，這些都是需要去注意的，否則班上氛圍確實很容易受影響。也可能會有看不去的人，想要替同學報仇，以暴制暴，這些都會在引發更多的棘手問題。

而修復式正義在霸凌事件的處理應用上，是有例可循的，甚至有些教育界夥伴已經有開始利用，只是不知道自己所用的方法及經驗在學理上是被定義為『修復式正義』。而此方法的應用，最基本的定義在於不是用單純的『以暴治暴』或『懲罰』來嚇阻學生霸凌事件。每個老師帶班帶學生都會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霸凌事件發生時，通常教師都會要求加害者對受害者道歉，這是最基本的動作，再來就是用『懲罰』的方式來讓加害者不可再犯，至於懲罰方式則不，但是利用此方式的結果，不竟然有嚇阻效果，加害者也不一定會改過。如同受訪者而言，

利用修復式正義的方法，反而可以緩和加害者的暴戾之氣，也可以感受到不是單純的以暴治暴，因為單純的以暴治暴，學生並無法信服，因為教師跟學生的位階、地位權力並不相等，就算是受害者也沒有辦法反抗教師的懲罰，所以不見得會真心改過，也許在加害者學生心裡，只會認為這是『大欺小』而已。而要求加害者替受害者學生『服務』，這是很基本的一件事，因為被害者的傷害確實是霸凌者造成的，所以理所當然必須負起責任來服務，用服務的方式來修復彼此之間的關係。而這樣的方式，也可以讓周遭的同學有正向的觀感，瞭解到犯錯並不是重點，重點是犯錯者能自己體會而尋求自我反省及改善，這也是修復式正義的最基本精神。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S.O.P)參考說明如下：

### ■ 校園霸凌事件處理 S.O.P



所以霸凌事件的後續追蹤輔導確實很重要，絕對不是當成單一事件處理完就沒有後續，因為當成單一事件處理，就可能有後續效應。這時候學校的輔導人員就很重要，必須發揮專業

的技巧，來協助學生，不管哪一類的霸凌事件，不見得有最好的處理方式，端看學校環境及學生態度；畢竟班級經營的技巧如同武俠小說中的武功招式一般，需要多練習才能累積經驗，但空有招式而沒有深厚內力加持，是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的。期能藉由受訪者的敘事經驗，吸取他人經驗，不管是導師、行政人員，在處理學生霸凌事件上，都可以得心應手，也可以讓教育界的霸凌事件比率降低。另外，正如 Clegg (1994) 所說的，大部份抵抗意識都是靠經驗歸納而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Holmes 也曾說過：「法律的生命，並非在於邏輯，而是來自於經驗」(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 It has been experience.)<sup>3</sup> (劉育偉，2015；楊仁壽，2005)，為了多吸取他人的處理經驗及互相分享，建議學校單位應該多舉行此類議題相關研習，可以讓教師有機會互相觀摩學習，霸凌事件如果處理得當，發生機率自然降低，而有效經驗絕對是處理類案之利器。

---

<sup>3</sup> 言下之意，亦即法律之運用，倘僅用邏輯推演成文法所建立之概念，對法律所蘊含之正義加以否定，即忽略法律在法之目的性考量，殊非法律之公平與正義（參照國防部北部地方軍事法院 100 年聲再字第 001 號江國慶開始再審裁定）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杜淑芬，2009，《涉入霸凌行為兒童家長親職經驗之敘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所博士論文。
- 林項爵，2009，《父母教養型態、教師管教方式與國小高年級學生霸凌行為之相關探討》，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民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林寶源，2012，《從教師的觀點探討國中校園霸凌現象之研究》，亞洲大學社會工作所碩士論文。
- 施俊良、張博文、許華孚，2015，《國小校園學童霸凌行為之研究-以某國小中、高年級學童為例》，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7（1）：141-205。
- 張佩翔，2009，《國中校園霸凌行為與教師處理方式之研究》，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所碩士論文。
- 張信務，2007，《營造友善校園--「從去霸凌開始」》，北縣教育61：31-35。
- 許春金，2003a，《修復式正義的理論與實踐》，刑事法學之理想與探索。
- 許春金，2003b，《修復式正義的實踐理念與途徑：參與式刑事司法》，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1。
- 許春金，2006，《人本犯罪學》。臺北：三民。
- 許春金，2007，《犯罪學》。臺北：三民。
- 許春金，2008，《犯罪預防與犯罪分析》。臺北：三民。
- 許華孚、劉育偉，2011，《校園安全及關係霸凌之成因與防制

對策之探究》，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個案及處理專業知能研討會，10月21日，嘉義：中正大學。

陳如瑾，2011，《高雄市國小教師班級經營策略與校園霸凌行為關係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所碩士論文。

程薇，2006，《諮商與輔導—校園暴力及霸凌事件的相關輔導策略》，教育趨勢導報20：131-140。

楊士隆等合著，2014，《校園犯罪與安全維護》，台北，五南。

楊士隆等合著，2015，《暴力犯罪—原因類型與對策》，台北，五南。

楊仁壽，2005，《法學方法論》。臺北：三民。

劉育偉，2015，《卡其領犯罪白領特徵之研究—以貪污犯罪判決實證分析為例》，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論文。

蔡德輝、楊士隆，2014，《犯罪學》，台北，五南。

黎素君，2006，《國小校園欺凌行為重複被害之研究》，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白雲、凌珮君，2011，〈講笑話補傷害 修復式反霸凌奏效〉。《聯合報》，2011年1月22日，教育A4版。

## 英文部分

Braithwaite, J. (1989). Crime, shame and reintegration. Melbourne, Austral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yes, Hennessey. (2006). Apologies and accounts in youth justice conferencing: reinterpreting research outcomes.

Contemporary Justice Review 9(4): 369–385.

Johnson Sara. (2003).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s and Services in Criminal Matters: Summary of Consultations. Canada: Canadian Centre for Justice Statistics p.85-562.

Strang, H. (2002). Repair or revenge: Victims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國中學生對校園霸凌防制策略之知覺 有效性評估

## **The Effectiveness of Bullying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 A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erspective**

王怡今<sup>\*</sup>、鄭英耀<sup>\*\*</sup>、陳利銘<sup>\*\*\*</sup>

---

\*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本文通訊作者

##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學生對各項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並依知覺有效性的排序來找出國中學生認為較有效或較無效的霸凌防制策略。研究對象為南台灣四所國中之 664 位國中學生（男生 320 位、女生 344 位），採問卷調查法以自編問卷進行資料蒐集，並以 Rasch 技術為自編量表進行信效度驗證。結果顯示：國中學生認為較有效的防制霸凌策略依序為：「告訴師長」、「請導師與霸凌者嚴肅地對談」、「請導師與受害者聊一聊」；國中學生認為較無效的防制霸凌策略則為：「直接對霸凌者說：『不要欺負他人』」、「跟受凌者當朋友」、「學校舉辦防制霸凌行為的活動」。依此結果建議，師長適時介入宜為霸凌防制的主要策略，霸凌防制宜思考如何提升教師及學校輔導人員對於霸凌事件的專業知能。

關鍵字：Rasch 測驗、霸凌防制策略、知覺有效性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erspectives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on effective and ineffective bullying prevention strategies. The authors developed the perceived-effectiveness on bullying prevention strategies scale (PBPS) to acquire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why bullying prevention strategies may be considered as effective or ineffective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re 664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southern Taiwan, including 320 boys (48.2%) and 344 girls (51.8%). This study used a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collect data, and the Rasch measurement has been employed to tes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cal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BPS scale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bullying prevention strategies considered as effective by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Telling teachers and adults”, “Asking the teachers to talk with bullies seriously”, “Asking the teachers to talk with victims”. The bullying prevention strategies rated as ineffective were “Telling bullies to stop it”, “Befriending the victims”, “Attending the bullying prevention activities hosted by the school”. The limitations and suggestions of these results are discussed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Keywords :** anti-bullying strategies, bullying prevention,  
perceived effectiveness, Rasch measurement

## 壹、緒論

Olweus (1993)認為校園霸凌(school bullying)是發生於校園間的欺負事件，是弱勢的個體長時間且重複地，接觸一人或多人主導的惡意傷害行為。目前已知校園霸凌會對學生身心帶來眾多負向影響，包括學業成就下降、過度飲酒、藥物濫用與飲食失調、會有焦慮或憂鬱癥候、高自殺傾向等(顏正芳, 2010; Bauman, Toomey, & Walker, 2013; Kaltiala-Heino, Rimpelä, Rantanen, & Rimpelä, 2000; Lacey & Cornell, 2013; Meltzer, Vostanis, Ford, Bebbington, & Dennis, 2011)。而且，霸凌的負向影響會延續到成年之後，某些研究顯示長期處於霸凌情形中的孩子，成年後的健康與財務狀況不佳、社會關係不良、犯罪率提升(Copeland, Wolke, Angold, & Costello, 2013; Turner, Exum, Brame, & Holt, 2013)，這些研究顯示霸凌除了會造成學生在學時身心狀況不佳以及戕害自我外，更會影響學生成年後的生活。

有鑑於霸凌帶給學生的後續影響甚劇，學者也各自發展出不同的霸凌預防策略。以整體預防為主的策略，像是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OBPP)，提出系統化的反霸凌策略，從學校層級需成立教職員協助團體，班級層級的班規訂定，再到個人層級的霸凌事件涉入者談話，皆須做整體性的反霸凌管理(Olweus, 2005)；以及 Kärnä 等人 (2011)的 KiVa antibullying program 也將反霸凌策略從個人推及到整體層次，例如：各級學校課程需融入 20 小時的反霸凌課程或是主題日。另有以處理霸凌事件技巧為主要策略，例如 Robinson

與 Maines (2008)提出的支持團體法 (Support group method)，便是著眼於霸凌事件發生時教師解決的相關策略，其包含訪談受凌者、組成團體、共負責任…等策略。

在上述的霸凌預防策略中，不論系統化的反霸凌策略或是強調霸凌事件處理技巧的策略，經常提及「與霸凌涉入者談話」或是「善用同儕團體」，這也是目前校園中常見的霸凌處理方式，但 Murray-Harvey、Skrzypiec 與 Slee (2012)的研究卻發現 8-10 年級學生從未使用或是很少使用「與學校的諮商人員談話」、「向老師尋求協助」及「同儕支持團體」的預防技巧，此揭露了霸凌防制策略及中學生實際使用策略的落差。此落差的來源，可能在於中學生對這些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若中學生覺得這些霸凌防制策略較為無效，可能就會較少採取或接受這些策略。因此，實有必要了解中學生對各項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以精進或調整霸凌防制方案中各項策略的採用。

另有研究從學生的觀點切入，來探討目前推行的霸凌預防策略是否具有成效。Frisén、Hasselblad 與 Holmqvist (2012) 研究指出曾受凌的 18 歲青少年認為向校內師長尋求幫助是有效的，例如：教師、行政人員等；但另一方面，Athnasiades 與 Deliyanni-Kouimtzis (2010)的調查卻顯示，15-16 歲的希臘青少年認為教師的介入不能發揮效果，因為學生認為這樣可能會使霸凌情況惡化，而且他們覺得無人可信。由此可知，學生間對「教師介入」是否有效，仍有觀點上的歧異，仍待研究持續澄清。因此，針對學生對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進行探討，

有助於提供更多證據來釐清部分防制霸凌策略來對學生來說是否有效。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中學生對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並依知覺有效性的排序來找出國中學生認為較有效或較無效的霸凌防制策略。本研究結果將有助於解決部分研究成果上的爭議與矛盾，例如，學生認為教師介入策略是否有效的爭議，將可獲得釐清。另外，研究結果將有助於針對無效策略來進行反思，思索教育現場所使用的反霸凌策略可如何改善。

## 貳、文獻探討

### 一、教師對霸凌防制策略的觀點

在防制霸凌策略的相關研究中，教師被視為防制霸凌的關鍵人物，諸如 OBPP、KiVa 或是支持團體法，皆內含教職員協助處理霸凌事件之環節，因此教師在防制霸凌過程中的角色及使用策略有效性，實為防制霸凌之重點。在認知有效策略上，Murray-Harvey 等人 (2012)指出教師認為「跟學校諮商師說」以及「尋求教師幫助」是有效的。研究顯示治療關係會影響學校霸凌受害者的諮商效果，當諮商師與受凌者建立起良好關係，可促使個案改變以自我傷害做為因應模式，也更願意去嘗試不同的問題解決方法（張曉佩，2013）。而在教師使用策略上，有研究認為教師若遇到霸凌事件發生，會採取「處罰霸凌者」的做法 (Kochenderfer-Ladd & Pelletier, 2008; Sairanen & Pfeffer, 2011; Ttofi & Farrington, 2009)，Yoon、Sulkowski 與 Bauman (2014)研究也提到教師在面對校園霸凌時，有 46%的

教師會用處罰來抑制霸凌行為；而 53%的教師則會輔導或安慰受凌者。可見，教師防制霸凌策略的認知及運用上是有差異的，雖然認知上能理解教師協助策略有效，在策略採用上卻選擇便利且快速的處罰策略。然而，研究指出處罰對防制霸凌來說可能是無效的，8-10 歲的學生希望教師不要處罰霸凌者，因為只會使霸凌情形惡化(Cortes & Kochenderfer-Ladd, 2014)。

## 二、學生對霸凌防制策略的觀點

在受凌學生的角度上，青少年認為「逃避」是有效的。如 11-18 歲的受凌學生(Paul, Smith, & Blumberg, 2012)、12-14 歲的受凌學生(Skrzypiec, Slee, Murray-Harvey, & Pereira, 2011)均認為逃避是有效的。K-8 年級學生則認為採取「反擊」與「告訴同學」的策略才能有效遏止霸凌發生(Black, Weinles, & Washington, 2010)。

但 Salmivalli、Voeten 與 Poskiparta (2011)針對 9-11 歲學生的研究指出，旁觀者的回應會影響霸凌的發生率，是防制霸凌的關鍵人物。旁觀者角度的研究眾多，大體上可略分為三部分，首先在學校防制層面上，Paul 等人 (2012)指出 11-18 歲的青少年認為「學校監督系統」是有效的。另外，營造正向或支持性氣氛的學校也能降低霸凌發生率(Eliot, Cornell, Gregory, & Fan, 2010; Low & Van Ryzin, 2014)。第二，在班級層面上，Crothers、Kolbert 與 Barker (2006)的研究提到中學的旁觀者認為「教師全面掌控班上的狀況」及 Friséen 與 Holmqvist (2010)的研究指出 13-16 歲青少年認為「老師與涉入霸凌事件的人員

嚴肅談話」、「增進受凌者調適策略」為有效方法。第三，在個人層面上，有研究提出 6-11 歲的旁觀者認為「出面阻止霸凌者」及「尋求教師協助」是有效的(Rock & Baird, 2012)，11-18 歲的青少年則認為「尋求家長幫助」是最有效的方法(Paul et al., 2012)。綜觀學校層面至個人層面，在旁觀者觀點的研究中，其認為有效的策略包含「告訴師長」(Rock & Baird, 2012; Thompson & Smith, 2011; Trach, Hymel, Waterhouse, & Neale, 2010)與「教師介入」(Frisén & Holmqvist, 2010; Bennett, 2009)，從上述方法可知旁觀者在面臨霸凌事件時，較傾向尋求成人的協助。

### 三、不同對象對霸凌防制策略的觀點差異

藉由上述研究，可知現行的反霸凌方案與觀點仍有相互牴觸的問題，(一) 學生觀點與反霸凌方案的落差：Paul 等人(2012)研究中，11-18 歲青少年認為「反霸凌集會活動」最無效，但 KiVa 與 OBPP 的防制霸凌方案皆含有學校集會(School assembly)的成分，且 Ttofi 與 Farrington (2009)曾指出學校集會為防制霸凌方案中的關鍵成分，這之間的差異可能是 KiVa 及 OBPP 的方案強調「全校性」(Whole-school)，系統化地組織防制霸凌的個別策略，也就是說，學校集會須搭配其他反霸凌措施始能發揮效果，倘若只是實施單一防制霸凌措施，其效力有限。(二) 學生與教師觀點的落差：研究指出教師在面對霸凌事件發生時，最常使用的方法為「處罰」(Sairanen & Pfeffer, 2011)，但也有研究指出 8-10 歲的學生認為處罰是無效的(Cortes & Kochenderfer-Ladd, 2014)。

不論對象的觀點差異為何，試圖提升教職員對霸凌處理能力仍是重要的。Kennedy、Russom 與 Kevorkian (2012)的研究顯示，教師們渴望增加霸凌事件處理的訓練，另外，學校輔導老師也認為自己防制霸凌的相關訓練尚不足(Lund, Blake, Ewing, & Banks, 2012)，顯示不只教師，連相關教職員都須接受更完備的訓練。

## 參、研究方法

###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選擇國中生是因為校園霸凌的盛行率，在國中階段最高(吳文琪、陸玟玲、李蘭，2013; Chen & Cheng, 2013)，學生有較高的比率可旁觀到校園霸凌事件，有助於問卷的填答。本研究以便利取樣方式，選取南台灣四所國中學生，取得該校同意後，隨即發放家長同意函及問卷，唯有取得家長同意及個人同意的學生方需填寫問卷。共計發放 913 份問卷，實際取得個人與家長同意而回收的問卷有 664 份，問卷回收率為 72.7%。其中共有 320 位男生(48.2%)、344 位女生(51.8%)。國一學生計有 133 位(20.0%)、國二學生共有 284 位(42.8%)、國三學生為 247 位(37.2%)。填答者平均年齡為 14.18 歲。

### 二、研究工具

#### (一) 校園霸凌預防策略有效性評估量表

本研究使用自編的校園霸凌預防策略有效性評估量表

(perceived-effectiveness on bullying prevention strategies scale, 簡稱 PBPS) 作為研究工具，題目編擬主要是參酌相關文獻，如「增進欺負者的同理心」此選項參考 Nickerson、Mele 與 Princiotta (2008)之研究；「制訂防制欺負行為相關的班規」則是參考 Olweus (2005)之研究；「告訴欺負者的父母」乃是參酌 Kanetsuna、Smith, 與 Morita (2006)；「請導師與欺負者嚴肅地對談」乃參閱 Frisé 與 Holmqvist (2010)的研究，並參酌其他學者的研究來進行編題(Kärnä et al., 2011; Robinson & Maines, 2008; Sherer & Nickerson, 2010; Trach et al., 2010)。唯採用文獻中提供的霸凌防制策略，可能會與教育現場有所落差，因此在量表中亦融合了學校實務中常用情況來編擬，如「導師處罰霸凌者」。本量表共計編擬 22 題，採四點李克特式選項，得分由 4 到 1 分別為「完全有效」、「可能有效」、「可能無效」、「完全無效」，請國中學生依符合的敘述在該項目內打勾。得分愈高，表示國中學生覺得該項校園霸凌防制策略愈有效；項目得分愈低代表國中學生覺得該策略愈沒有效。

## (二) 社會期許量表

另外，為驗證 PBPS 的外部效度，本研究以 Hays、Hayashi 與 Stewart (1989)的社會期許量表(social desirable response set measure)作為區辨效度之效標。量表共五題，採李克特式四點選項，得分由 4 分到 1 分，分別為「總是如此」、「經常如此」、「並非如此」、「絕非如此」。得分愈高，表示自陳的社會期許愈高。

###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於施測前提送人體試驗審查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進行研究倫理審議 (KMUIRB-20140075)，已獲核准。首先邀請南台灣四間中學，包含台南市、高雄市及屏東市，先致電至各學校，在取得學校同意函後，隨即聯絡該校聯絡人，將問卷、施測指導語、家長及學生知情同意函與回郵信封寄出，在施測前請該班導師發放知情同意函徵得家長同意。取得家長及學生個人同意後願意填答問卷者，致贈小禮物(巧克力)一份。接著，由導師依施測指導語，向受試者詳述本研究採不記名問卷，問卷內容將絕對保密，不傷害學生個人權益，無關成績及處罰。學生填答完畢後交由該班導師，再由該校聯絡人統一收齊，並將問卷、家長及個人同意函一併寄回。

### 四、資料分析

量化問卷主要運用 ConQuest 2.0 與 Winsteps 3.8、SPSS 18 等軟體，以 Rasch 技術進行量表信效度驗證與資料分析。選用 Rasch 技術是因 Rasch 模式乃運用答題的勝率(odds)進行對數轉換，能將李克特式量尺或評等量尺等順序量尺轉換為以 logit 為單位的客觀等距量尺，具有客觀等距量尺的特性(王文中，2004)，有助於不同防制策略間的知覺有效性比較排序。本研究將以 ConQuest 軟體所呈現的 Wright map，用以呈現國中學生對不同防制霸凌策略的知覺有效性分布情形。其次，Rasch 分析可為本研究的自編量表提供多樣的效度證據，包括：內容層面(content aspect of validity)、實質層面(substantive aspect of

validity)、結構層面(structural aspect of validity)、類推層面(generalizability aspect of validity)以及外部層面(external aspect of validity)等效度證據(Wolfe & Smith, 2007),有助於確認以此量表能蒐集到可信且有效的資料以供分析。

內容層面主要以 Rasch 模式之單向度部份給分模式(partial credit model, PCM)與單向度評等量尺模式(rating scale model, RSM)進行資料分析,選擇適配度較佳的模式進行後續分析。結果顯示單向度 PCM 適配度比 RSM 來得好,故選用單向度 PCM 來進行後續資料分析。試題的適配度指標 infit MNSQ 及 outfit MNSQ 選用 McNamara (1996)的嚴謹指標, MNSQ 需介於 0.7 到 1.3 之間始具備良好適配度。分析結果顯示 PBPS 各題 outfit MNSQ 介於 0.75 到 1.22 之間, infit MNSQ 介於 0.78 到 1.18 之間,惟試題 16「最好不要插手」及題項 22「不要做任何事情」的 outfit MNSQ 為 2.25 及 3.3, infit MNSQ 分別為 1.72 與 1.78,超出 0.7 至 1.3 之標準。由於這兩題的試題區辨值均在.2 左右,小於.4 之標準,可能無法區辨出樣本的潛在特質,因此選擇刪題。題項 11「遠離欺負事件發生現場」的 outfit MNSQ 為 1.57, infit MNSQ 為 1.49,題項 19「試著打圓場」的 MNSQ 亦超出範圍, outfit MNSQ 為 1.45, infit MNSQ 為 1.35,故剔除第 11 與 19 題。

經刪除四題後,以 18 題的 PBPS 再次進行單向度 PCM 模式分析,結果顯示 outfit MNSQ 介於 0.73 到 1.21 之間, infit MNSQ 介於 0.75 到 1.18 之間,皆符合標準,具有良好的資料適配度,其分析結果詳見表 1。18 題的 PBPS 試題分離信度

達.98，顯示本研究樣本能有效區分試題難度。而各題的校正項目總分相關係數介於.50至.72間，皆達.4以上，各題得分與總分間具有中度到中高度的相關，代表該試題與其他題目具有同質性，可測得相同構念。

在實質層面，使用 Winsteps 3.8 進行選項分析，以檢測量表的選項(response category)設置是否適切，並以 infit MNSQ 及 outfit MNSQ 來作為檢測指標(Wright, Linacre, Gustafson, & Martin-Lof, 1994)。選項分析結果顯示，四個選項均有一成以上的國中學生作答。而選項的 infit MNSQ 從 0.89 到 1.12，outfit MNSQ 則介於 0.91 至 1.10 間，符合標準。而且，四點選項的閾值呈現單調遞增的情況。表示本量表四點選項適配良好。

類推層面主要針對試題進行性別上的差異試題功能(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DIF])分析，了解具有相同潛在特質的不同群體，在某些試題上的作答反應是否出現差異，若兩群體差異達 0.5 logits，則表示相同潛在特質的兩群體在該題項已出現差異，須加以刪題或修改(Wang, 2008)。結果發現本量表試題不會因為性別上的差異而造成對試題的不同解讀。另以受試者分離信度(person separation reliability)評估該量表試題能否有效區分不同能力之受試者，信度達.8以上為佳(Wright & Masters, 1982)。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分離信度達.93，即該量表題目可有效區分不同知覺能力之受試者。而試題區辨值(item discrimination value)則用於檢驗量表個別題項，試題區辨值越好，表示該題項能妥善區分出不同能力的個體，良好的試題區辨值需大於.4(Ebel, 1972)。本量表題項的區辨度介於.56

到.77 之間，皆大於.4 之標準，顯示該題項能妥善區分受試者能力。而 PBPS 量表之 Cronbach  $\alpha$  係數為.92，表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外部層面的效度證據，本研究以 Hays 等人 (1989)的社會期許量表為區辨效度之效標，PBPS 量表與社會期許量表之皮爾森相關為.06，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水準，表示兩量表所測得的構念關聯不大，顯示 PBPS 得分與社會期許效應的得分應無關聯。綜言之，依前述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自編的 PBPS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證據，可用來蒐集國中學生對校園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資料。

表 1 修訂後 PBPS 的試題分析結果

題目	<i>Outfit</i>	<i>Infit</i>	項目總 分相關
	<i>MNSQ</i>	<i>MNSQ</i>	
1.告訴欺負者的父母	1.13	1.13	.50
2.請導師與欺負者嚴肅地對談	1.01	1.04	.57
3.增加師長巡堂時間	0.98	0.99	.63
4.避免讓欺負者與受害者接觸	1.10	1.09	.58
5.請輔導老師晤談欺負者	0.89	0.92	.65
6.塑造正向的班級氣氛	1.02	1.04	.57
7.直接對欺負者說：「不要欺負他人」	1.06	1.03	.58
8.私下安慰受害者	1.08	1.13	.54
9.在課程中教導防制欺負行為的相關知識	0.74	0.78	.72
10.請導師與受害者聊一聊	0.73	0.75	.71
11.請朋友或同學一起出面阻止欺負者	1.17	1.13	.54
12.請導師處罰欺負者	1.08	0.99	.60
13.制訂防制欺負行為相關的班規	0.80	0.82	.71
14.增進欺負者的同理心	1.06	1.06	.60
15.學校舉辦防治欺負行為的活動(如：話劇 表演、海報比賽...等)	1.00	0.98	.64
16.告訴受害者的父母	1.00	1.01	.60
17.跟受害者當朋友	1.21	1.18	.50
18.告訴師長	0.83	0.87	.67

## 肆、研究結果

圖 1 的 Wright map 呈現國中學生對防制霸凌策略知覺有效性之分布情形。由於 Rasch 測驗具備客觀等距的特性，當 Rasch 模式與資料適配時，便能將潛在能力與試題難度在以 logit 為單位的同一量尺上進行比較，例如當潛在能力與試題難度相同時，兩者的 logit 差距為 0，則試題被通過的機率是 .50；當能力與難度的差距為 +1 個 logit 時，則試題被通過的機率是 0.73；當兩者的差距為 2 個 logit 時，則試題被通過的機率是 0.88；當能力與難度的差距為 -1 個 logit 時，則試題被通過的機率是 0.27；當兩者的差距為 -2 個 logit 時，則試題被通過的機率是 0.12。不同難度的試題亦可在同一量尺上進行比較，對於某潛在能力的受試者來說，如果 x 題的難度比 y 題多 s 單位，代表 x 題不被勾選或被答錯的勝率(odds)是 y 題的  $e^s$  倍(e 是自然指數 2.718)。若兩題的難度差距  $s = 0.1$ ，則 x 題不被勾選或被答錯的 odds 是 y 題的  $2.718^{0.1} = 1.105$  倍。本研究即是運用 Rasch 測驗將不同試題置於同一單位量尺上比較，以了解國中學生對各種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排序。

圖中左邊的 X 代表受試者潛在特質高低程度，表示國中學生對霸凌防制策略有效性的知覺，假設國中學生潛在特質 logit 越高，表示國中學生容易覺得大多數策略皆認為其較有效，愈下側代表國中學生對各類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偏低，容易對各類防制霸凌策略都覺得無效；圖中右側呈現的是試題各閾值平均難度，可用來對防制霸凌策略題進行排序。此處所指的難度和一般試題難度的概念並不相同，傳統測驗是用

答對率來定義試題難度，Rasch 測驗中的難度(以多元選項題為例)則是多元選項各閾值難度的平均。試題之 logit 越高代表受試者較不容易填答該防制策略較有效，若試題的 logit 越低則受試者較容易填答其為較有效的策略。

依圖 1 顯示，國中學生認為較有效的防制霸凌策略依序為第 18 題「告訴師長」(d = -0.66)、第 2 題「請導師與霸凌者嚴肅地對談」(d = -0.42)、第 10 題「請導師與受害者聊一聊」(d = -0.28)、第 4 題「避免讓欺負者與受害者接觸」(d = -0.27)、第 16 題「告訴受害者的父母」(d = -0.27)。國中學生認為較無效的防制霸凌策略依序為第 7 題「直接對霸凌者說：『不要欺負他人』」(d = 0.79)、第 17 題「跟受害者當朋友」(d = 0.55)、第 15 題「學校舉辦防治欺負行為的活動」(d = 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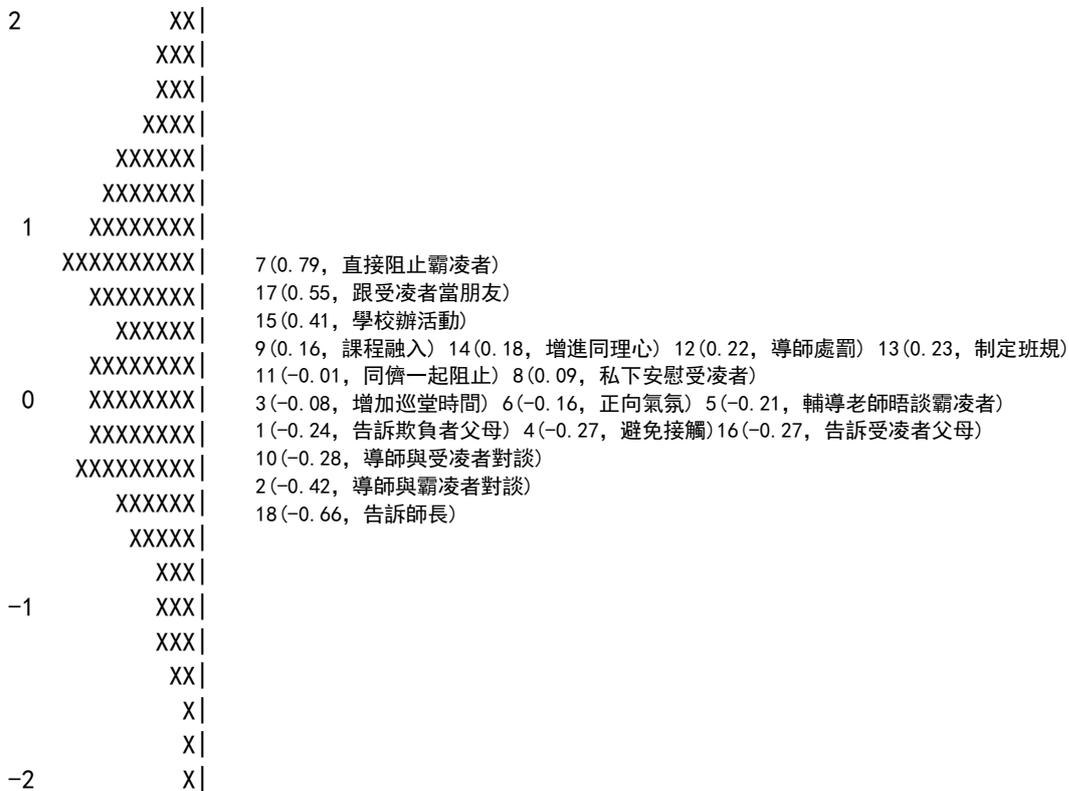


圖 1 PBPS 的 Wright map

括號前的數字代表題號，括號內是試題難度 logit 值及試題簡述。試題 logit 愈高，代表國中學生愈不容易認為該策略有效；試題 logit 愈低，代表國中學生愈容易認為該策略有效。

##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中學生對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採自編量表方式來調查國中學生覺得那些防制策略較為有效或無效。採用 Rasch 技術對 18 題的 PBPS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國中學生認為較有效的霸凌防制策略依序為「告訴師長」、「請導師與霸凌者嚴肅地對談」、「請導師與受害者聊一聊」。這三種策略都與師長有關，顯示國中學生認為告訴師長或請師長處理是較有效的霸凌防制策略。

國中學生認為較有效的霸凌防制策略為「告訴師長」，此結果與其他研究結果相符(Rock & Baird, 2012; Thompson & Smith, 2011; Trach et al., 2010)。這代表當國中學生目睹或遇見霸凌事件時，會傾向先告知學校裡的成人，並期待以教師的專業能力解決及處理霸凌事件。但前文探討曾提及 Athanasiades 與 Deliyanni-Kouimtzis (2010)發現學生認為「教師介入」無法發揮效果，其認為可能產生反效果，此與研究結果矛盾。可能因為教師若採用處罰方式來進行管教，霸凌者被處罰後可能會對受凌者進行報復。換言之，「告訴師長」對國中學生而言屬於有效之策略，但，教師介入方法不能以處罰或是權威壓迫作為因應方法，應採取其他方式，降低雙方再次受到傷害。

其次，本研究發現國中學生認為「請導師與霸凌者嚴肅地

對談」與「請導師與受凌者聊一聊」有效，此與文獻結果一致，認為「請老師與霸凌者嚴肅地對談」是有效的策略(Frisén & Holmqvist, 2010)。而在 OBPP 的個人層級(Olweus, 1978)與 KiVa 的特定行動(Kärnä et al., 2011)，也均將「教師談話」列入重點。透過教師談話可發揮兩種功能，第一，透過教師談話，對霸凌者而言可達到矯正行為的目的；對受凌者則有撫慰的作用，第二、教師可藉由與涉入霸凌人員的談話，了解霸凌事件的始末，以利後續事件的輔導與處理。

國中學生認為無效的霸凌防制策略為「直接對霸凌者說：『不要欺負他人』」、「跟受凌者當朋友」、「學校舉辦防制霸凌行為的活動」，顯示受試學生多認為學生自行處理的策略較無效。「直接對霸凌者說：『不要欺負他人』」乃是直接介入策略，雖然國小學生認為勇敢面對霸凌者為有效策略(Rock & Baird, 2012)，但國中生卻不認同此策略(Trach et al., 2010)。可能因為青春期學生十分重視人際關係，比起面對霸凌者，國中生可能較傾向選擇間接的方式來防制霸凌事件，而非直接出面，一方面能阻止霸凌，同時也能維護自我人際關係。

Moss (2004)發現「跟受凌者當朋友」可以有效防制霸凌，但本研究卻發現國中學生認為「跟受凌者當朋友」是無效策略。其可能的原因，誠如 Boulton (2013)的實驗顯示，中學生不會與受凌者交朋友，其相信如果與受凌者成為朋友，會提高自己被霸凌的風險。再以 Maslow (1987)的需求層次論解釋之，當個體的安全需求被滿足後，才會去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換言之，當國中學生認為「與受凌者當朋友」可能會受到

威脅(被霸凌風險提高)，會優先選擇滿足安全需求，再考慮追尋愛與隸屬需求(交朋友)。由此可解釋為何受試學生認為「跟受凌者當朋友」可能是無效策略。

「學校舉辦防制霸凌行為的活動」常被認為是向學生宣導反霸凌概念的有效策略，且為求宣導之效，學校經常利用朝會、周會時間進行活動宣導。本研究則發現國中學生認為「學校舉辦防制霸凌行為的活動」是無效策略。雖然 KiVa 與 OBPP 方案皆強調學校集會，但 Paul 等人 (2012)發現學生認為反霸凌的集會是無效的。可能肇因於學校防制霸凌的活動多為片段的、零碎的活動，不如 KiVa 與 OBPP 是整體性的方案；另外，學校的反霸凌活動可能流於形式而無法達到教育學生的期望，故學生認為無法實際地遏阻霸凌發生。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中學生認為較有效的防制霸凌策略皆與師長相關。整體而言，國中學生認為請輔導老師與涉入霸凌的學生晤談是有效的，然而，國中學生認為最有效的方式還是要透過第一線的導師或教師直接與涉入霸凌者對談。可能因為第一線的導師或教師若能透過班級經營或管教來直接介入處理，代表著師長對此議題的重視，能釋放出師長重視此議題/學生慎勿違犯的訊息；至於輔導老師的角色，則居於協助或支援性質，仍能發揮其有效性，唯在成效上不若第一線的導師或教師來得明顯。

本研究結果可對教師或輔導人員帶來部分實務上的啟示：首先，國中學生多認為師長介入是有效策略，因此，教輔

人員宜建立與國中學生間的信賴關係，讓國中學生在目睹校園霸凌事件時，願意立即告訴師長，而且，師長亦需正視任一個校園霸凌事件，不論輕重皆應積極處理，此亦有助於強化國中學生對教輔人員的信賴感。其次，如何提升教師及學校輔導人員應對於霸凌事件的專業知能，亦相當重要。在教師專業知能部分，建議可將「校園霸凌防制」納入師資培育課程選修學分，定期舉辦反霸凌輔導知能研習，或是學校可組成「教師-輔導人員-國中學生」討論小組，可催化國中學生與教職人員間相互理解與討論，以達成防制霸凌之目的。第三，就學校行政策略而言，辦理各項反霸凌活動及制定班規，被認為是較為無效的策略，至於營造正向氣氛、增加巡堂、與家長合作/通報家長等，則被認為是較為有效的策略。申言之，學校常見的宣導及設立規約的方式，可能易流於形式化，而易被國中學生認為無效；校方若能致力於營造學校及班級的正向氣氛、增加課間或下課巡堂、積極與家長合作，相信對於霸凌防制應可產生實質效果。

本研究限制主要因霸凌議題較為敏感，採用自陳式量表測量，學生可能會因社會期待或是心理傷害而無法如實填答。唯本研究使用匿名量表，而且，分析結果顯示 PBPS 得分與社會期許得分無關，期使社會期許效應的負向影響能降到最低。另外，在抽取樣本方面，本研究取便利抽樣，樣本僅選自南台灣三個縣市的國中學生，並非採用隨機抽樣，因此在研究結果的推論上宜保持謹慎。第三，雖然國中學生能對各項霸凌防制策略做出有效性評估，並能依此排序來找出較有效或較無效的策

略，但霸凌防制無法僅依於單項策略的實施就能獲致成效，仍需整合多元防制策略以竟其功。而所整合的策略，即可參照國中學生對防制霸凌策略的知覺有效性，廣納國中學生認為有效的策略，減少國中學生認為的無效策略。

建議未來研究可就教師層面切入，與國中學生認為的有效策略並排比較，以了解教師及國中學生看法上的差異，以供未來教育實務者作為參考。其次，不同教育層級的學生對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是否有差異，仍待未來研究持續探討。第三，教育部補助各級學校推動防制霸凌安全學校，這些校安學校採用的實際作法，與學生對反霸凌策略的知覺有效性的對照，有助於了解現有作法與學生知覺間的差異，以利修正各類防制霸凌策略。最後，由於學生可能受到班級氣氛、教師作為或學校氣氛的影響，而對各類校園霸凌防制策略產生不同的知覺，建議未來研究可採用線性階層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進行分析，納入教室階層或學校階層變項，以了解學生對校園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評估是否會受到教室階層或學校階層變項的影響。

## 參考文獻

- 王文中 (2004)。Rasch測量理論與其在教育和心理之應用。《教育與心理研究》，**27**(4)，637—694。[Wang, W. C. (2004). Rasch Measure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Journal of Education & Psychology*, 27(4), 637—694.]
- 吳文琪、陸玟玲、李蘭 (2013)。台灣地區國中學生霸凌角色之分佈及其與個人和家庭因素之分析。《台灣公共衛生雜誌》，**32**(4)，372—381。[Wu, W. C., Luh, D. L., & Yen, L. L. (2013). Individual and family correlates of bullying role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Taiw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32(4), 372—381.]
- 張曉佩 (2013)。治療關係對學校霸凌受害者諮商效果之個案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8**，29—56。[Chang, H. P. (2013). The Effects of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on an Adolescent Victim of Bullying: A Case Study.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38, 29—56.]
- 顏正芳 (2010)。兒童青少年校園霸凌經驗和心理健康之關連性。《台灣精神醫學》，**24**，3—13。[Yen, C. F. (2010). School Bullying and Mental Health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aiwanese Journal of Psychiatry*, 24, 3—13.]
- Athanasiades, C., & Deliyanni-Kouimtzi, V. (2010). The experience of bullying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47(4), 328–341.

doi:10.1002/pits.20473

- Bauman, S., Toomey, R. B., & Walker, J. L. (2013). Associations among bullying, cyberbullying, and suicide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6(2), 341–350. doi:10.1016/j.adolescence.2012.12.001
- Bennett, L. J. (2009). What schools do to/for kids who have been bullied: A Qualitative Study.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Dialogue*, 11(1), 275–292.
- Black, S., Weinles, D., & Washington, E. (2010). Victim strategies to stop bullying. *Youth Violence and Juvenile Justice*, 8(2), 138–147. doi:10.1177/1541204009349401
- Boulton, M. J. (2013). The effects of victim of bullying reputation on adolescents' choice of friends: Mediation by fear of becoming a victim of bullying, moderation by victim status, and implications for befriending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14(1), 146 – 160. doi:10.1016/j.jecp.2012.05.001
- Chen, L. M., & Cheng, Y. Y. (2013). Prevalence of school bullying among secondary students in Taiwan: Measurements with and without a specific definition of bullying.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34, 707–720. doi:10.1177/0143034313479694
- Copeland, W. E., Wolke, D., Angold, A., & Costello, E. J. (2013). Adult psychiatric outcomes of bullying and being bullied by peer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JAMA psychiatry*, 70(4),

419–426. doi:10.1001/jamapsychiatry.2013.504

Cortes, K. I., & Kochenderfer-Ladd, B. (2014). To tell or not to tell: What influences children's decisions to report bullying to their teachers?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9(3), 336–348.

Crothers, L. M., Kolbert, J. B., & Barker, W. F. (2006).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references for anti-bullying intervention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7(4), 475–487. doi:10.1177/0143034306070435

Ebel, R. L. (1972). *Essentials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Eliot, M., Cornell, D., Gregory, A., & Fan, X. (2010). Supportive school climate and student willingness to seek help for bullying and threats of violence.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48(6), 533–553. doi:10.1016/j.jsp.2010.07.001

Frisén, A., & Holmqvist, K. (2010). Adolescents' own suggestions for bullying interventions at age 13 and 16.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1(2), 123–131. doi:10.1111/j.1467-9450.2009.00733.x

Frisén, A., Hasselblad, T., & Holmqvist, K. (2012). What actually makes bullying stop? Reports from former victim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5(4), 981–990. doi:10.1016/j.adolescence.2012.02.001

Hays, R. D., Hayashi, T., & Stewart, A. L. (1989). A five-item measure of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se set.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49(3), 629–636.

doi:10.1177/001316448904900315

Kaltiala-Heino, R., Rimpelä, M., Rantanen, P., & Rimpelä, A. (2000). Bullying at school—an indicator of adolescents at risk for mental disorder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3(6), 661–674. doi:10.1006/jado.2000.0351

Kanetsuna, T., Smith, P. K., & Morita, Y. (2006). Coping with bullying at school: Children's recommended strategies and attitude to school-based interventions in England and Japan. *Aggressive Behavior*, 32, 570-580.

Kärnä, A., Voeten, M., Little, T. D., Poskiparta, E., Kaljonen, A., & Salmivalli, C. (2011). A Large-Scale Evaluation of the KiVa Antibullying Program: Grades 4–6. *Child Development*, 82(1), 311–330.

doi:10.1111/j.1467-8624.2010.01557.x

Kennedy, T. D., Russom, A. G., & Kevorkian, M. M. (2012). Teacher and administrator perceptions of bullying in schoo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and Leadership*, 7(5), 1–12.

Kochenderfer-Ladd, B., & Pelletier, M. E. (2008). Teachers' views and beliefs about bullying: Influences on classroom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students' coping with peer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46(4), 431–453. doi:10.1016/j.jsp.2007.07.005

Lacey, A., & Cornell, D. (2013). The impact of teasing and

bullying on schoolwide acade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School Psychology*, 29(3), 262–283.

doi:10.1080/15377903.2013.806883

Low, S., & Van Ryzin, M. (2014).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chool climate on bullying prevention efforts.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9(3), 306–319.

Lund, E. M., Blake, J. J., Ewing, H. K., & Banks, C. S. (2012). School counselors' and school psychologists' bullying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 look into real-world practices.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11(3), 246–265. doi:10.1080/15388220.2012.682005

Maslow, A. H. (1987).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McNamara, T. F. (1996). *Measuring second language performance*. London, England: Longman.

Meltzer, H., Vostanis, P., Ford, T., Bebbington, P., & Dennis, M. S. (2011). Victims of bullying in childhood and suicide attempts in adulthood. *European Psychiatry*, 26(8), 498–503. doi:10.1016/j.eurpsy.2010.11.006

Moss, P. (2004). *Say something*. Thomaston, ME: Tilbury House.

Murray-Harvey, R., Skrzypiec, G., & Slee, P. T. (2012). Effective and ineffective coping with bullying strategies as assessed by informed professionals and their use by victimised students. *Australian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22(1), 122–138. doi:10.1017/jgc.2012.5

- Nickerson, A. B., Mele, D., & Princiotta, D. (2008). Attachment and empathy as predictors of roles as defenders or outsiders in bullying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46*(6), 687–703. doi:10.1016/j.jsp.2008.06.002
- Olweus, D. (1978). *Aggression in the schools: Bullies and whipping boys*. Carlsbad, CA: Hemisphere.
- Olweus, D. (1993).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Hoboken, NJ: Wiley.
- Olweus, D. (2005). A useful evaluation design, and effects of 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Psychology, Crime & Law, 11*(4), 389–402. doi:10.1080/10683160500255471
- Paul, S., Smith, P. K., & Blumberg, H. H. (2012). Comparing student perceptions of coping strategies and school interventions in managing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incidents. *Pastoral Care in Education, 30*(2), 127–146. doi:10.1080/02643944.2012.679957
- Robinson, G., & Maines, B. (2008). *Bullying: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support group method*. New York, NY: Sage.
- Rock, P. F., & Baird, J. A. (2012). Tell the teacher or tell the bully off: children's strategy production for bystanders to bullying. *Social Development, 21*(2), 414–424. doi:10.1111/j.1467-9507.2011.00627.x
- Sairanen, L., & Pfeffer, K. (2011). Self-reported handling of bullying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Finland.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32*(3), 330–344.

doi:10.1177/0143034311401795

Salmivalli, C., Voeten, M., & Poskiparta, E. (2011). Bystanders matter: Associations between reinforcing, defending, and the frequency of bullying behavior in classrooms.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40*(5), 668–676. doi:10.1080/15374416.2011.597090

Sherer, Y. C., & Nickerson, A. B. (2010). Anti-bullying practices in American schools: Perspectives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47*(3), 217–229. doi:10.1002/pits.20466

Skrzypiec, G., Slee, P., Murray-Harvey, R., & Pereira, B. (2011). School bullying by one or more ways: Does it matter and how do students cope?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32*(3), 288–311. doi:10.1177/0143034311402308

Thompson, F., & Smith, P. K. (2011). *The use and effectiveness of anti-bullying strategies in schools*. Research Brief DFE-RR098.

Trach, J., Hymel, S., Waterhouse, T., & Neale, K. (2010). Bystander responses to school bullying: A cross-sectional investigation of grade and sex differences. *Canadian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25*(1), 114–130. doi:10.1177/0829573509357553

Ttofi, M., & Farrington, D. (2009). What works in preventing bullying: Effective elements of anti-bullying programmes. *Journal of Aggression, Conflict and Peace Research, 1*(1),

13–24. doi:10.1108/17596599200900003

Turner, M. G., Exum, M. L., Brame, R., & Holt, T. J. (2013).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General and typological effects across sex.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41*(1), 53–59.

doi:10.1016/j.jcrimjus.2012.12.005

Wang, W. C. (2008). Assessment of 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Journal of Applied Measurement, 9*, 387–408.

Wolfe, E. W., & Smith Jr, E. V. (2006). Instrument development tools and activities for measure validation using Rasch models: part II--validation activities. *Journal of Applied Measurement, 8*(2), 204–234.

Wright, B. D., & Masters, G. N. (1982). *Rating Scale Analysis*. Chicago, IL: MESA-Press.

Wright, B. D., Linacre, J. M., Gustafson, J. E., & Martin-Lof, P. (1994). Reasonable mean-square fit values. *Rasch measurement transactions, 8*(3), 370.

Yoon, J., Sulkowski, M. L., & Bauman, S. A. (2014). Teachers' Responses to Bullying Incidents: Effects of Teacher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xts.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15*, 91–113.



# 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

## 徵稿辦法

### 一、期刊性質：

本期刊為學術性刊物，由「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主編，每年定期於六月、十二月各出版一期。歡迎國內外青少年犯罪防治相關學術理論、青少年犯罪防治相關領域實徵性研究報告之發表。但已在他處發表之文稿恕不刊登。

### 二、稿件格式：

- (一) 來稿請依「青少年犯罪防治期刊」論文格式撰寫文稿，並請用電腦橫打，註明頁碼。
- (二) 來稿正文與中英文摘要請自行印出一式二份，連同「投稿者基本資料表」寄交編輯小組，並附電子檔一份（請用 word 儲存）。
- (三) 中文全文文長以兩萬字為度，至多請勿超過三萬字；英文稿件英文以一萬字為上限，至多請勿超過一萬五千字（均包含中英文摘要、注釋、參考書目、附錄、圖表等）。
- (四) 來稿須附中、英文摘要，並附中英文篇名、作者姓名、職稱、關鍵字。
- (五) 全文中文請用**新細明體**、英文請用 **Times New Roman** 撰寫，內文則使用**固定行高 22pt**。
- (六) 來稿若為碩、博士論文改寫，一經決定刊登，須註明「本文為碩、博士論文改寫，指導教授為□□□教授」。
- (七) 若為共同撰稿之論文，請依貢獻比率排定共同作者順序，並請填具共同撰寫者貢獻。

### 三、審查修正：

- (一) 來稿刊出前須經正式之審查程序，論文由相關領域之編輯委員委託兩名相關學者專家審稿，若二名審查委員之意見不一，則另尋第三位審查委員再做審查，總合三位審查委員意見決定是否刊登。
- (二) 凡經審查委員建議修改之處，將寄回稿件請作者依建議事項修改後，再行刊登。
- (三) 本刊因編輯需要，保有刪修權。

#### 四、著作財產權事宜：

來稿如有一稿多投，或侵犯他人著作權、違反學術倫理者，除由作者自負相關的法律責任外，兩年內本刊不再接受該位作者投稿。所謂一稿多投，包括題目不同，但內容大同小異，且已在其他刊物發表，或同時投稿本刊及其他刊物者。投稿時，請作者於「投稿者基本資料表」內簽寫切結書。

#### 五、截稿事項

(一) 本刊全年收稿，隨到隨審。

(二) 來稿請寄：

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台灣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學會  
期刊編輯小組

六、來稿一經採用，即致贈當期刊物五冊，以及其著作 PDF 檔，不另支稿費；退稿將致函作者，但不退還文稿，請於投稿前自行留存原稿。

七、本辦法經本刊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相關投稿者基本資料表、稿件編排順序與要件，請參閱本會網站期刊投稿格式訊息，  
<http://www.ccunix.ccu.edu.tw/~tsjir/>。

九、如對本期刊有任何疑問或是建議，歡迎使用下列方式聯絡：  
聯絡電話：05-2720411-26328 專線電話：05-2724555  
傳 真：05-2724253  
email：tsjir@ccu.edu.tw

## 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編排順序與要件

- (一) 首頁：首頁請附上「投稿者基本資料表」，所有作者均需填寫本表。首頁除投稿者基本資料表外，請勿在摘要或正文文稿中出現任何得以辨識作者之基本資料，以利審查之進行。
- (二) 中英文摘要：
  1. 首頁後，依序為中文摘要與關鍵詞（500 字以內）、英文摘要與關鍵詞（300 字以內），關鍵詞各三至五個。
  2. 中英文摘要字體格式：「標題」請以 **18 號字粗體置中**；「作者」請用 **12 號字置中**，若作者部分插入註腳，註腳字型，請用 **標楷體 10 號字體**；「註腳」請用 10 號字；「摘要」二字請用 **14 號字粗體置中**；「摘要內文」則用 12 號字；「關鍵字」請用 **12 號字粗體置左**。
- (三) 正文：
  1. 摘要後一頁為正文（含圖表、註釋、附錄）及參考文獻。
  2. 如有圖表，須加編號及標題，置於圖下或表上。凡人名、專有名詞附有外來語者，請以（ ）加註。
  3. 文中段落號碼標寫格式與字體為：
    - 壹、 -----16 號字粗體置中
    - 一、 -----14 號字粗體靠左
    - （一） -----12 號字靠左
    - 1.
    - （1）（依序隨階層往下編撰）
  4. 附圖、表則隨文放置，並請依 APA 格式標明。
- (四) 文獻：
  1. 字體格式：「參考書目字樣」**16 號字粗體置中**；「中文、英文、網路」等標題字樣，請用 **14 號字粗體置左**；「參考書目內文」則請用 **12 號字** 撰寫。
  2. 引註、附註及參考書目格式請採 APA 格式。
  3. 若不符合此項規定者，版刊得退稿或請作者修改後再行送審。為其他外文得用原外文方式呈現，毋須翻譯為英文。請逕至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網站查詢  
(<http://www.cer.ntnu.edu.tw/journal/>)。
- (五) 附錄：
  1. 「附錄」二字字樣，請用 **16 號字粗體置中**；「附錄一、附錄二」等字樣請用 **12 號字粗體置左**。
  2. 「附錄內文」則請用 **12 號字**。

**《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Author's Personal Information Form**

姓名 (Name)	中文(Chinese) 英文(English)	投稿日期 (Date of Submission)	年 月 日		
投稿題目 (Title)	中文(Chinese) : 英文(English) :				
服務單位與職稱 (Affiliation & Position)	單一作者請填通訊作者欄；多位作者請依貢獻度依序排列，並註明通訊作者				
		姓名 (Name)	貢獻度 (Contribution)	服務單位 (Affiliation)	學術職稱 (Position)
	通訊作者		%		
	第一作者		%		
	第二作者		%		
稿件字數	茲保證稿件全文(含中英文摘要、正文、參考書目、附錄、圖表等)				
通訊作者最高學歷 (Corresponding author Highest Degree)		通訊作者學術專長 (Corresponding author Academic Specialties)			
通訊住址 (Corresponding Address)	□□□—□□			敬請填寫郵遞區號	
電子郵件 (e-mail address)					
電話 (phone)	(O) :  (H) :	行動電話 (cellular)			
論文屬性 (origin of paper)	本論文是否為博碩士論文改寫？ <input type="checkbox"/> 是 (請續填) <input type="checkbox"/> 否 (此欄位以下免填) 其論文為： <input type="checkbox"/> 碩士論文 <input type="checkbox"/> 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為_____；是否與指導教授共同掛名？ <input type="checkbox"/> 是 <input type="checkbox"/> 否 Is this paper of your thesis / dissertation? <input type="checkbox"/> No <input type="checkbox"/> Yes, your advisor is _____. Does he/she coauthorize with you? <input type="checkbox"/> Yes <input type="checkbox"/> No				
指導教授簽名	指導教授服務單位/職稱	備註	投稿作者若仍為 <u>在學研究生</u> ，投稿需經相關指導教授審閱並簽名認可(左欄)。		
茲保證以上所填資料無誤，且本文未同時一稿多投、違反學術倫理、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如有違反，責任由作者自負。 I guarantee that the information I provide above is correct, that any part of the paper has not been published or being reviewed elsewhere, and that I did not violate academic ethics. The author alone is responsible for legal responsibilities. 作者簽名 signature _____ (共同撰稿者皆須具名於本張資料表)					

備註：投稿者投稿時務必在稿件正文之外填寫本表；個人基本資料請勿出現在正文中，以利作品匿名送審事宜之進行。